

托爾斯太傳

譯·庸 懋 徐



行發局書通華海上

通華

託爾斯泰傳

第一章 「最近消失的光明」

那俄羅斯的偉大的靈魂，火焰萬丈，百年以來，輝煌於地球之上者，實爲照耀我們這一代人的青春時期的最純潔的光輝。在垂暮的十九世紀的昏暗中，這是一顆撫慰的明星，其光明吸引了安撫了我們青春的精神。許多的人——在法蘭西，這類人是很多的——一致地把託爾斯泰，不僅認作敬愛的藝術家，並且引爲最親密的友人。其中有許多，簡直認他爲全歐洲藝術界的唯一的友人。——我謹致感謝和愛慕之詞於這神聖的回憶。

我開始知道託爾斯泰的那個時候，一點也不會忘去。那是一八八六年。經過數年默默的萌芽期之後，俄羅斯藝術的燦然的香花，在法蘭西的土地上開了出來。託爾斯泰、杜思妥甫斯基等著作的譯本，同時火速地在各家書舖出版。一八八五年到一八八七年間，在巴黎出版了戰爭與和平、安娜小史、幼年時代和少年時代、玻里庫希卡 (Polikushka)、伊凡·伊力奇之死、高加索小

說和民間故事。不數月間——不，數星期內，在我們眼前，展開了整個廣大的生活的寫真，這裏面反映着新的民衆，新的世界。

是時，我剛進師範學校，我和我的許多同學，各懷不同的意見。在我們的小團體裏，有着現實的譏諷的思想家，如哲學家者喬治·杜馬(Georges Dumas)，有熱情如火的，傾向意大利文藝復興的詩人們，如蘇阿萊(Suara)，有古典的傳統的信徒，有「斯丹達爾癖」，有「華葛納迷」；有無神論者以及神祕論者。那真是議論縱橫爭辯不絕的世界。然而不數月間，對於託爾斯泰的共通的爱慕，却使我們幾乎全體一致的結合了起來。每人愛慕他的理由，彼此不同：因爲每人都在託爾斯泰之中，各各找到了自己；但對於全體，這是一種人生的啓示，是開向廣大的世界的一扇門。在他方面，在我們的家庭裏，在我們的省裏，這來自歐洲邊境的偉大的聲音，也喚起了同樣的同情，有時簡直是出於意表的。有一次，我遇見故鄉尼微爾納(Nivernais)的幾個紳士，他們平常對於藝術是毫無興味而且差不多什麼書也不會讀過的，但這一次，我聽他們竟也與會淋漓地在大談其伊凡·伊力奇之死。

我在著名的批評家們的著述中，讀到這樣的論調，說託爾斯泰從我們的浪漫派作家這裏，借

得了他的思想的精華——從喬治桑，從葛俄。此種謬論，是無庸討論的，決沒有這樣的事。但我們却確實不必否認盧梭和斯丹達爾對於託爾斯泰的影響。雖然，我們倘因託爾斯泰的思想受過這些影響而就懷疑他的偉大以及他對於我們的魅力，那也是不對的。有藝術在內活動着的思想的範圍，是很狹小的。他的力量，不在於思想上，而在於他的思想的表現上，在於他的個性的調子上，在於他的藝術的特徵上，在於他的生活的風韻上。

不管託爾斯泰的思想是否借來的，——我們在後曾明白——到底，從來沒有一種聲音，能像他一般的在歐洲得到響應過。我應該怎樣的來說明那時候的我們的感動呢？當我們聽到這心靈的音樂而感動得發抖的時候，這種音樂，恰是我們期待已久而且又是我們所必需的。至於文體等等，在我們的意見上，倒是無關緊要的。我們之中的大多數——例如我——祇在讀了託爾斯泰的小說之後，纔知道伏古埃 (Eugène-Melchior Vögüé) 所著的關於「俄國小說」的書。但是他對於託爾斯泰的讚美，同我們的比較起來，是顯得很平淡的。伏古埃氏特別判定他是偉大的文學家。但在我們看來，單知道欣賞託爾斯泰的作品，那是嫌太少了；我們當體驗他的生活，他的生活就是我們的生活。我們的，由於他對於人生的熱愛，他的青春的心。我們的，由於他的諷刺的覺悟，

他的無慈悲的明見，他對於死的妄想。我們的，由於他的博愛和人類間的和平的夢想。我們的，由於他對於「文明的虛偽」的猛烈的非難。此外，他的實寫主義，他的神祕思想，他的對自然的感激，他對於不可見的力的感覺，他對於無窮的冥想，都是我們的生活。

託爾斯泰的小說之於我們，恰如維特對於前一代人，乃是反映我們的力量和弱點，希望和恐怖の明鏡。我們並不焦心於調和這些各式各樣的矛盾，尤其不想把這反響着全宇宙的複雜的心靈，納入宗教或政治的狹隘的範疇，好像有的人所做似的。例如保爾·蒲爾謝 (Paul Bourget) 在託爾斯泰死後之次日，就把那荷馬史詩般的戰爭與和平拉攏到他們的黨派的感情的水準上去。好像自以為我們這一派已經得到天才的尺度了！……實際上，託爾斯泰是否屬於我們這一黨派，有什麼要緊呢？當我們呼吸但丁和莎士比亞的勇圍氣，沾勻他們的光輝之際，可也曾爲了他們屬於何派而不安過麼？

我們決不像現今的批評家似的說「有兩個託爾斯泰，一個是變節 (L'orange) 以前的，一個是變節以後的；前者是好的，後者是完全不好的。」對於我們，祇有一個託爾斯泰，我們愛慕他的全體。因爲我們本能地感到，在這樣的靈魂之中，一切都是相關的，一切都是相結合的。

第二章 幼年時代

我們的本能所感覺到的，現在由我們的理智而證實了。我們憑這一本長長的傳記，在大眾眼前，提出證據來，毫無隱瞞，而且要使他成爲精神的天空中的太陽。但是，立刻就使我們難決的是：貫澈於託爾斯泰的一生的始終的，究竟是那一點呢？關於這，我們將處處遇到別的批評家們所設的障壁；甚至於託爾斯泰自己，因爲是一個熱情家之故，當他有所愛時，就相信這是他第一次的愛，當他有所信仰時，就相信這是他第一次的信仰，卽把那時候，定爲他的真正的生活的開始。然而，開始，又開始，在他，同樣的轉變，同樣的鬥爭，不知道發生過多少次哩。我們不能夠說出託爾斯泰的思想的一貫之點——他的思想永遠不是一個——祇能說出許多不同的要素時而調和時而衝突——但衝突的時候居多——的糾纏的經過而已。所謂「一致」，在託爾斯泰的精神和心裏，是根本不存在的。祇有他的感情的鬥爭，他的藝術和生活的悲劇，倒是始終一貫的。

藝術和生活是一致的，從來沒有像他這樣的和生活密切地融合的作品過；這些差不多常常是

帶着自敘傳的性質的。這些作品，使我們一步一步地跟着他，去經驗從他二十五歲開始的富於波瀾的境遇。他在二十歲以前寫起一直到死為止的日記〔註一〕以及皮魯珂夫(Biryukov)〔註二〕氏所提
供的許多註釋，更完成了這種知識。不但由此可以按索託爾斯泰的每日的良心的告白，而且使他的天才所託根的世界以及他的心靈所賴以滋長的許多人物，再生於我們的眼前。

他的遺產很豐富。他的祖先託爾斯泰家和伏爾孔斯基家(Volkonski)，門第高貴，又是舊家。嘗自誇其遠祖為路理克(Rurik)。從他們的譜系中查來，有彼得大帝的侍臣，有參加七年戰爭的大將，有拿破崙戰爭中的英雄，有十二月黨人，也有政治犯。根據家世的回憶，託爾斯泰在戰爭與和平中，創造了幾個最獨創的典型：老公爵鮑爾孔斯基(Bolkonski)，他的外祖父。是服爾泰式的(Volkairienne)專制的加德隣二世時代的貴族政治的保守派的代表。尼古拉·格萊哥里微支·伏爾孔斯基公爵(Nicolas Grégorévitch Volkonski)，是他母親的外甥，在奧斯推利茨(Austri-entitz)受了傷，在拿破崙的監視之下，被從戰場運了回來，和安特萊公爵(André)一樣。他的父親，有幾分尼古拉·羅斯妥夫(Nicolas-Rostov)〔註三〕的性質；他的母親馬利公主(Marie)，是一個醜陋而有美麗的眼的溫和的婦人，她的善良，輝煌在戰爭與和平中。

不過託爾斯泰不大認識他的雙親。他的動人的記敘幼年時代和少年時代，如大家所知，是很少真實性的。他不到兩歲時，母親就去世了，所以他不能回憶她的親愛的容顏，祇有小尼古拉·依爾退尼夫 (Nikolai Irtniev) 能夠眼淚紛紛地追念起那充滿着慈祥的微笑的面容，這微笑使她周身發出喜悅來。

「啊啊！假使我能夠在困苦的時候一瞥這微笑，我就不知道什麼叫做痛苦了。」〔幼年時代〕
然而，無疑地，她把全部的誠實，她的對於別人的意見的冷淡，以及善於講述自己所創造的故事的天才，這許多最好的贈品，遺傳給他了。

關於他的父親，他還能保持若干記憶。這是一個談諧可愛的有一雙憂鬱的眼的人，他任在自己的領地內，心平氣和地生活着。他去世時，託爾斯泰已經九歲。他的死，使託爾斯泰「第一次明白苦痛的真理，以致絕望充滿了靈魂。」——幼年時代第一次所遇的這恐怖的光景，使得託爾斯泰後來的一部分的生活，常對這幽靈搏鬥，而另一部分的生活，則把這光景變了一個樣子而紀念之。……這個苦悶的痕跡，留遺在幼年時代的最後幾章裏面，不過，在那裏面，却把這些記憶借來敘述他的母親之死亡和葬式了。

他的雙親，留下五個孩子。在耶斯耐耶·玻里安那 (Tasnia Poliana) 離老家裏，萊翁·尼古拉微支 (Leon-Nicolaievitch) 於一八二八年八月二十八日誕生，直到八十二年之後，他辭謝了這老家而死。最幼的是一個姑娘，叫作馬利 (Marie)，她後來虔信宗教 (託爾斯泰逃開家庭妻子而臨死時，就隱匿在她家裏)。——四個兒子：舍爾該 (Serge) 很自私，很漂亮，「某一程度的無人能及的誠實」——特米德里 (Dmitri)，是熱情的，後來，在學生時代，熱心地委身於宗教的實踐，不顧別人的評論而斷食，訪求貧人，優卹病人。然而，後來驟然放蕩起來，也如以前一般的劇烈。接着被悔恨所苦，贖了一個在妓院中所識的女人養在家裏。二十九歲時，便患肺結核而死 [註四]。長子尼古拉，是諸兄弟中最被寵愛的一個，他得了母親的善於講故事的想像的天分的遺傳。(他曾著獵人日記一書)，他是譏諷的，神經質的，風雅的。後來從軍高加索，在那裏得了飲酒的習慣。他也充滿了基督徒的仁慈，住的是陋室，把所有的一切都分給窮人。屠格涅夫曾說：「他實踐對於人生的謙抑的態度，他的弟弟萊翁則喜歡把這態度在理論上發揮。」

在這一羣孤兒之傍，有兩個大心的婦人：一個是泰鏘娜 姑母 (Tatiana)，託爾斯泰說「她有兩種美德：穩重和仁愛」。她的一生無非是愛，她不斷地犧牲自己。

「她使我認識仁愛這一種道德的歡喜……」

另一個是姑母亞歷山特拉 (Alexandra)，她時常服役於他人，而避免他人的服侍。她像僕役一般地過活。她最喜歡讀聖書的故事，也歡喜同善男信女們以及無智者談天。她留了許多無智者在家裏。有一個信女，能背誦聖詩，是託爾斯泰的妹妹的「教母」。另外一個，格利沙 (Grisha)，祇知道禱告和哭。

「哦，偉大的基督教徒格利沙！你的信心竟如此堅強，至於能夠感到上帝近在目前。你的愛是如此的熱烈，至於不必理智的支配，你的言語就會自然流露出來。你禮讚神的光榮之際，找不出語言時，你就淚潛潛地跪在地上……」(幼年時代)

誰看不出託爾斯泰的性格乃是這些平凡的人所形成的呢？她們似乎以範鑄託爾斯泰，試驗託爾斯泰為目的。她們的禱告，她們的愛，種了信仰的種子在這孩子的頭腦裏，當他老時，就看到這種子成熟後的收穫。

除了格利沙，託爾斯泰在幼年時代裏一點也沒有說起這些幫他建造他自己的靈魂的謙抑的合作者。然而，這孩子的靈魂「這純潔仁愛的心，時常在他人身上發現他們的最好的性質的，像清

澄的光一般的心」如何的從書本裏透露出非常的溫情來呵！因為他自己是幸福的，所以一想到他所知的不幸的人時，他就哭了起來，他願爲之犧牲。他擁抱了一匹老馬，請牠原諒他以前曾給他吃過苦。他以愛他人爲幸福，而不以被他人所愛爲幸福。那時，我們已經看得出他的天才的萌芽：他的對於自己的歷史的想像——這使他哭過；他的時常忙碌着的頭腦，不住地想發現別人所想着的問題；他的早熟的觀察力和記憶力〔註五〕，他的到處留心的目光，在悲哀中也注意周圍的人們的容顏和他們的苦痛的真相。他自己說，他五歲時就第一次想到「生活並不是享樂，而是很辛苦的工作。」（最初的回憶）

幸而這種思想不久就忘掉了。這時期，使他得到慰藉的是許多民間故事，和俄國所謂 *Bytino* 的神話的傳說的幻想，聖經中的故事——尤以那崇高的約瑟夫傳，他在晚年猶取作藝術的模範——還有，在祖母家裏每晚窗邊一個盲者所講的一千零一夜。

〔註一〕曾經間斷過若干時候，尤以一八六五——一八七八年間斷得最久。

〔註二〕皮魯珂夫氏的託爾斯泰傳，包含託爾斯泰的生涯、作品、記憶、回想、書翰、日記的斷片、手記等傳記的

文書，是很重要的文書。

【註三】 他亦出陣於拿破崙戰爭，自一八一四年起一直到十五年後，在法蘭西被捕。

【註四】 在婀娜小史中，託爾斯泰把他描寫作萊汶(Levin)之兄。

【註五】 他在一八七八年的自敘傳的手記中，說他記得嬰兒時被棄於襁褓中以及在木盆中洗澡的事見最初的回憶。

第三章 少年時代及青年時代

一八四二——一八四七年間他在凱壤 (Kæm) 求學，成績平平。有人批評他們「註」三兄弟說：「舍爾該，需要，同時做得到；特米德里，需要而做不到。萊翁，既不需要，又做不到。」

這時期，他後來名之曰：「少年時代之沙漠」。在這沙漠中發作着狂熱的風暴。關於這時期的事，在他的少年時代和青年時代的大部分中，有很多親切的懺悔。

那時，他是孤獨的。他的頭腦陷在不斷的熱狂的狀態裏。在一年中間，他苦苦追求，而且試行實踐各種學派的學說。他曾照斯多噶派一般的自苦其身，也曾照伊壁鳩魯派一般的耽於逸樂。後來，他相信了輪迴說。最後，他陷入不健全的虛無主義中。他好像飛速地在旋轉。他能夠面對地看見「虛無」。他分析自己，不斷地分析自己……

「我祇想着一件事，我想我是在想一件事……」少年時代

這不斷的分析，這憑空旋轉的機械一般的理智的追求，在他成爲一種危險的習慣。他自己說

「這時常妨害他的生活」。然而，他的藝術，却於此汲着了豐富的源泉。

自己分析的結果，他失去了所有的信仰：至少，他是作這樣想的。十六歲時，他就停止祈禱，也不到教堂裏去〔註二〕。不過信仰心並沒有完全絕滅，祇是隱匿起來而已：

「雖然，我還信仰某些事物。那是什麼呢？我倒說不出。我依然信仰上帝，不如說我不會否定上帝的存在。但那是怎樣的上帝呢？我也不明白。我也不否定基督及其教義。但這些教義中包含着什麼呢？我一點也說不出來。」（我的懺悔第一卷）

有時候他發生慈善思想。他情願賣了他的馬車，把錢分給窮人們。且把十分之一的財產犧牲給窮人，自願過奴僕的生活……：「因為奴僕們也是同我一般的人。」（青年時代）有一次生病的時候

〔註三〕，他寫了一篇「生活的規律」。他在裏面安然給自己規定應該「學習一切，深究一切：法律、醫學、語言、農業、歷史、地理、教育，且對於音樂和繪圖兩項，要學到最高的程度」。同時，他「相信人類的天職，是在乎自強不息地完成自己。」

然而，不知不覺之間，在青春的情熱的衝動之下——一種強烈的肉慾和一種無限的自負心〔註四〕使得他這種信仰乖戾了，失掉原來的公正的性質而變成實利的和物質的了。現在他的意

志，身體和精神所欲完成的，是戰勝世界而強迫人們愛他。他需要他人來滿足他自己〔註五〕。

這倒不易如願以償。因為他本來醜陋得像一隻猴子：一副粗暴的臉，又長又純重。短短的頭髮，一直生到額部。一雙小眼，木然釘住你，埋在昏暗的眼眶裏面。闊鼻頭，大嘴唇向前突出，加上一雙大耳朵。他幼年時候，已因這無法改變的醜陋而引起絕望的恐慌〔註六〕，因而他自期做一個「正經的紳士」〔註七〕。但這理想，却引導他像別的「正經的紳士們」一般的去賭博，糊裏糊塗的負債，完全放蕩了起來。（尤以一八四七——四八年間旅居聖彼得堡時為甚）

祇有一種東西時常援救他：他的絕對的誠實。

「你知道為什麼我愛你甚於愛別人麼？」南克留獨夫 (Nekliudov) 對他的朋友說：「因為你有一種異常的稀有的性質，就是誠實。」

「正是，我常常把連我自己也認為可羞的事都說出來。」（少年時代）
當他墮落的時候，他自知甚明地批評自己。

「我完全像畜生一般地過活。」在日記中寫着：「我是完全墮落了。」
而且，以他的分析癖，把他自己的過失的原因詳細地舉出來：

1. 猶豫不決或缺乏毅力
2. 自欺
3. 輕躁
4. 無故怕羞
5. 短氣
6. 雜亂無章
7. 摹倣心
8. 容易轉變
9. 無思慮。

他做學生的時候，即以這樣的獨特的判斷，用來批評社會的成見和智識界的迷信。他譏笑大學的學問，嚴重地拒絕歷史科的課程的學習。因其思想的大膽，終於受到休學的處分。這時期，他發現了盧梭，懺悔錄和愛彌兒對他不啻春雷之一震。

「我禮拜他，我把他的紀念像抱在頸邊，視同聖容。」

他的最初的哲學論文，就是關於盧梭的論評（一八四六——七）

這時，他討厭了大學和那些「正經的紳士」，他回到耶斯耐耶·玻里安那的鄉間（一八四七——一八五二），他同鄉民親近，他想幫助他們，做一個撫慰者和教育者。這期間的他的經驗，在他最初的作品一個地主的朝晨中敘述着。（一八五二）這是一本可注意的書，裏面的主人公，就是他最愛用的假名南克留獨夫公爵〔註八〕。

二十歲的南克留獨夫，捨棄了大學而專和農民接近。在一年間，他想做點於農民有利的工
作，他去訪問一個農村，但他却看出農民的冷淡的譏笑，根本的不信任、固守舊習、無遠慮、惡

德和忘恩，而起了衝突。一切的努力，都歸無效。他頹喪了，他想到一年來的他的夢想，他的熱心，他的「唯愛與善爲幸福和真理，這世界的唯一的幸福和真理的信念」，他感到失敗，他慚愧而厭倦了。

「坐在鋼琴前面，他的手漫然撫着鍵盤，接二連三地發出一種音調來……他開始彈奏。那些音調不是完全合規的。有時平凡得至於庸俗，表現不出一點音樂的天才；但他却從中感得或種憂鬱的趣味。每當調子改變時，他的心跳動着，等候那將發出來的聲音。而且恍惚地憑着想像訂正錯誤之處。他聽着合唱，聽着Orchestra，……而他的主要的趣味，則得自由此引起的活潑的想像，這種想像，雖然無所關聯地，却以非常的明白性，浮現出種種過去未來的最複雜的光景和影像……」。

他又看到那惡德的，不信任的，說謊的，懶惰的，倚賴成性的農民，他同他們談了很多的話。但這一次，他又把農民看成善良的，不是可惡的了。他的仁愛的直感，透視他們的心底，他看到他們的忍耐，他們對於壓迫着他們的命運的苟安，他們對於所受的侮辱的原諒，他們在家庭間的親愛以及他們固守舊習戀慕過去的原因。他追念起他們的疲倦而健康的有益的工作的日子來。

「這是很美麗的」，他喃喃自語：「爲什麼我不是他們的一分子呢？」（一個地主的朝晨）

整個託爾斯泰已經包含在這第一部小說的主人公中：他的明晰的觀察力和持久的幻想。他觀察人們時，用一種正確的現實主義，但他的眼一閉，他的夢想和人類愛又自由地活動起來了。

【註一】 比他大五歲的尼古拉，已於一八四四年畢業。

【註二】 那是他耽讀服爾泰 (Voltaire) 的作品而很感興味的時候。

【註三】 一八四七年三四月間。

【註四】 「人們的一切事情，都靠自負心做出來的。」在少年時代中南克留獨夫曾說。

一八五三年，他在日記中記着：「我的大錯，是驕傲、無限的自負、不講道理，……我竟剛愎自用到這地步：假使有人叫我在「光榮」和「道德」二者中，選取我所喜歡的一個，我深信我一定選取前者。」

【註五】 「我要一切都認識我而且愛我。我祇希望每個人聽到我們姓名，都崇拜我感激我。」（青年時代）

【註六】 「像我這樣有一個大鼻、厚唇、小眼的人，在這世上一定是無幸福可言的。」（幼年時代）又道「無表情的臉，羸弱、柔懦、猶疑、下品的樣子，使人想起簡單的農夫。手和脚也太大。」（青年時代）

【註七】 「我把人類分爲三個階級：第一是「正經的紳士」，是該被尊敬的。第二，「不正經的人」，是可鄙的，第三是

平當百姓，種人沒有存在過。〔青年時代〕

【註八】南克留獨夫這假名，在少年時代和時代青年（一八五四），在故人之選道（一八五六）記數人的手記（一八五

六）呂泰納（一八五七）和復活中都出現。但要注意，這名字代表許多不同的人。託爾斯泰不曾把同一的

不統給予這人。並且，南克留獨夫在記數人手記的結末，是自殺了的。但許多南克留獨夫，都是具備着最
好的性質和最惡的性質的託爾斯泰自己的化身。

第四章 青年時代

然而，一八五〇年時的託爾斯泰，却不比南克留獨夫一般的尙可忍耐。耶斯耐欺罔了他，他厭棄了民衆和厭棄優秀分子一樣。他的任務累了他，他不願意維持下去了。同時，債主們又來逼迫他。一八五一年，他就逃到高加索的軍隊裏去，跟他的哥哥軍官尼古拉在一起。

一到那明朗的山上，他就恢復了原狀，他又追求上帝。

「昨夜（一八五一年七月十一日）我剛想睡覺……我忽然向上帝祈禱起來。當祈禱時所湧出來的那種溫慰之感，是無法形容的。我默誦着熟習的禱詞。停止了很久，我又繼續祈禱。我感到某種非常偉大非常美麗的東西……是什麼呢？我說不出來。我願意和「無限的實體」合而爲一。我請求上帝赦免我的過失……然而，不，我並不請求。我想，既然在這時候，他允許我感到幸福，那麼他已經赦免我了。我請求，同時我感到無所請求，而且我不能也不知怎樣請求。我感謝他，但不以言語，也不在思想上……剛在一點鐘之間，我在耳畔聽到邪惡之聲。我睡去

的時候，又夢見着名譽和幾個女人：這比我更強——但不要緊！我感謝上帝，因為在這幸福的瞬間，他指點出我的卑小和偉大。我想祈禱，但我不知道；我想了解，但我不敢。我完全遵從神的意志罷……！」（日記）

但他的肉體還不會屈服（這永遠如此）在他心裏，暗暗地繼續着神與慾的鬥爭。託爾斯泰在日記中述着三個蠶食他的魔鬼：

- 一，賭博慾。可以克服的。
- 二，肉慾。甚難克服。
- 三，虛榮心。是最可怕的一個。

當他夢想着犧牲自己為他人而生活的時候，那些放蕩輕薄的思想也來糾纏他，就是幾個哥薩克女人的影像，或者「使他左邊的鬍子驕得比右邊的更高的那種絕望」。但不要緊！有上帝在。上帝此後不再離開他了。和這同樣的鬥爭的紛擾是很多的，而一切生命力，却由此激發起來了。

「我偶然想到，我的高加索之行，刺激得我高尚起來了。上帝親手在指示我：我不住地感謝他。我想我在這裏，是變得最好的了。我確信我的一切遭遇，將都是於我有益的。因為這是

上帝自己所願意的。」（一八五二年一月致泰緝那姑母書）

這是春天的大地的光輝活潑的歌唱。這大地蘊藏着花朵，一切是善的，一切是美的。到了一八五二年，託爾斯泰的天才終於開出最初的花來了：幼年時代、一個地主的朝晨、侵入、少年時代：他感謝那培養他的生活的精神。

第五章 初期的作品

我的幼年時代的歷史開始於一八五一年的秋季，在底弗里斯（Tilts）。至一八五二年七月二日在高加索的披雅帝哥爾斯克（Piatigorsk）告成。不可思議的是，在這使他陶醉的自然環境中，在新的生活中，在戰爭的動人的冒險中，從事於發現他所生疏的性格和感情的世界之際，託爾斯泰却於這第一本著作裏，回復到已逝的生活的追念。但他寫幼年時代的時候，正在病中，軍事活動驟然中止；後來，在養病的長閑中，孤獨而苦悶地，陷於感傷的心境〔註一〕。因此，過去的生活就自然而然在他變得溫柔些的眼前顯現出來了。經過極其無謂的近幾年的生活之後，他愉快地回憶起初年的非常的天真的，詩的快樂的時期來，同時恢復了「善良的，多感的，能夠愛的童心」。因青春期的緊張及無限大的計劃，又因他的循環的詩的想像力，他很少設計一個單獨的題材。他的偉大的小說，不過是一串很長的歷史的連環中的一環。一種巨帙中的一斷片而已〔註二〕（但這種偉大的巨帙到底沒有完成）。所以，這時候，託爾斯泰寫他的幼年時代，在他只看作一種

四時代的歷史的第一章而已，他的計劃，包括高加索的生活，而且無疑地要涉及被自然啓示了上帝的這一節。

到了後來，託爾斯泰對於這包含着他的幾分人性的幼年時代，取非常嚴刻的態度。

「這是壞翻這地步」，他對皮魯珂甫說：「我寫的時候，很少文學的良心，……這裏面沒有什麼可取的地方。」

不過懷這意見的，僅他一人而已。他的草稿，不具作者姓名而寄到俄國一個大雜誌 *Современник* (現代) 裏去，馬上就發表了出來(一八五二九月六日)，而且得到一般的成功。全歐洲的社會都保證這成功。然而，雖有豔麗的詩意，優美的筆調和微妙的情緒，晚年的託爾斯泰却對之甚表不滿，這是大家都知道的。

這作品使他不能滿意的理由，就在那使別人滿意之處。我們應該老實說：除了幾種帶地方色彩的人物的記述，以及在若干頁中觸着宗教感情或情緒的現實的表現以外(註三)，託爾斯泰的人格，在這作品裏却顯示得很少。洋溢於這作品的是一種溫和柔婉的感傷的情調，這是他從來所最反對而在寫別的作品時所排斥的。我們認識這作品，是認識其幽默和眼淚，這些是從迭更司而

來的。在十四歲和二十一歲之間，關於幾種隨筆，託爾斯泰在日記中指出「受迭更司的 David Copperfield 的影響甚大」。他在高加索，重新讀過這書。」

他又舉出別的兩種影響：斯坦因 (Sterna) [註四] 和戴輝 (Toepffer) [註五]「那時，我在他們的感應之下。」

誰會想到日內瓦小說集 (Nouvelles Genevoises) 乃是戰爭與和平的作者的最初的「模特兒」呢？但祇要一看幼年時代裏面，在一個貴族的性格中夾雜着一點純朴的深情和一點譏諷，就可以明白。

託爾斯泰，在開頭，看到自己是已為世人所見慣的一種姿態。但是，他的個性不久就表現出來了。少年時代一書 (一八五三)，比起幼年時代來，雖不純真，雖不完全，但已表現出獨創的心理，對自然的活潑的感情以及迭更司和戴輝所無的與痛苦相搏鬥的精神。在一個地主的朝晨中 (一八五二年十月) 託爾斯泰的性格，就完全形成了而表現出來，還加上他的大胆的觀察的真實和對於愛的信仰。在這小說中所描寫的許多令人注目的農夫的肖像，我們已經發現他的民間故事中的最美麗的幻想的草案：就是養蜂所的老頭子 [註六]。這小老人在楓樹下面伸着手，張着眼，禿

頭在陽光中發亮。身旁有許多可愛的蜜蜂，盤旋飛舞，但不去刺他，而且給他在頭上形成一頂王冠。

但是，這時期的代表作却要算那直接描寫他的目前的情感的高加索紀事。其第一部侵入（一八五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作成）。即以壯麗的景色使讀者感歎：山間的日出；河岸的日出；不可思議的夜景，連影子和聲息被以非常的強度描寫出來。晚上，當遠處的蒙着雪的山峯消失在紫色的霧中，歸村的兵士們的壯美的歌聲在透明的空中繚繞。許多戰爭與和平中的人物，在這裏嘗試着生活：例如隊長克羅波夫（Кропов），他的打仗，並非爲了高興而是爲了盡義務，他是「俄羅斯人的面貌中的一個，坦白、穩重、很容易而且歡喜直觀事物。」笨重、愚拙、帶點滑稽，不關心周圍的一切，別人在作戰時要起變化，他一點也不變；「他正如人們一响看慣一般，同樣安靜的動作，同樣平板的聲氣，在他的老實笨重的臉上是同樣單純的表情」，在他旁邊有一個中尉，在模仿萊蒙託夫的主人公的姿勢，面上裝着猶猛的神氣，但他是一個好男子。那個可憐的小小的少尉，對於自己的工作甚感興趣，湧現着溫柔，好像要去抱每一個人的頭頸似的，可愛而又可笑，像彼底埃。羅斯妥夫（Pétia Rostov）一般老是計劃着自殺。在這圖畫中間，作爲觀察者的託

爾斯泰的姿容，超越了他的同伴們的思想，已經使人聽到反抗戰爭的呼聲了：

「在這美麗的世界，在這繁星閃爍的天空下面，人們竟不能平和的生活麼？爲什麼，在這裏的他們，竟會存在着敵意，復仇的感情，以及同類相殘的那種忿怒呢？一切這些存在人心中的惡害，將因與自然的接觸，看到自然的美與善的直接的表現而會消滅的罷。」（侵入）

在這時期所觀察的高加索紀事，後來又有續作：即一八五四——五年的森林採伐，這是一種正確的寫實主義的，而且多少帶點冷酷的，但是充滿着俄國兵士的心理的奇妙的記錄——這待將來再說——一八五六年，出了一本分隊中所遇莫斯科一故人。這裏面，說一個墮落了的上流社會人，撤職的下士，怯弱的，酗酒的，說謊的，他不能像他所輕視的兵士們——實則這些兵士中最無用的也還比他好一百倍——中的一個似的想得到會被殺掉。

在這些作品之上，恰如一大山系中的最高峯的突聳一般，作爲最偉大的抒情小說之一，託爾斯泰著了他的青春之歌，高加索之詩的哥薩克。以光明的天空作爲背景，畫上高妙的線條的雪山之美，使這作品，全部充滿了音律。這作品，統體裝飾着天才之花，誠如他自己所云：是「青春期的全能之神」，「可一不可再的飛躍」。是怎樣的春之潮流，怎樣的愛之汎濫呵！

「我愛，我熱烈地愛！……一切都勇敢，一切都善！」他反復着，他並且想哭泣。爲什麼？誰是勇敢的？他愛誰？他不很知道」，(哥薩克)

這心的陶醉澎湃地奔流。主人公奧列甯 (Olenine) 也如託爾斯泰一般，來到高加索，經驗冒險的生活，而和一個年青的哥薩克女郎相戀，委身於種種矛盾的憧憬之中。有時候，他想：「幸福，就是爲他人而生活，犧牲自己。」別的時候，却想：「自己犧牲，不過是一種蠢事。」後來，他和高加索的老愛羅希加差不多地相信「一切都有價值。上帝爲了人類的快樂而創造萬物，無所謂罪惡。同一個少女玩玩，也不算罪過，倒是一種禮儀。」照這樣，爲什麼還用得着思想呢？祇要生活下去就是了。生活是好的，幸福的。人生是有力的，普遍的：人生就是神。一種熱烈的自然主義高舉靈魂而且蠶食靈魂。迷失在森林中，「在野生植物、成羣的鳥獸、紛集的蠅蚋之間，在暗綠中，在溫馨的空氣裏面，在茂葉之下到處波動的污濁的小水溝裏面」，離敵人的埋伏所二三步之遙，奧列甯「忽然被一種無故而起的幸福的情感所襲，照着兒時的習慣，劃着十字，向着誰表示感謝。」像印度教的苦行者一般，自言自語以爲樂；他是孤獨的迷失於他自己所興的生活的旋風中了；他說，躲在各處的無數不可見的存在物，這時候在窺視着他的死亡，他說，幾千萬

昆蟲在他四週嗡嗡飛鳴。他叫道：

「『來呀，都來呀，同伴們！這裏有一個可以給你們刺的人。』」

「顯然，在這裏，他已不是莫斯科社交界的俄國紳士，也沒有這般的朋友和親戚。他祇是簡簡單單的一個生物，和、蚊、雞、雉、鹿等等在他周圍生活着彷徨着的生物一樣。

「『我也像這些東西一般生，死。野草在我上面繁殖……』」

他的心裏非常歡喜。

託爾斯泰在這青春期內，生活在勢力的熱注和生命的熱愛裏面。他擁抱自然而且與之全然融合。在自然中，他傾注，他寄託，他發揚他的悲哀，歡喜和愛情〔註七〕。但這羅曼諦克的陶醉，並不減損他的透徹的觀照力。無論那裏，比在這熱烈的詩中描寫風景的力更強的，是沒有的，比在這裏所描寫的人物更真實的，也沒有的。自然界與人間界的對立，是此書的基調，亦為託爾斯泰一生的思想上最喜用的主題之一，而且也是他的信條（Credo）之一，他已經發現了在後來所著的 *Sonate à Kreutzer* 中用以叱責人間的喜劇的幾種辛辣的調子。

然而，對於他自己所愛的人們，他也不稍變其忠實的態度。對於自然的生物，對於美的哥薩

克女人，對於朋友們，他都明瞭地看出其自私、強慾、奸詐和惡德來。

最可注意的是，高加索給託爾斯泰啓發了他的生命中的宗教的深源。人們不大知道把這第一次「真理的精神的通告」公布。他自己曾祕密把這向他青年時代的知己，即年青的亞歷山大·安特烈夫娜·託爾斯泰姑母（Alexandra Andrejevna Tolstoj）表示過。在一八五九年五月三日的一封信中，他向她發布「信仰的宣言」：

「小孩子的時候」，他說：「我就虔誠地熱情地信仰了，但是沒有思索過。直到十四歲，我開始思索人生；而宗教與我的理論却不符合，我就把破壞宗教當作一種責任……我覺得一切都明白，各方面都是合乎邏輯的；至於宗教的地位，一點也沒有……後來，到來了一個時候，這時候，人生於我變成毫無祕密，失了一切意義。在這時候——在高加索——我很孤獨，我很苦痛。我用盡了我所有的智力，好像一個人在一生中祇能有一次的盡力……這是一個苦痛而又幸福的時間。前乎此或後乎此，我永遠不會達到過像那時候的思想的高度，我不會看到像那兩年中的深刻。那時我所追求的，後來成爲我的信仰……在那兩年持久的精神的工作中，我發現一個簡單而且古舊的真理，我於是知道（這是別的人所不知道的），有一種不朽，有一種愛，而且一個

人當爲他人而生活，才可以永遠幸福。這發現使我驚奇，因爲這很同基督教的教義相類。從此我不再向前探索，而從福音書中去研究了。但我所得不多，我找不到上帝，找不到救主，也找不到奇蹟，也找不到……然而，我用全部，全部，全部的靈魂的力追求，我哭泣，我苦悶，而且我不希望真理以外的一切……這樣，我就和我的宗教都成爲孤單……」【註八】。

【註一】 他那時寫給泰鐸娜姑母信中，充滿着含淚的感傷性，他自稱爲「哭泣者萊翁」。

【註二】 一個地主的朝晨是俄羅斯地主的傳記的一斷片；哥薩克是一大部哥薩克紀事的一部分。在作者意中，那龐

大的戰爭與和平，也不過是以十二月黨員作爲骨子的現代一大敘事史的序文而已。

【註三】 參看關於信女格利沙或母親之死的章句。

【註四】 英國十八世紀之僧侶，Humorist，文學家。

【註五】 瑞士小說家，著日內瓦小說集最有名。

【註六】 見二老人。

【註七】 「也許」奧列甯說：「我之所以愛那哥薩克女人，就是愛她身上的自然……愛着她她，我就感到某一部分不能

與自然分開。」他屢次把所愛的少女與自然相比較。

【註八】

在此信的結束處，他寫着：「請你了解我……我相信沒有宗教，人類就不能善良，也無幸福；我想把宗教比別的一切事物更重要的保存在世上；沒有宗教，我的心就枯燥了……然而，我却無所信仰。我以爲是生活給我們創造宗教，非宗教給我們創造生活……我現在心裏覺得很枯燥，很需要一種宗教。上帝佑我，這將來了……自然是帶我向宗教去的嚮導。每個靈魂有他的不同的和未知的路；人們祇在他自己的心底，能夠找到這路。」

第六章 「賽伐斯多玻里」

一八五三年十一月，俄國對土耳其宣戰。託爾斯泰被調赴羅馬尼亞軍中。後來又調赴克里米軍中，一八五四年十一月七日到了賽伐斯多玻里 (Sebastopol)。他的愛國的信仰狂熾，他勇敢地盡力勤務，幾度瀕於危險，尤以一八五五年四五月間，他每日三次勤務於第四稜堡的砲臺。

數月之間，他生活於不絕的戰慄和興奮之中，面對着死神，於是他的宗教的神祕主義復活了過來。他同上帝很親熱。在一八八三年四月的日記中，他記着對於上帝的禱詞，感謝上帝在危險中保護他，而且希望其繼續保護他。使他得能達到人生的光榮的永遠的目的，這個目的尙爲我所不認識的……但這時候的他的人生目的，絕不是藝術，而是宗教。一八五五年三月五日，他寫了下面的話：

「我嚮往一個偉大的理想。爲了實現這理想，我感到能夠奉獻我的全生涯。這理想，就是新宗教的建設，從基督教洗清了獨斷和奇蹟的建設……各人照明白的良心行動，使得全人類由

宗教而結合起來……。」（日記）

這是他的晚年的綱領。

可是，爲了注意到自己周圍的許多光景，他又動起筆來了。在電一般落着的砲彈下面，他怎樣能夠得到寫他的第三部回憶（青年時代）所必需的心的自由呢？這作品是雜亂無章的。全篇的不統一，時常模仿斯丹達爾一般區分了又區分的乾燥無味的抽象的解剖，都可以歸之於那時候的狀態之故。但是我們不能不敬服他那對於青年的頭腦裏面的紛亂的夢想和錯綜的思想的鎮靜的洞察。這作品，本身是很忠實的。而有時候，又是怎樣的富於詩的清新味啊，例如描寫都會之春的美麗的光景，懺悔的故事，爲了忘罪而往修道院的旅行！又於熱烈的汎神教，也給予數頁的優美的抒情。其中的調子使我們想起高加索的故事。例如下面所舉的夏夜的描寫：

新月的靜的光輝。明亮的池塘。古老的樺木的垂垂的長枝，在月光之下，一邊鍍上銀色，另一邊，則以黑影蔭蔽了草叢和小徑，鴉鶉的鳴聲作於池後。古木二株，互相輕拂，微聲可辨。蚊聲嗡嗡，蘋果落於枯草之上，青蛙躍上石階，其綠色之背閃爍於月光之下……素月流天，虛空皓潔，水面受光，益加輝煌；黑影愈濃，而光輝愈見透明，……我雖是一個卑微的生

物，且已被人間的情慾所污，然以全部偉大的愛之力，似覺自然、明月與我，此時已合而為

一。(青年時代)

然而現在的事實的語聲高過於已逝的夢境。這逼迫得青年時代不能完卷。二等大尉的託爾斯泰伯爵，於砲臺後面，大砲聲中，觀察他的中隊裏面的生者和死者，而把他們的和自己的痛苦寫在令人難忘的「賽伐斯多玻里」紀事裏面。

這三部紀事——一八五四年十二月的賽伐斯多玻里、一八五五年五月的賽伐斯多玻里、和一八五五年八月的賽伐斯多玻里——普通是混同在同一判斷之下的。實則，頗有相異之點。特別是第二部，其情感及技巧遠勝其他兩部。那兩部被愛國心所支配：在第二部，則飛揚着不移的真理。

讀了第一部的紀事，皇后感動得哭了，沙皇於賞讚之餘，下詔叫把此書譯成法蘭西語，且命使作者離開危險區域。這事是很可相信的。在這書裏沒有一頁不稱揚戰爭和祖國。託爾斯泰恰好到來了；他熱心十足的，浮於英雄主義的潮流中。他對於賽伐斯多玻里的防禦者，還看不出野心和虛榮心、卑陋的感情之處。在他，戰爭是一首崇高的敘事詩，其中的英雄是無愧於希臘的。

他方面，這些記錄不見得有何想像上的努力和客觀描寫的企圖；作者經過城市，觀察得極明白，但在一種缺乏自由的形式之下敘述出來：「諸位看呀！……諸位進來呀……諸位注意呀……」這樣說着，這是具有自然的美的印象的堂堂的記錄。

第二部，即一八五五年五月的賽伐斯多玻里的場面，却全異其趣。在開頭的幾行，我們就讀到：

「數千人的自愛心在此地搏鬥着，有的已經在死亡中得到安慰了……。」

更後面：

「……這裏有許多人，就有許多的虛榮心……虛榮心，虛榮心，到處都懷着虛榮心，甚至於到了墓門！這是我們這一世紀的特有的病症……爲什麼荷馬們、莎士比亞們都談着愛情、光榮、苦痛，而爲什麼我們這時代的文學家，却只是驕蹇勢利之徒們的無窮的傳記呢……？」

這不僅是作者的單純的報告，且係在大衆之前展開吾人及吾人的情熱的作品，曝露了隱在英雄主義的假面之後的東西，託爾斯泰的明瞭的揭穿祕密的眼光，透入他的武裝的同僚們的心底；在他們心裏如同在自己心底一般，讀到驕傲恐怖，看到死已臨頭尙在扮演的人間的喜劇。尤其是

那恐怖，完全揭去了假面，赤裸裸地暴露了出來。這不絕的恐怖，這死的糾纏，被以毫無顧慮毫無同情的可怕的真實解剖出來。在賽伐斯多坡里，託爾斯泰纔失去了全部的感傷主義以及他輕侮地說着的「漠然的女性的哀泣的感情」。他的分析的天才，雖是他少年時代已見發揚的本能而且有時常帶病態的性質，但決沒有達到像記述普拉斯庫金（Praskoukhine）時一般的敏銳和強的幻覺。有兩大頁，完全記載一個落下的砲彈將要爆發以前的一秒間的這不幸的人的心理狀態。——有一頁則記載彈丸已經爆裂「他的胸部受了破片的一擊，因而致命」時的他心中所起的變化。

如同舞臺上幕間的管絃樂似的，在這戰爭的舞臺中插入廣大的自然的短片，光明的間隙，以及出現於千萬人苦惱着的壯麗的景色之上的黎明的 *Symphonie*。基督徒的託爾斯泰，忘却了他的第一部記事中的愛國心，而詛咒起那不合乎宗教的戰爭來：

「這類人，表面上也是掛着奉行愛與犧牲的大法則的招牌的基督徒，但是看了他們所做的惡事，並不在賦給他們以生命，在各人心中納入一個靈魂，使之恐懼死，愛好善與美的上帝之前，後悔地跪下來！並不像同胞一般地，流着歡喜和幸福的眼淚而互相擁抱起來。」

當快要寫完這部具有別的作品所無的辛辣味的小說之際，託爾斯泰忽然感到一種疑惑，就

是他的話到底是否有錯誤呢？

「我被一種懷疑所困惑。也許不應該說這些話。也許我所說的是無意識地隱藏在各人的心中的可怕的真理，但是好像恐怕葡萄酒會變壞，所以不可攪動他的渣滓一般，這種真理，爲了不使他變壞起見，也不應該使之暴露出來罷？何處有應該避免的惡的表現呢？何處有應該模仿的善的表現呢？誰是作惡者，誰又是英雄？一切皆善而一切又皆惡……」

但他終於毅然打定了主意：

「我的小說中的主人公，我用全部靈魂的力愛他，我努力表現出他的全部美質，而且他在過去和將來永遠是美的，這非別個，就是『真理』。」

讀了這幾頁之後〔註一〕，現代雜誌的主幹奈克賴索夫(Nekrasov)寫給託爾斯泰一封信用：

「這纔正是對於今日的俄羅斯社會所必需的：真理，真理。自果戈里(Gogol)去世以來，俄國文學中是很少留下真理了。……你所提供於我們的藝術的真理，對於我們是全新奇的！……我只怕一件事，就是現今的時勢和生活上的卑劣，圍繞於我們四周的一切人的癡聾和暗醜，要來陷害你，像陷害我們之中的許多人一樣。——恐怕他們來摧殘你的毅力。」（一八五五

年九月二日)

這倒不是慮的。消耗了普通的人們的精力的時代，對於託爾斯泰，反而鍛鍊他的精力。但有一時，當祖國陷危，賽伐斯多玻里失陷之際，他和痛苦憐憫的感情一同，對於自己的過於無情的率直，惹起了後悔。

在第三部紀事——一八五五年八月的賽伐斯多玻里——中，他描寫一羣賭博着喧嘩着的士官。他忽而中斷了說：

「對於這光景趕快遮掩起來罷，一到明天，也許就在今天，這班人都將歡歡喜喜地同死會面了。在每一個人的靈魂的深處，都涵着將使他成爲英雄的高尙的閃光。」

這種潔癖，雖然決不會減削他的小說中的寫實主義的力量，但是人物的選擇，却很表示了著者所懷的同情。馬拉珂夫(Malakov)的敘事詩，及其英雄底的陷落，象徵着兩個可感歎的豪膽的人物，那是兩兄弟，爲兄的科萃爾佐夫(Kozeltsov)，帶幾分託爾斯泰的性質【註二】。爲弟的旗手伏羅第亞(Volodia)是怯弱的、熱心的，常常興奮地自言自語，常作夢想，無故地眼裏流出淚來，溫柔的淚，謙遜的淚，最初幾點鐘在砲臺時所感到的恐怖（這可憐的小子，睡覺的時候還害

怕黑暗，把頭鑽到外套裏面去），他感到自己的孤獨，感到別人的冷淡而引起的苦惱，等時間一到，他在危險中感到歡喜。這人是屬於少年期的詩的人物的一團的，（如戰爭與和平中的彼得埃（Peter）侵入中的少尉）這類人，心中充滿愛情，含笑而作戰，而不明不白地突然斷送其性命。那兩兄弟在防守的最後一天，同時負傷而倒了，這小說就以咆哮着愛國的熱情的數行作結：

「軍隊離開了城市，每一個兵士望着失守了的賽伐斯多玻里，心中含着說不出的悲苦，太息着向敵人伸着拳頭。」

【註一】這幾頁被檢察官所刪除。

【註二】「他的自愛心和生命混亂了起來，他此起彼仆地想着：或者取前者，或者毀滅自己。但他同別的許多人比較了一下之後，他歡喜自己是前者方面的人。」

第七章 聖彼得堡

出了一年來接觸着人間的極端的熱情、虛榮以及悲哀的地獄，託爾斯泰於一八五五年十一月，投身於彼得堡的文學家們之間，這時，他對於這些文學家們起了幻滅和輕蔑之感。他把他們都看作卑劣而虛偽。這些人們，他遠遠地望見，似乎是在藝術之光裏面的——屠格涅夫，是他所尊敬的，他最近曾將森林探伐獻呈——接近一看，却使他痛苦地失望。一八五六年的一張肖像，他也參加在這羣文學者裏面：屠格涅夫、恭且洛甫（Gontcharov）、奧斯特羅斯基（Ostrosky）、格利哥羅微支（Grigoryevich）、特魯齊寧（Drouzhine），他落落地在別人的淡漠的態度之間，持着禁慾者的堅苦之狀，突兀的頭顱，陷進的雙頰，難看地叉着雙手，他穿了軍服直立在文學家們的後面，恰如蘇亞萊洒落地所說：「與其說他是他們團體裏的一個同道，不如說像是監督着這些人：要把他們送到牢監裏去似的。」

但是這班文學家們，對於這新來的，圍繞着賽伐斯多坡里的作者和實際的英雄這二重光榮的

年青的同道，實在都很殷勤。屠格涅夫讀了賽伐斯多玻里的諸頁之後，「哭着叫起萬歲來」而要
求兄弟一般地握手。然而這兩個人彼此不能理解，兩人雖以同樣的明白的眼光觀照世間，却把相
反的心的色彩混入他們的觀照的結果：一個是諷刺的、反響的、多情的、幻滅的、美的信徒；而
另一個却是激烈的、傲慢的、爲道德觀念所苦的、胸間祕密地隱藏着神的。

最爲託爾斯泰所不能原諒的，是這班文學家們都以優秀階級、人類之王者自居。他在對他們
的反感之中，常以一個大貴族以及陸軍士官的資格，對着這班自由的中流階級的文士們誇耀。這
也是他的特質之一——他自己說「對於一般人所承認的一切判斷、一切結論，都本能地要反對。」
不信任人們，暗自輕蔑人類的理性，這種態度，常使他處處發見自己和他人的虛偽〔註一〕。

「他永不信任別人，一切道德的飛躍，他都看做是虛偽的，并且他慣用特別尖銳的目光，
釘住那他疑心是不說真話的人……」（屠格涅夫）

「他是多麼地留心傾聽呵！他是怎樣地用深陷在眼眶裏的灰色的眼光釘住他的交談者呵！
他以多麼譏諷的樣子緊閉着他的嘴唇呵！」（格利哥羅微支）

「屠格涅夫嘗說，從沒有經驗到比碰到這尖銳的眼光時更難過的感覺過，這眼光，再加

上兩三句有毒的試探的話，能夠使人激怒。」（迦爾洵（Eugène Gardine）：關於託爾斯泰的

回憶）

託爾斯泰和屠格涅夫初次見面，就激烈地吵鬧了一場。以後大家冷靜下來，力謀彼此的諒解。然而和時間的進展一同，託爾斯泰對於文壇的嫌忌益益深刻起來，他對於那些墮落的生活和虛偽的道德集於一身的藝術家們，不能寬恕。

「我有一種確信，差不多一切人都是不道德、不健全、無品格的，比我在軍隊生活中所遇到的人們更下流。但他們自己，當然也和健康的人們一般覺得很滿足的。我討厭這些東西！」

（我的懺悔）

他遠離這些人，然而他有時也懷着和他們一樣的對於藝術的自私的信念，他的驕傲心在此又起來了。這是一種報酬豐富的宗教，他能夠供給「女人、金錢、光榮……。」

「在這宗教中，我成了一個教皇，我的地位愉快而有利。」

因為他預備專心於這宗教，他提出了退出軍籍的請願書。（一八五六年十一月）
但像他這般脾氣的人，是不會長久閉上眼睛的。他相信，他深切地相信進步。他覺得，進步

「這字是表示着某種意味的」。但在一次外國的旅行，——一八五七年一月二十九日到七月三十日游歷了法蘭西、瑞士和德意志之後，使他的這種信念破壞了。一八五七年四月六日巴黎的公開死刑執行的光景「使他覺得所謂進步這一種迷信是空虛的……。」

「當我看見一顆頭顱，離開身體落在籠中之時，我以全部生命中的力量，明白了沒有一種關於現存的事物的道理的理论能夠證明這種行為是合理的。假令全世界的一切人，依據某種理論，認此種行為是必要的，那麼我一個人要說這是不對的：因為決定某物的善與惡的，不是人們的言和行，而我自己的良心……。」（我的懺悔）

一八五七年七月七日，在呂塞納（Luorne）看到一個漂泊的歌者，向寓居修維柴爾阿甫（Sohwizenhof）的英國富翁們求乞而被拒絕，他就在南克留獨夫公爵日記中記着，表示看不起自由主義者所喜的一切幻影以及「在善惡的海上劃着想像的線」的人們。

「在他們，文明是善的；野蠻是惡的；自由的善的；奴隸制度是惡的。而這些想像上的知識，却把那本能的，根本的最好的要求破壞了。而且，誰能給我說明到底什麼是自由，什麼是專制，什麼是野蠻，什麼是文明呢？到底在什麼地方善與惡不是共存着的呢？在我們祇有唯一

的確實的指標，就是那「普遍的心靈」，這心靈鼓吹我們，使我們彼此親近。」

回到俄國，在耶斯耐耶重新為農民幹起事來，這一次，他對於農民，並不是懷抱着何種的幻影，他在南克留獨夫公爵的日記中寫着：

「民衆及其善良性的辯護者們不得要領地說，羣衆也許是善良的人民的結合。縱使如此，但他們的結合，却是由禽獸的、可鄙的、現着人間性的卑弱和殘忍這一方面結合起來的。」

因此，他現在並不以羣衆為對手，而訴諸每人的，每個人民的孩子的個人的良心。因為在這裏纔有光明。他設立幾所學校，但他不大懂得教育。爲了這，他再度遊歷歐洲，從一八六〇年七月三日出門，一八六一年四月二十三日回來。

他研究種種的兒童教育制度。我們需要說一說他拋棄這一切教育制度這事麼？兩次馬賽的訪問，使他覺得真正的教育當求之於可笑的學校以外，如新聞雜誌、博物館、圖書館、街路、日常生活，這些處所，他名之曰「無意之間的教育」或「自發的教育」。這種自發的教育是與他所認為不祥的兒戲的強迫教育完全相反的。他回到耶斯耐耶·玻里安那之後，想試辦這種教育。他的原則是「自由」。他絕不承認一個優秀階級「自由的特權階級」把他們的知識和謬誤強迫地灌輸於在他們

認爲風牛馬不相關的民衆。他們沒有這樣的權利。照那種強迫的教育方法，大學裏面，永遠不能產生「爲人類所需要的人」而祇能產生「爲墮落的社會所需要的人們，如官吏、御用教授、御用文學家。或者成爲毫無目的地被引放於古舊的環境，腐蝕其青春，對於生活毫無計劃的人們：多愁多病的自由主義者。」（教育與文明）到民間去，教給他們所需要的！倘若他們不看重「知識階級所強制他們的那種讀書法」，自有他們的理由：他們有更緊要更正當的精神上的需要。應該努力去理解他們，幫助他們，使他們滿足！

這一種革命的保守主義者（他常常是如此的）的自由的理論，託爾斯泰企圖在耶斯耐耶·玻里安那實施一下，與其說他做了學生們的教師，還不如說他做了學生們的徒弟。同時，他努力把新人的精神導入農業的開發。一八六一年他被任爲克拉比甫那（Крaпивнa）地方的土地管理者，他做了反對地主及國家的權力濫用的人民的代表者。

雖然，我們不能就以爲這些社會的活動已經使他滿足，已經充實了他的全部生活。他還不絕地被相反的情感所誘引。他雖於世間有所苦悶，但他常常愛世間，且覺有愛世間的必要。有時候，快樂來誘惑他，有時候又嗜好活動。他嘗冒了喪命的危險去獵熊。他嘗浪擲巨款於賭博，而

且，他曾受了他所輕視的彼得堡的文學的環境的影響。方從這些迷妄中脫身，他又陷於厭倦的危機中。這時期的諸作品，留下藝術上道德上的游移的痕跡。兩個驃騎兵（一八五六），含有許多優美的虛飾和一種自負而浮薄的態度，這態度本來是託爾斯泰所厭惡的。一八五七年在第戎（Dijon）所寫的亞爾培，是疲弱的、畸形的，失去作者常有的深刻和正確。計數人的日記（一八五六），雖較前為優；但是速成的，似乎表現着託爾斯泰對自己所感的厭棄。南克留獨夫公爵，即他的 Dophelgänger，他的二重人格，自殺在賭場上……

「他占有一切！富，名譽，智慧，高的野心，他不曾犯過什麼罪；但他做了最惡的事；他殺了他自己的心，他的青春；他自行滅亡了，並無什麼強烈的情熱作為口實，祇是因為意志的缺乏。」

甚至死已臨頭，他仍不變……

「同樣的矛盾百出，同樣的猶豫不定，同樣的思想飄忽……」

死！……這時代，她開始闖入託爾斯泰的心中來了。三死（一八五八——九）已經披露了伊凡·伊力奇之死的陰鬱的分析，瀕死者的孤獨，對於生者的憎恨以及他的「為什麼？」這絕望的

覺問。三個人的死——富家的太太、患肺病的老馭者和伐倒的楓樹……這三幅圖畫可稱大作！人物是描寫得很好的，比喻是很動人的。倘若吹毛求疵地說來，這作品的結構上，未免有多少的毛病，那描寫楓樹之死一段，也缺乏一種，足以見出託爾斯泰描寫美麗的風景的手段的正確的詩意。這作品的全體，到底是作為「為藝術的藝術」的作品的呢，抑是含着道德的作用的呢？我們還不明白。

託爾斯泰對於自己也不了解。一八五八年二月四日加入「俄國文學同好協會」時的他的演說，是給「為藝術的藝術」辯護的；該協會的會長，珂米亞諾夫（Khomiakov），於尊他為「純藝術的文學的代表」之後，即站在與他相反的立場，為社會的道德的藝術作防禦戰。（他提出託爾斯泰自己的例子，即三死中的老馭者，來反駁託爾斯泰）。

一年之後，他的親愛的哥哥尼古拉在依愛爾（Иверна）因肺結核致死【註11】，時為一八六〇年九月十九日。這使託爾斯泰的「對於善，對於一切的信仰」起了動搖，而且使他否定了藝術：

「真理是可怕的……無疑地，人們是照他所要知道真理、說明真理的願望的程度，努力地
去懂得真理、說明真理的。這就是賸在我的道德的概念中的唯一的東西了。這是我將來要做的

唯一的事了，然而決不是在你所說的藝術的形式之下去做。所謂藝術，是說謊的，我不能再愛那美麗的說謊了。」（一八六〇十月十七日致輝脫書）

然而，不到六個月之後，他又回復到「美麗的說謊」來了，這時的玻里庫希加，也許是他的作品中最沒有道德的作用的，除了對於金錢和不祥的權力的潛在的呪詛以外，是純粹爲藝術而作的作品，同時也是一篇傑作，假使我們一定要找缺點，那祇能找出他的觀察太豐富，材料太多，夠做一篇長篇小說，以及那結局的殘酷和開端時的諧謔對照之下，未免太嚴刻而且有點惡毒〔註三〕。

【註一】「我的特質之一，不管他是好的或壞的，但終歸是我的一種特質，我常常反抗外部的感激的勢力……我憎惡所謂一般的傾向。」（致皮管珂甫書）

【註二】我們記得託爾斯泰另一兄弟特米德里是死於肺病的，在一八五六年。託爾斯泰自己覺得被傳染了，當一八五六年，一八六二年和一八七一年諸時期。照一八五六年十月二十八日所寫，他是「體格強壯而健康虛弱」。他時常傷風、喉痛、齒痛、眼病、筋骨痛。一八五二年在高加索，「每週中至少兩日，不能出門。」一八五四年，自西里斯特利至賽伐斯多坡里途中，患病數月。一八五六年在耶斯耐耶肺部常病。一八六二

年，恐被肺結核所害至撒馬拉受馬乳治療法，寓於 Barthelme 家。一八七〇年後始回，他與輝脫的通信中充滿了這些的顧慮。因此，我們更容易明白他對於死的見解。後來，他說到他的病，如同一個最要好的朋友似的。

「一個人生了病，好像極緩極緩地走下一個斜坡。在某處，好像被一幅幕，一幅薄布製成的軟幕所罩；這邊是生，那邊是死。在道德的價值上，病的狀態是遠勝於健康的狀態的，不要對我說起從來沒有生過病的人！那是很可怕的，尤其是女人，一個極健康的婦人，一定是個真的野獸。」（與保爾·鮑耶的談話，時代所載）

【註三】這時期的另一篇小說，一篇簡單的旅行記即吹雪（一八五六年），喚起他個人的許多回憶，充滿着詩的印象，及音樂的印象的豐富的美質，後來作主與僕時，託爾斯泰又採取這篇中的一些背景。

第八章 家庭的幸福

這過渡時代，託爾斯泰的天才摸索着進路，他懷疑自己而且有點疲倦，正如計數人的日記中的南克留獨夫一般，沒有強烈的熱情，沒有指導意志」的時代，產生了從來沒有過的最純粹的作品：家庭的幸福（一八五九）。這是愛之奇蹟。

多年以來，他是倍爾斯（Bers）一家中的親密的朋友，他輪流地被這家的母親和三個女兒所愛慕。而他的心，却落在那第二個女兒的身上，但他不敢表示。那時的莎菲·安特烈夫娜·倍爾斯（Sophia Andreyevna Bers）還是一個孩子，只有十七歲；他比她大十三歲；他自視已是一個老人，他以為沒有權利把他已經衰老污穢的生活去和一個天真的少女的生活相結合。他猶豫了三年〔註一〕。後來在婀娜小史中，他記述着怎樣向莎菲·倍爾斯表示，她又怎樣的答覆他。——兩個人都用了粉筆在黑板上寫出他們所不敢說出的字的第一個字母。恰如婀娜小史中的萊汶納（Levine）一般，他以一種殘酷的正直，把他私人的日記給他的未婚妻看，要她明白他自己過去的一切恥

辱；也如婀娜小史中的吉第（Giitty）一般，莎非讀了這日記感到一種酸苦的悲哀。一八六二年九月二十三日，他們行結婚禮。

但在三年以前，寫家庭的幸福之際，這婚姻已經在詩人的思想中成就了。三年以來，他已經提前生活在不甚清楚、不能形容的愛情的日子中，和顯然已被愛情所陶醉的日子中，而且，那期待着的私語喃喃吐露的時間，那「一去不回的幸福」的流淚的時間，那結婚之初的得意的事實，那對於戀人的自私，那「無端的不斷的歡喜」，還有，那將來的疲倦，那漠然而起的不滿，那對於單調的生活的憎嫌，兩個結合的靈魂的漸漸地分散離遠，社會上對於女人的危險的微醉——冶容，嫉妬，劇烈的糾葛——單戀，失戀；最後，那心理上的悲傷軟弱的秋季，那蒼白了起來，衰老了起來，容易感動得哭泣的，打皺了的愛情的姿容，初結婚時的回憶，對於過去幾年所作的惡事的後悔——夜的靜肅，由愛情變成的友誼的嚴肅的過程，從情熱浪漫變到母性的來由……一切這些將要來的事物，託爾斯泰完全提前夢想着而且玩味着了。而且，爲了要最好的生活下去，他就生

活在她——他的愛人之中。是第一次——也可以說是託爾斯泰的著作中唯一的一次——他的小說通過女人的心而且由女人來敘述，多麼的精巧纖細呵！一個精神的美罩上一層純潔的面網……在

託爾斯泰的解剖中，這一次，並不用生硬的觀察，也不興奮地把真理赤裸裸地揭示出來。內部生活的祕密讓他自然地演化，並不直說出來。託爾斯泰的藝術的心是平和下來了。形式和思想保持調和的均衡；家庭的幸福實有拉西奴（*Halime*）的作品的完成性。

結婚，託爾斯泰已經深刻明瞭地豫感到甘苦的結婚，成爲他的一種救濟。他是疲乏了，病了，憎厭了自己和自己的努力了，他所造成的初期的作品的華美的結果，對於批評家們，却只落得絕對的沉默，對於大眾，也只得到淡漠。他高聲地裝出高興的樣子說：

「我的聲名失了許多威信，這事曾使我憂鬱。現在，我是安心了，我知道我說了許多事情，而且我有高聲述說的力量。至於大眾，他們高興怎樣想，隨他們怎樣想去罷！」（日記）

他雖然自誇；但對於他的藝術，連他自己也不能無疑。自然，他是文學的工具的支配者；但他只知道使用他的工具。譬如關於玻璃庫希加，他曾說：「這是一個曾握筆的人對於最初到手的題材的饒舌。」他的社會專業，得不到什麼結果。一八六二年，他辭去土地管理者之職。同年，警察來到耶斯耐耶·玻里安那搜索他的家宅，騷擾一切，封閉學校，託爾斯泰於是離開家庭。他是太疲勞了；又對肺病發生恐怖。

「管理上的紛擾，對我變成這樣棘手，學校的工作又這樣曖昧，想教育別人，而自己不懂得應該教些什麼，而又非把這種無知掩飾起來不可，由此而生的懷疑，又這樣的使我失意，我終於病到了。也許我在那時竟會陷入十五年後所陷的那種絕望，假使沒有生活的未知的一方面來救援我。這生活的另一方面，便是家庭的生活。」（我的懺悔）

【註一】 看家庭的幸福中的舍爾該的表白：

「假使有一個男子A，是一個年事已長，經驗過生活的人，另有一個女子B，年青幸福，不懂人事。後來，因種種家庭的環境，他愛她像是自己的女兒，但不想到可以有別種愛的方式……」

第九章 「戰爭與和平」

最初，託爾斯泰以對於任何事所與的熱情，享樂其新生活〔註一〕。託爾斯泰夫人的個人的影響，對於藝術是很可貴的。懷着很厚的文學的素質〔註二〕，她是，如她自己所說似的「一個真正的女作家」，她非常認真地幫助其夫的事業。她和他一同工作，她筆錄他所口授的話，她謄清他的草稿〔註三〕。她努力防禦他的宗教上的魔鬼，這可怕的魔鬼已經時時幾乎把藝術吹得熄滅。她努力把向着社會的烏托邦的門關閉起來〔註四〕她激勵起他的創作的天才。她的貢獻尙不止此，她對於這天才供給了她的女性的靈魂以新的潤澤。除了幼年時代和少年時代的幾個美麗的女性的影響以外，託爾斯泰初期的作品中，差不多是沒有女人的，即有之，也不過作爲配角而已。女性，在對於莎菲·倍爾斯的戀愛的影響之下，始現身於家庭的幸福中。此後的作品的人物中，就很多少女和婦人，而且她們也如男子一般有着緊張高尚的生活的。有的人僅以爲託爾斯泰夫人對於其夫，不過做了戰爭與和平中的娜泰霞〔*Natasha*〕〔註五〕婀娜小史中的吉第的「模特兒」而已。實

則，以其信賴及其固有的觀察力，她還做了他的珍貴的慎重的合作者。婀娜小史〔註六〕中的許多篇幅，洩露着似乎女性的筆觸。

蒙了結婚的蔭，託爾斯泰在十年或十五年間，享受着久未經驗的平和與寧靜。是時〔註七〕，在愛的翊衛之下，他纔能夠有暇夢想他的意中的大作，而且使之實現，即君臨十九世紀的小說界的巨大的紀念碑：戰爭與和平（一八六五——一八六九）和婀娜小史（一八七三——一八七七）

戰爭與和平實爲我們這時代最巨大的史詩——現代的 *Iliade*。這裏面活動着網羅了各式人物各式情熱的世界。在無數的波濤洶湧的大洋中，君臨着一個至高至大之心，他鎮靜地激動着又約束着風暴，指揮如意。

不止一次，當觀察這作品之際，我就想到荷馬和歌德，雖在時代上精神上大有區別。此後，我發現託爾斯泰着手這作品之時，在思想上確曾得了荷馬和歌德的乳哺〔註八〕。還有，在一八六五年的手記中，他區分文學的種種部門時，他把 *Odyssee*，和一八〇五年……〔註九〕列在一類。他的精神的自然的發展，引導他從個人的運命的小說趨回軍隊和羣衆，無數人的意志融合着的人類的大集團的小說。在賽伐斯多玻里之圍時所得的悲劇的經驗，助他理解俄羅斯的國民精神

及其向來的生活。那巨大的戰爭與和平，在他的計劃中，不過是一大串敘事詩的壁畫裏面的中心鏡板。在這壁畫中，展開着自彼得大帝以至十二月黨員的俄國的詩篇〔註十〕。

若要真實地感覺這作品的力量，必須充分考究其隱然的統一。多數的讀者，有點近視，只看見這作品中的無數的枝葉，這些枝葉的繁複，已經使他們眼花撩亂口難言。他們在這人生的森林中迷了路。我們應該站在高處，把遼廓的水平線、森林和牧場的廣大的分野，完全收入眼底，然後方能看清這作品中包含着荷馬的精神，靜伏着不朽的法則，有運命的呼吸的調整的律動，有統率一切枝葉的整個的感情，而且，可以看出如同飄浮於大洋的水面上的創世紀之神一般的，支配着全書的作者的天才。

開場時，是風平浪靜的大海，是和平，是戰爭的前夜的俄羅斯社會。最初的百頁中，以不可移動的正確和高妙的諷刺，映現着俗人們的靈魂的空虛。到了那一百頁之際，就發出那些活死人中間的最下流的一人巴西爾公爵(Basilie)的叫聲·

「我們犯罪，我們欺騙。爲什麼要這樣呢？我活了五十多歲了，我的朋友……一切將由死而結束……死，多麼可怕啊！」

在這些無味的、說謊的、怠惰的、做得出一切不法行爲、善於犯罪的人們中間，並不是沒有比較健全些的性質，例如：——誠實的人，如比愛爾·倍斯珂夫 (Pierre Besoukhov) 的愚直天真，如瑪麗·特米脫利夫娜 (Marie Demitrievna) 的澈底的自立精神，和古俄羅斯式的感情，如羅斯安夫 (Rostov) 們的青春的純潔的性情；——如馬利公主一般的善良忍從的性情；——還有像安特來公爵一般，雖算不得善良，却是高傲，常因生活的不健全而發生苦悶的性情。

接着是波濤的怒衝，是行動，是俄羅斯軍隊向奧地利進擊。天命主宰着，在根本的勢力放縱的時候——在戰爭中，沒有比天命更大的主宰。真正的領袖們，不務在指揮、統領，而是像庫都佐夫 (Koutousov) 或巴格拉辛 (Bagration) 似的「相信他們的個人的意圖，能和真正的環境之力所生的單純的結果，部下的意志，以及偶然的機會相一致」的人們。最好是聽憑運命之手去擺布！因純潔的行動而得福，是正常而健全的狀態。……那些惱亂的人重新得了平衡。安特來公爵呼吸着，開始生活……但同時在後方，遠距這神聖的風景的活潑的吹噓之處，比愛爾和馬利公主，正被他們的世界的傳染病，愛的魔障所脅迫，而安特來，在奧斯推利茨受了傷，於行動慌惚的狀態中，起了劇烈的變化，突然得了廣大無邊的澄澈的宇宙的啓示，向天空仰着頭，「他除了高高在

上的無邊的深空，有灰色的雲軟軟地輕輕地飄着以外，一無所見了。」

「何等的寧靜！何等的和平，他說——爲什麼我在以前不曾注意到這高高的天空呢？現在被我望見了，多麼幸福呵！是了，一切皆空，一切皆偽，除了這天空之外……除此以外，實無所有……上帝也在讚美這天空呢！」

然而元氣回復了，波瀾低落了。那些失了勇氣的不安的人們，重新墮入都會的腐敗的雰圍氣中，盲目地在黑暗裏面彷徨。有時候，在混合着自然的、春的、愛的、盲目的力的蠱惑人的刺激的那人間的毒焰中間，使得公爵安特來與娜泰霞接近起來，過了不久，她就被那種盲目的力吹入第一個誘惑者的手腕中間。多麼的富於詩意，多麼的富於溫柔，多麼的潔白的心呵，雖然是生於塵世的污濁之中！而且，常如「高懸於卑賤恥辱的大地之上的偉大的青天」。然而，人們不會看出這種好處。甚至安特來公爵自己也忘掉了奧斯推利茨的光明。在他看來，天空又只是「一個昏暗而呆板的穹形」，蓋在虛無之上而已。

然而，在這些卑污的人們上面，戰爭的颶風又起來了，祖國已被侵略，於是莊嚴偉大的鮑爾第諾（Borodino）的戰鬥開始，在這之中，彼此失了敵愾心。陀羅哥夫（Dolgorukov）擁抱他的仇人比

愛爾。受傷了的安特來，對於野戰病院中的鄰人，那不幸的男子安那托爾·庫拉金（Anatole Koraguine），流着仁慈憐憫的眼淚，這原來是他所最恨的人。心和心的結合，是由爲祖國犧牲的熱情以及服從神聖的法則這一念而完成了。

「鄭重地大膽地承認恐怖的戰爭的必要……最艱難的嘗試，是把人類的自由爲神聖的法則而犧牲。能夠服從神的意志的人，纔有單純的心。」

俄羅斯人的精神以及對於命運的從順性，具現於總司令官庫都佐夫的人格之中：

「這個老人，已經沒有熱情，祇懷着熱情結果的經驗，在他綜合許多事實，從中引出結論的這種知識，已被一種對於事件的哲學的冥想所代，他毫無發明，也無所企圖；然而他傾聽一切，記憶一切，他知道把握最適當的時間，不使對於利益有一點妨害，不許做出一點無益的事，他在他的部下的面上察見一種不能說明的力，即征服的意志，未來的勝利，他承認那種他自己的意志更強的東西；即橫在眼前的事實的必然的進行；他看到這，他跟着這，而且他知道如何使自己成爲出類拔萃的人。」

一言以蔽之，他有一個俄羅斯人的心。這種沉着地英雄底的俄羅斯人的宿命觀，也表現在一

個貧賤的農民柏拉東·卡賴退夫(Platon Karaitay)的性格上，他是單純的、敬神的、從順的，在痛苦和死裏面也含着微笑的。通過了苦痛的經驗，祖國的廢墟，死亡的恐怖，書中的兩個主公比愛爾和安特來，達到了道德的解脫和神祕的喜悅，由愛與信仰，他們看見了活現的神。

託爾斯泰寫到此處不曾就擱了筆。這個寫到一八二〇年的結局，不過做了向另一時代推移的接筭，即從拿破崙時代推移到十二月黨的時代。他給人以生活的再始及繼續的情感。不用在危機中開始又在危機中結束的方法，託爾斯泰用的是開始於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之際，也在這樣的時候結束。我們已經看見書中的主人公要來了，他們中間的爭鬥已經起來了，而且那些死人已經在生人中間再生了。

我努力作出這小說的輪廓來了，因為這事是很少人做的。然而，對於這數百的人物，被以難忘的巧妙描寫着的這一切各有其特色的人物，有軍人、有農民、有大貴族、有俄羅斯人、有奧地利人、有法蘭西人，我們怎樣纔能夠說出他們的生活的異常的力量來呢！這裏面沒有一點是草草動筆的。爲了這歐洲文學中空前的肖像畫的陳列室，託爾斯泰曾經作了無數的草案，如他自己所云：「組合了數百萬的計劃」。曾經埋身於圖書館，安排他自家的古文書，先前的手記，以及個

人的回憶。這種種細微的準備，足以保證他的作品的堅實，却未曾絲毫減少其自然性。託爾斯泰興奮地工作着，以其熱心和歡喜與讀者相交感。特別使戰爭與和平成爲最富於魅力的，是他的青春的意氣，這同樣是託爾斯泰的作品中富於幼年時代和少年時代的精神的一部；而且，每一個人物都是一曲音樂，一股流泉，一種莫差爾德(Mozart)的旋律似的動人的優雅；如年老的尼古拉、羅斯妥夫、梭尼亞(Sonia)、可憐的小彼蒂埃。

最秀麗的是娜泰霞，是可愛的小女孩，空想的、喜笑的、心中充滿着愛。使我們懷着對於自己姊妹的純潔的柔情，看她在我們身畔長大，而且跟在她後面——誰不相信曾經認識她呢？……當不可思議的春夜，娜泰霞倚在浴着月光的窗畔，夢想着，而且嬌癡地低語着，向着窗下傾聽着的安特來公爵……最初的跳舞會時之感動，戀愛的期待，放蕩的願望和夢想的萌芽，夜間，在燃着虛幻的光的蒙着雪的森林之中的滑冰。「自然」，溫柔地擁抱你。劇場之夜，理性迷失醉的奇異的藝術的世界；心的迷亂，身體的迷亂，因戀愛所致的消瘦。洗濯靈魂的苦痛，神聖的同情，看護其垂死的愛人……人們祇在談到一個最親愛的女友時所能喚起的沒有感動的悲慘的回憶。啊！叫這樣的創作去測量測量一切現代的小說和戲劇中的女性的弱點看！生命的本身被把握着，

如此輕捷又如此流動，一行一行地好像給人們看出牠在飛揚在演變。——公主馬利，是醜陋的，但因她的善良也顯得美麗，她的肖像並不比娜泰霞的寫得不完全些；但這胆怯而拙笨的少女，當看到她兢兢地躲避着別人的眼光的祕密，一被揭穿之際，就要臉紅，如和她同類的少女們一般。

概括地說來，他描寫女性的性格，已如我在前面所指出似的比男子的性格還要高尚，特別是比起男性中的兩個主人公來。這兩個主人公，託爾斯泰賦予他自己的思想！比愛爾·倍斯珂夫的優柔寡斷的性質和安特。來鮑爾孔斯基的嚴格的熱烈的性質。這是些缺乏重心的人物；他們不絕地搖擺，很少進展；他們從這一端盪到那一端，從不向前。我們可以無疑地說這徹頭徹尾是俄羅斯人的性質。並且我注意到許多俄國人自己也作這樣的批評。於這一點，屠格涅夫非難託爾斯泰，說他的心理是停滯的「沒有真的發展，永遠的狐疑，感情的振動」託爾斯泰自己也承認他有时候稍把個人的性格去遷就歷史的形態。（他說最顯明的是前面幾部分中安特來公爵的性格）。

「戰爭與和平的光輝，實際上，是在乎民族的移住，國民的戰爭以及全部歷史的時期的復活這一點。他的真正的主人公，是民衆；而且，在他們後面，恰如在荷馬的主人公的後面，有神們在引導他們：「支配集團的無限小的」不可見的神力，有「無限」的呼吸。這些被一個隱然的命運

鼓動盲目的民衆使互起衝突的偉大的鬥爭，有一種神祕的尊嚴性，除了 *Trade* 之外，當於印度的史詩中求之。

【註一】「家庭的幸福完全把我的心奪去了」（一八六三年一月五日）——「我是這樣幸福這樣的幸福！我多麼愛她！」（一八六三年二月八日）

【註二】她也曾作過幾篇小說。

【註三】據說，她把戰爭與和平膽寫過七次。

【註四】結婚以後，託爾斯泰立即停止其兒童教育的工作，學校和雜誌。

【註五】和她的姊妹泰緝娜同樣，是聰明的藝術家，託爾斯泰最愛她的智慧和音樂的天才，他曾說：「我取了泰尼亞（即泰緝娜）我把她同莎尼亞（即莎非倍爾斯，託爾斯泰夫人）搗碎了，從此產生出娜泰霞來。」

【註六】陀利 (*Dolly*) 在衰敗了的田舍人家中的部署；——陀利與其小孩們；——許多裝飾上的瑣細；——不必說關於女的幾多祕密，倘若沒有女人方面的提示，一個天才的人也許不能觀察得這樣深刻的。

【註七】在這裏，有一個託爾斯泰作為自己的藝術的天才的奴隸的特色的例。他的日記中止於一八六五年十一月一日，即正在創作戰爭與和平的時候，直到十三年後又開始。藝術家的利己主義，使良心的獨自沉默了——

這創造的時代，同時又是強壯的肉體生活的時期。託爾斯泰熱狂於狩獵。「在狩獵中，我忘了一切……」(一八七四年之書翰)一八六四年九月，他乘馬打獵曾跌斷二隻手臂。在他的養傷期中，他開始著戰爭與和平的最初部分——「我回復了知覺之後，我對自己說：『我是一個藝術家』，是的，但我是一個孤獨的藝術家」(致輝脫書一八六五年一月二十三日，這時候的函件，寫給輝脫的，都充滿着創造的歡喜「我把今日以前所發表的一切作品都看作是試筆」。

【註八】 遺以前，託爾斯泰在關於二十歲到三十五歲之間受過影響的書物，如下的記着：

「哥德·Hermann et Dorothée……影響甚大。」荷馬·Iliade和Odyssee(俄譯本)影響甚大。」

一八六三年六月的日記中記着：

「我讀哥德的書，許多觀念湧了出來。」

一八六五年春天，他又讀哥德的作品，他名浮士德為「思想世界的詩，表現了別的藝術所不能表現的東西的詩。」

後來，他和犧牲莎士比亞一般地把哥德犧牲給上帝。但依舊崇讀荷馬，一八五七年八月間，他以同樣的熱心讀Iliade和聖經，在他最後的著作之一中，有一本攻擊莎士比亞的小冊子(一九〇三)，他取以與莎士比亞

亞對立的，誠實的均衡的真的技巧的例證，就是荷馬的。

【註九】戰爭與和平的最初的二篇，在一八六五——六六年間題作一八〇五年而發表。

【註十】託爾斯泰於一八六三年，開始這作品時，原爲十二月黨員，其中分三個斷片。然而，他知道他的計畫的基礎尚未充分堅固，於是他更遼溯上去，直到拿破崙時代，結果，就寫成戰爭與和平。其第六卷完成於一八六九年之秋。託爾斯泰更遼溯上去，他計劃關於彼得大帝敘事詩的小說。由此，又想了另一篇。Mitschke以十八世紀女皇之治世及其寵臣爲題材，一八七〇——七三年間，他被許多的記錄所包圍，寫了許多的場面，但爲了對事實起了疑念，就把這計劃放棄。因爲他知道要把這些遙遠的時代精神充分忠實地蘇生過來，到底是不可能的。後來一八七六年一月，他計劃一篇關於尼古拉一世時代的小說；於是他又熱心地着手十二月黨員，蒐集殘存者的證據，訪問出事的地方，一八七八年他致伯母A. A. 託爾斯泰伯爵夫人函中有云：「這作品對我是如此的重要！你想像不出這對於我到底重要到如何；恰如你的信仰對於你一般的重要。我對你說：比這還重要得多哩。」但正當深入這題材之際，他却脫離了；他的心已不在此了。一八七九年四月，他已有信給繆脫，「十二月黨員？上帝曉得什麼地方去了……！」這時候：他的宗教的危機已經開始，他把一切以前的偶像都燒掉了。

第十章 「婀娜小史」

婀娜小史和戰爭與和平一般是劃出圓熟期的頂點的作品，這比戰爭與和平更為完備無瑕，是從對於技巧抱着更大的確信的心，愈富於經驗的心，對於感情的世界已毫無祕密了的心中產了出來的。然而這裏面缺乏着青春的火焰和感興的清新味——這原是戰爭與和平的雙翼。託爾斯泰已經沒有先前一般的創作的歡喜了。結婚後最初幾個月間的那種和平和已經消失了。託爾斯泰夫人在他周圍所描的愛情和藝術的魅力的圈中，重新侵入了道德的不安。

在結婚後一年所寫的戰爭與和平的前數章中，安特來公爵對比愛爾的談話，說到婚姻問題，已經表示了男子的覺悟，即從所愛的女人中，看出了另一樣子的女人，看出了無罪的敵人，看出了對於他的道德的發展的一種無心的障礙。一八六五年的許多信件，通告了宗教的苦悶之復活。這已不是生活的幸福所能消滅的暫時的威脅，而成爲一八六九年託爾斯泰結束其戰爭與和平的數月間的更嚴重的動搖。

他離開家庭數日，去訪問一處領地。有一晚，他躺在床上；上午兩點鐘剛才敲過：

「我是過度的疲倦了，我睡着了，而且覺得睡得很好，突然我被襲於一個這樣的苦悶，一個這樣的恐怖，是我從來所沒有感到過的。我詳細地對你說：這真是可怖：我從床上跳起來，叫把馬車配好。他們把馬車配好時，我又睡去了，他們把我叫醒之後，我却全然復原了。昨日，同樣的情形又發生過，但比較輕得多了……」〔註一〕（此係致其夫人書）

他的夫人用愛情辛苦地建築起來的幻影的宮殿，這回是倒塌了。在續完了戰爭與和平以後的空間，他放棄了藝術的精神，而又恢復了哲學的〔註二〕和兒童教育的成見：他想給民衆寫一部初步的讀本〔註三〕；他興奮地寫了四年；他自以爲比戰爭與和平寫得更有價值，而且他寫完一部（一八七二），又寫第二部（一八七五）。後來他熱中於希臘文，朝晚學習，不顧其他，他發現了「放逸的劍諾芬（Xenophon）」以及荷馬，這回是本身的荷馬，不是翻譯中的荷馬了，「一切這些 *Joukhovstj* 和 *Voss* 都以各種的聲音唱歌，或以喉聲，或以歎息聲，或以甜美之聲」，然而「那別的一個小鬼，從想不到也許有人要聽他：祇是隨口亂唱」〔註四〕。

「沒有希臘語的知識，就沒有教育！我承認，這一切纔是人類的語言中真正的美麗的，他

有一種單純的美。在今日以前，我竟一點也不知道。」

這是一種猞猁：他自己也承認。他以一種強烈到竟至於生病的熱心，再進到學校裏去。一八

七一年，他弄得非到撒馬拉 (Samara) 的罷克爾 (Bachkirs) 家去受馬乳治療法 (Une Cure de Kou
firin) 不可了。除了希臘文之外，他討厭一切。一八七二年，經過一次誤事之後，他嚴重地主張
賣去在俄國所有的一切移住到英國去。他的夫人被他弄得沒有辦法。

「倘若你永遠埋頭在你的希臘語中，你將不會痊癒了。就是那些希臘語把你弄成這樣苦
悶，使你現在的生活大殺風景。人們稱希臘語爲已死的語言不是無故的：這祇是附著在已死的
精神狀態中的語言而已。」(託爾斯泰夫人文存)

終於，在捨棄了許多計劃之後，於一八七三年三月十九日，在夫人的非常的歡喜之中，他開
始起草他的婀娜小史。當他工作進行之際，他的生活却被家庭間的不幸所苦痛〔註五〕，他的夫人
生了病：「幸福不再君臨我家了……」(致輝脫書)

他的作品稍留着這悲痛的經驗的痕跡，和幻滅的情熱的痕跡。除了關於萊汶納的訂婚的美麗
的幾章以外，愛情，不再像是戰爭與和平中的數頁中的通乎各時代的最美的抒情詩一般的青春的

詩了。却是帶着完全相反的苦的、肉感的、粗暴的性質的了。支配着全書的宿命，已不是戰爭與和平中一般的克利須那神（印度神話中的破壞之神），殺伐的、嚴肅的、力的「命運」，而是愛的癡情，「完全的維奴思（Venus）女神……」。在跳舞會的不可思議的場面中，當熱情不知不覺地攔住了婀娜和伏浪斯基（*Wronski*）之際，對於那戴着五彩蝶花，穿着黑色天鵝絨舞衣的無邪的美麗的婀娜，賦予「一種幾乎是妖魅一般的誘惑」者，是這女神。當伏浪斯基表示了他的戀愛之際，使婀娜的臉上現了一道光——「但不是歡喜；而是黑夜中失火時的恐怖之光」者，是這女神。在這貞淑知理的女人，這深於愛情的年青的母親的血管之中，注入了淫蕩的血液者，而且盤踞在她的心中，直待她的生活毀壞之後方纔離開者，是這女神。當接近婀娜之際，無人不感到一個無形的魔鬼的魅力和恐怖。吉第是第一個發現這魔鬼而戰慄起來的。伏浪斯基去會見婀娜時，歡喜中混雜着神祕的恐慌，萊汶納一見她出現，就失了全部的意志，婀娜自己也知道她已不能支配自身，隨着故事的進展，那執着的情熱，一點一點地侵蝕這驕傲的少女的道德的建築物。一切她心中的最好的性質，她的真摯的勇敢的心，崩潰了，倒塌了，她連犧牲她的世俗的虛榮心的勇氣都沒有了；除了媚悅她的情郎以外，她的生活更無別種目的；她恐怖地怕羞地避免孩子的產生；她

爲嫉妬所苦，控制着她的肉慾之力，逼得她在動作上，聲音上，眼光上完全說謊；她墮落爲祇知道迎合男子——不管他是怎樣的男子——的婦人之一；她會藉嗎啡以減輕自己的痛苦，有一天，她感到身心消耗的痛苦，傷心於自己的道德的墮落，而投身於火車的輪下。「於是一個鬍子蓬鬆的小百姓」——曾經出現於她和伏浪斯基的夢中的奇妙的幻覺——「從火車的踏梯落到路軌上」；於是那先知的夢宣告：「他成爲兩截地俯於一個袋上。他在這袋裏面納入幾種殘餘的東西，這些東西是曾經組成過他的生活的！也有苦惱，也有欺瞞，也有悲哀……」

「我爲自己保留了復仇！」主如是說。（安娜小史卷頭篇言）

以這被戀愛所蝕，打碎了神的法律的悲劇——是一種單色的非常深刻的繪畫——爲中心，託爾斯泰也如在戰爭與和平中的一般，安排着其他的人物的小說。不幸的是：這些平行的故事，比較的組織得有些生硬不自然，沒有做到戰爭與和平的交響樂一般的有機的統一。我們又看到，這些繪畫的某幾處場面的完全的寫實主義——例如彼得堡的貴族社會，以及他們的閑談——有時候過於冗慢，實非必要。最後，較之在戰爭與和平，託爾斯泰更公開地在描寫生活狀況時，表現他自己的道德的個性和哲學的觀念。然而這作品依然不失其可驚的豐麗之味。與戰爭與和平中的人

物同樣的複雜，也非常正確。人物的描寫，也好像同樣的高妙。託爾斯泰非常高興地描寫斯推班·阿爾加第微支(Stepane A cadievitch)那逢人便笑的可愛的爲我主義者，還有加列寧(Karenine)那大官僚的完全的典型，著名而庸俗的政客，他有一種習慣，就是喜歡把他的真正的感情隱藏在不絕的譏諷的假面之下：他是正直與卑劣，法利賽主義和基督教思想的混成體；是虛飾的世界的特別的產物，雖以他的聰明和真正的寬大，也不能脫離這世界——而且他有從內心懷疑他自己的理智：所以當他墮落於這世界之後，終於陷入一種不可解的神祕的感覺之中。

然而，和阿娜的悲劇及一八六五年頃之俄國社交界——客廳，將校俱樂部，跳舞會，劇場，競馬……等等光景一同，這小說的主要的興味，在乎他的自敘傳的性質。比起一切作品中的別的人物來，康士坦丁萊汶納，更分明的是託爾斯泰的化身。託爾斯泰不但將自己的保守思想和民主思想以及輕視智識階級的田舍貴族的反自由主義，一起賦予萊汶納，並將他自身的實生活也供給於他；萊汶納與吉第的戀愛及他們結婚後的最初數年間的事柄，實係他自身的家庭生活的回憶的移用——同樣，萊汶納之兄的死，就是託爾斯泰之兄特米德里之死的再現。於這小說實非必要的最後的部分，使我們洞察那時候在著者心中擾亂的苦悶。倘若說戰爭與和平的結局是一種向另一

計劃推移的藝術的接筭，那麼婀娜小史的結局是二年後表現於我的懺悔中的向着道德的革命的自發傳的推移。在這書中，已經在一種諷諷的或激烈的形式之下，不絕地回復了對於現社會的批評，在後來的作品中，更時常施以攻擊。向虛偽宣戰，向一切虛偽，向有德的虛偽，也向有害的虛偽，向自由的饒舌，向流行的慈善，向客廳中的宗教，向博愛思想而宣戰！向歪曲了忠實的感情，必然地打碎了精神的偉大的突躍的世俗而宣戰！死亡在社會的傳統上面投出了出其不意的光。在瀕死的婀娜之前，傲然的加列寧也柔和下去了。在这一切都是做作的無生命的靈魂之中，射入一道愛和基督教的恕罪的光。那三個人，夫、妻和情郎，一齊暫時的起了變化。都成爲單純而正直。但婀娜一恢復之後，三個人一齊感到「在內部引導他們的可以說是神聖的道德力的對面，還有別一個殘忍，然而有力的，專制地指導他們的生活，不許他們得到安靜的力的存在。」而且他們又知道自己是毫無力量與這種惡的力奮鬥，「因爲他們之所以做惡事，是社會上認爲必要而逼迫他們去做的」〔註六〕。

託爾斯泰的化身的萊汶納之所以在這小說的結局忽然矯正了過來，也是因爲被死所感動之故，在以前，「他不能相信，同時也不能絕對的懷疑一切。」自從見了他的兄弟之死，他覺到自

己無智的恐怖就攫住他了。他的結婚，曾暫時鎮壓住這種苦悶。但他的第一個兒子出世之後，這苦悶又出現了。他交互地通過祈禱和否定的危機。讀了許多哲學書，也不中用。在他的迷惑之時，他畏懼起自殺的誘惑來。幸而體力的工作使他得了安慰：在體力工作中，絕無懷疑，一切很明瞭。萊汶納同農夫們談天；有一個農夫對他談起關於「不爲自己而生活，爲神而生活」的人們的故事。這對於他不管一道光明。他看出理智和良心的衝突。理智教他激烈的生存競爭；又說隣人愛是毫不合理的：

「理智並沒有教給我什麼，一切我所明白的事，皆出於良心的啓示。」

此後，又恢復了安靜。以良心爲唯一的指標的卑微的農民的話，引導他傾向上帝……怎麼樣的上帝呢？他並不知道。這時候的萊汶納，恰如長時間的託爾斯泰的態度一般，對於教會是很謙讓的，對於教義，也毫無挑戰的表示：

「有一個真理，同樣的在蒼穹的幻影之中，也在光明的星辰的運動之中。」

【註一】 這個可怖的晚間的回憶在一八八三年之癡人的日記可以看出。

【註二】 一八六九年之夏他作成戰爭與和平之時，他發現了易本華爾，他很熱心地崇拜他：「易本華爾是人間最大的

天才」(致輝脫書)

【註三】這課本是一種七八百頁的巨帙。分爲四卷，在教育法這方面，包含很多的故事。

【註四】他說荷馬原書與其譯本之間尙有「蒸溜水與冷的使牙齒作痛的清澄光鮮的泉水之別，這泉水雖然有時帶些沙，却更爲清澄。更爲鮮潔。」

【註五】三個孩子之死(一八七三年十一月十八日，一八七五年二月又十一月)作爲養母的泰謬娜姑母之死(一八七四年六月二十日)卑拉齊(Palace)姑母之死(一八七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註六】「罪惡是被社會認爲合理的。犧牲、愛，是被認爲不合理的。」

第十一章 懺悔及宗教的危機

萊汶納的這些苦悶，這些瞞着吉第的自殺的願望，於同時託爾斯泰也瞞着他的夫人。然而他還沒有達到他所給予其小說主人公的那種安靜。實在說來，這安靜狀態一點也不使讀者其感。我們感到他祇是希望這種安靜而已，並沒有實現。而且萊汶納不久又陷於懷疑的狀態中了。託爾斯泰並不欺騙自己。他寫到他的作品的最後是感到很困難的。在還沒有作完的時候，安娜小史已經使他厭倦了。他不能繼續工作了，他停止着，無生氣的，無意志的，被對於自己的嫌疑和恐怖所苦。於是，在他的生活的空虛期間，從深淵中起來了一陣狂風，即死的瞑眩。後來，託爾斯泰逃出了這深淵之際，對於這恐怖的情形曾有所敘述。

「我還不到五十歲，」他說：「我愛了而且被愛過了，我有幾個好孩子，一處廣大的領地，我有光榮，有健康，有肉體的力和道德的力；我能像農夫一般地割麥刈草；我能繼續作十二時工作而不倦。然而，不意地我的生活停滯了。我能呼吸、能食、能飲、能睡。但這不是生活。我沒有

別的希望。我知道實在沒有什麼可以希望。甚而至於我不想認識真理。真理就是：「人生是不合理的」。找到了一個深淵，我明明白白看到在我前面一無所有，除了死。就是一個很健康，福氣很好的人，也感到我活不下去了。一種不能抵抗的力量教唆我叫我脫離生活。……但我不說出我要自殺。把我從生活推出的那種力量比我強得多；這是一種憧憬。恰如先前我對於生活的憧憬一般。祇在意義上完全相反。我應該盡量對我自己施出詭計，因為我不甘退讓得太快。這樣子的，就是幸福者的我，——我把繩子藏了起來，爲了不使我自己寢室中的衣櫥間的樑上吊死，在這寢室中，我是脫光了衣裳一個人在着的。我不再帶了我的火鎗去打獵，爲了不使我自己飲彈而死〔註一〕。

「想起來！我的生活好像一齣拙劣的滑稽劇，似乎別一個人故意在我面前表演着。四十年的工作、苦悶、進步，却不過使我看出一實在一無所有。虛無！對於我，祇留着腐臭和蛆蟲……人要生活，祇在醉心於生活時候可能；但頃刻間醉意一消，人總看出一切祇是欺騙，無謂的欺騙……家庭與藝術已不能使我滿足了，家族也祇是和我同樣的不幸的人們。藝術也祇是人生的一面鏡子。當人生是沒有意味的時候，用鏡子來照也是沒有趣味的。那最壞的，我是不能夠忍受了。我

猶如一個迷失於森林中的人，他被恐怖所襲，祇因為他已迷了路，於是他在向各方面跑來跑去，不能停止，雖然他明知每一舉步不過愈陷於迷途……。（即錄我的懺悔）

從民衆方面來了救濟之力，託爾斯泰對於民衆，常常抱着「全然肉體的，不可思議的愛情。」淺度的社會的幻滅的經驗也不能搖動這種愛情。到了晚年，他也如萊汶納一般，接近民衆。他思索這類的無數的人，爲了要跳出那些學者，富豪以及自殺的茫然自失的，或者像託爾斯泰自己一般絕望的，徒然延續着生活的怠惰者們所在的環境。他又自問：爲什麼這無數的男女能夠逃出絕望，爲什麼他們不去自殺呢？於是他指出他們的生活着，並不依賴理智的幫助，倒是沒有想到什麼叫做理智——他們祇依賴信仰而生活。那不識理智爲何物，信仰，到底是什麼呢？

「信仰是生活的力量。人類不能無信仰而生活，宗教觀念是在過去的人類的思想中被思索了的。由信仰所與的對於生活的 Spänik 的答案，是包含着最深刻的人類的智慧的。」

單是知道了宗教的書籍裏面所載的那些智慧的公式，就夠了麼？——否，信仰不是一種科學，而是一種行動；牠祇在被活用的時候，方有意義。託爾斯泰因爲對於那些，僅以信仰爲「快樂的慰安」的富人們和善知識們，厭惡不堪，所以斷然地投身於那些生活與信仰一致的單純的人

們中間去。

「他覺悟到勞動着的人民的生活，方是生活本身，這種生活所有的意義，方是真理。」

然而，如何方能變成民衆，而且分得他們的信仰呢？單知道別人合乎真理，是不夠的；我能否做到同別人一樣，也不在乎我們自己；徒然的祈禱上帝；徒然的向上帝伸出雙手，上帝逃了，我們向那裏抓住他呢？

有一天，神恩終於降臨了。

「早春的某一日，我孤獨的在森林中，聽着天籟。我想起我三年來的煩悶，想起我對於上帝的追求，想起我的從歡喜到絕望的不斷的跳躍……忽然，我看到祇在信仰上帝的時候，我才有生活。一想到他，生活的快樂的波浪就從我身上湧起。周圍的一切都有了生氣，都得了意義。當我不信他的時候，我的生活立刻就停止了。」

「——然則，我還追求什麼呢？——一種聲音從我身內喊了起來。既然是「他」，沒有「他」，人就不能生活！認識上帝和生活，是同一件事，上帝：就是生活……」

「從此以後，這道光明永久不離開我了。」（我的懺悔）

他得救了。上帝出現了【註二】。

然而因爲他不是以法悅爲滿足的印度的神祕家。在亞細亞人的夢想中，參入了西方人的理智，欲和行動的要求的他，覺得應該把自己的所悟的翻譯爲實踐的信仰的言語，本且從神的生活引出自日常生活的法則，毫無先見的，而且爲了真實。他爲希望信仰他的家族的信仰起見，他開始研究自身亦爲會員之一的正教教會的教義。爲了與這團體更接近起見，於三年間，服從一切儀式，他也懺悔，也參加聖餐式，對於他覺得不合理的事，不敢批評，對於曖昧的不可理解的事，作新的解釋，不在同一信仰之下，他和一切所愛的人不管生者與死者連結起來，並且常常抱着一種希望，希望到了某一時候，「愛情替他們拉開真理之門」——然而，這一切都成爲徒勞。他的理智和他的良心起了反抗。如洗禮，聖餐等等的做作，他認爲無恥，當人們強迫他反覆地說聖餐中之麵包是基督的真的肉和血時，「他覺得心上如同被小刀所刺」。然而，在教會與他之間立了不能通過的障壁者，並不是那教義，而是那些實際的問題——最主要的兩個是教會的相互間的仇視的不容忍和對於殺人罪的公然容許或默認——戰爭與死刑。

到這時候，託爾斯泰是顯然決裂了；而且他的破裂，比較三年以來竭力約束他自己的思想的

時候更激劇了。他不再顧慮什麼，憤激地把昨日還固執地想見諸實行的宗教，踐踏在脚底。在他的教義神學之批評（一八七九——一八八一）中，他不但把宗教看作「不合理的，而且是意識的利己的說謊」。他在四福音書的註解及翻譯（一八八一——一八三年）中，將宗教與新約聖書對照。終於他以福音書為基礎，而打定自己的信仰（我的信仰存在於何處）（一八八三年）。

這完全存在於如次的文字中：

「我信仰基督教的教義，我相信所謂幸福祇在全人類一致去實現他的時候，方能存在於地上。」

為這信仰的基礎，有摩西的山上的垂訓。從這根本的教義，託爾斯泰又引出五條戒律來：

- 一，勿發怒。
- 二，勿犯姦淫。
- 三，勿宣誓。
- 四，勿以惡抗惡。
- 五，勿為人敵。

這是這教義的消極的部分，至於積極的部分，却可以一條戒律概括之：

「愛上帝愛鄰人如愛你自己。」

「基督曾說，誰若稍有違犯此戒律者，祇能居天國中最小的地位。」

託爾斯泰幼稚地加上幾句道：

「這是顯得多麼的奇異：在十八世紀之後，我發現這些規則，還像是新奇的東西一般。」

託爾斯泰相信基督的神性麼？——決不相信的，他對於基督給以怎樣的意味呢？——視為聖賢之一，如婆門、釋迦、老子、孔子、瑣羅亞斯德（Zoroaster）以賽亞（Isaie）等示人以所當懂憬的真正的幸福，而且指示應該遵從的道路的聖賢之列的最偉大的人。託爾斯泰是這些偉大的宗教創造者，這些印度的、中國的、希伯來的半神和豫言者的門徒。他為他們辯護——他知道如何辯護：他攻擊那些名之曰：「法利賽人」和「律法學者」：他攻擊既成的教會，妄自尊大的科學，不如說「科學的偽哲學」的代表者。這並不是仗着神的啓示而反對理智。自從他脫離了我的懺悔中所說的苦悶的時代以後，他依然根本地是理智的信者，我們可以名之曰：「理智的神祕家。」

「太初有道」他和聖約翰一同反覆着：「道（Verbe）理體（Logos），就是理智（Raison）。」

他的人生論（一八八七）引了巴斯加（Pascal）的名句作爲題詞：

「人不過是一片葦，是自然界中之最弱者，然而這是能思索的葦。……我們全部的尊嚴在乎思想……深思熟慮而努力罷：這就是道德的原則。」

這書的全體，可以說是一首理智的讚歌。

但託爾斯泰之所謂理智，不是科學的理智，不是「把一部分當作全體，把肉體的生活當作全部生活」的局限的理智。乃指支配人類的生活的至高至大的法則，爲「理智的動物即人類所當必然地遵守着而生活的法則」而言。

「此乃與支配動物之營養及生殖，草木之生長及開花，地球與星辰之運行的大法則相類似的法則。唯在完成此法則之際，在爲獲得「善」起見而將吾人之動物性服從於理智的法則之際，始有吾人的真生活之存在……理智是無從下定義的，我們也沒有給他一個定義之必要。蓋理智之爲物，非但爲吾人全體所認識，而且吾人除理智以外，不知其他……人類之所以能認識種種事物，皆賴理智之力，而非賴信仰之力……〔註三〕真正的生活的開始，乃在理智出現的時候。唯一的生活，乃是理智的生活」。

然哉，現在我們所見到的生存，即我們的個人生活，到底是什麼呢？「這不是我們的生活」
託爾斯泰如是說，因為這是與我們本身無關的。

「吾人之動物的活動性，在我們自身以外活現……人性，與思索着個人的生存的人生觀一
同終結。否定個人的善的存在的可能性，依然是我們這一時代中有理智的人們的永劫不變的真
理。」

還有一大系的定理，在此，我不多說了，但這些定理實足以說明託爾斯泰的對於理智的觀念
是懷着何等的熱情。實際上，這是一種情熱，比起他前半生所有的別種情熱來，並不減少其盲目
和嫉妬的性質。一方的火剛將熄滅，另一方的火又起來了。正確地說，這實在是同一的火，祇是
換了燃料而已。

加在「個人的」情熱與「合理的」情熱之間的一種相類的事實，是兩者皆不以祇知道愛為滿足。
兩者還要實踐，還要使之實現。

「不必空談，祇須實踐——基督如是說。」

然則理智的活動是什麼呢？——乃是愛。

「愛是人類唯一的理智的活動。愛是精神狀態中最公理的，最光明的。一切人類的需要，理智的太陽一點也無所隱匿，且使之增加……愛，是解決人生一切矛盾的實際的善，至高的善。愛不但消滅死之恐怖，且使人類樂於為他人而犧牲自己：因為除了把自己的生命奉獻於所愛的人們以外，別無所謂愛；祇有自己犧牲，纔不辱愛之名。并且，真正的愛，祇在人們覺悟了獲得個人的幸福為不可能這事以後，方能實現。是故，他的生命的一切液汁，都將去培養那真正的愛的高尚的接枝，這接枝為了使自己長大起來，將借取那種動物性的個人的野蠻的樹幹的全部精力……。」

這樣，託爾斯泰還沒有說出信仰。好像隱在砂土之中的乾涸的河流的樣子。後來，他在這裏導入了豐富的生活所蓄積的強烈的勢力的奔流——我們到後面可以看見。

愛與理智的堅固地抱合着的這熱烈的信仰，在他對於給他以破門的處分的神聖宗教會議的著名答辯中，表現着最高的姿態：

「我信仰上帝。在我看來，上帝就是萬物之靈，之愛，之原則，我相信他存在於我這裏，恰如我存在於他那裏。我相信上帝的意旨，比在基督這人的教義中表現得更明白的是沒有的

了；然而，我們不應該把基督當作神，而對之祈禱。這是最大的瀆神罪。我相信，人類的真正的幸福，在乎完成上帝的意旨；我相信上帝的意旨是叫一切人愛他的同胞們，當爲他們做事，如他希望他們爲自己做事一般，這就是聖經中所說的一切法則和豫言者的要旨。

「我相信我們個人的生活的意義，祇是增進自己的愛，我相信我們的愛之力的發展，將在現世得到一種日益增大的幸福爲報酬。在來世得到更完全的福祉爲報酬。我相信這愛的增進，勝過別的一切力量，將促進地上的上帝的王國的建設，換言之，將以一個由和解，真理和博愛所支配的新的秩序，來替換這跋扈着差等，欺騙以及暴行的人類組織。我相信要使愛增進，我們祇有一個方法：就是祈禱。並不是基督曾經公然非難過的（馬太傳卷第六章五——十三）寺院中的公開的祈禱，而是基督自己給我們作過例子的那種祈禱，就是一個人的祈禱，堅定我們的生活的意識，堅定我們的唯上帝的意旨是從的這種感情的祈禱……我相信不朽的人生，我相信人們無論何處，無論何時，一切行爲，皆有報應。我如此堅決地相信這些道理。即使到了這樣大的年齡，墓門已在目前，但我猶努力祈禱，却不是爲了我的肉體之死，換言之，我祈禱我的新生活的產生……。」

【註一】參照柯哪小史：「被愛的、幸福的、家庭之父的萊汶納，從他手裏遠離一切武器，因為恐怕被自己的結束一切痛苦的誘惑（死的誘惑）所屈服。」這種精神狀態在託爾斯泰和他的小說中的人物是很平常的。

【註二】實際上，這已不是第一次，如高加索的志願兵、賽伐斯多坡里的士官、可薩克的奧列甫、戰爭與和平的安特來公爵及倍斯珂夫都會看到同樣的幻影。但託爾斯泰是非常熱狂的，每一次發現上帝就相信這是第一次，而且相信以前的生活是夜的黑暗和虛無，而羞恥於自己的過去的陰影。

【註三】「人類從上帝直接領受了唯一的工具，——認識自己以及自己與社會間的關係的工具；沒有別的。這工具，即是理智。理智由上帝而來，這不但是人類是高尚的性質，且係認識真理的唯一工具。」（致父男爵書）

第十二章 社會的危機

他想自己已經到了海口，到了可以休息其不寧的精神的安身之所。然而實際上，他祇到了一個新的活動的出發點。

在莫斯科過了一冬（他的家務使他不得不跟了他的家人到那裏去），一八八二年一月，他所參加的戶口調查事業，給他一個就近參觀許多大都市的貧苦人民的機會。他所得的印象，是很可怕的，第一次接觸那隱在文明後面的悲慘的情形的那天的晚上，他對一個朋友敘述他所見的情形，「他叫了起來，哭了起來，同時舉起他的拳頭。」

「這種情形是目不忍睹的！」他嗚咽着說：「這是不應該的，這是不應該的……」數月之間，他陷在可怕的絕望之中，他的夫人於一八八二年三月三日寫信給他：

「你最近會說：『因為我缺乏信仰，我想吊死。』現在，你已有了信仰了，為什麼還要苦悶呢」？

因爲他所有的，不是法利賽之徒的信仰，那種所謂虔敬的滿足自己的信仰。因爲他沒有神祕的思想家的利己主義，那種祇顧自己得救不顧其他的自私自義，因爲他有愛，因爲他現在忘不了他所目擊的慘狀，因爲他的善良的熱腸。他好像對於窮人們的痛苦和恥辱負有責任：他們是那包括自己在內的特權階級的文明的犧牲品，是一個優秀的階級以無數人類作爲祭品的兇惡的偶像的犧牲。沾取這樣的罪惡的恩惠者，無異於這罪惡的共犯。不告發這罪惡，他的良心是不能安了。

我們應該怎樣辦？（一八八四——八六）是這第二次危機的表現。比第一次危機更富於悲劇性，其結果也豐富得多，託爾斯泰個人的宗教的苦悶，在這人類的不幸，真正的不幸，並非一個厭倦的怠惰者的精神上所生的，不幸的大海裏，算得什麼呵！不能閉起眼來不看到他，看到之後就不能不設法消滅他，無論如何——啊啊！這是做得到的麼？……

一個可愛的肖像，我每次看到不能不起感動的肖像，表明着託爾斯泰那時所感的痛苦（一八八五年攝的）他露着正面，坐着，兩臂交叉，穿着農夫的寬大的上衣；態度煩悶。他的頭髮依然是黑的，口鬚有點花白，頰鬚和額鬚却已純白。兩條皺紋在廣大好看的額部，犁了兩條勻整的

溝。在善良的狗一般的大鼻之上和兩眼之中含着無限的好意：他的眼睛，非常純潔。非常明白，又非常憂鬱地看着你，而且非常確實地觀察你：這雙眼使你憐憫，使你懇求。他的兩頰陷進，帶着痛苦的痕迹，眼部之下有多數粗的皺皺。他哭了，但他是強者，他準備鬥爭。

他有一種英勇的邏輯：

「我時常驚異於這些時常反覆着的話：『是的，這在理論上是很對的，但怎樣地去實踐呢？』在談話之間，那些包含着美麗的語言的理論是這樣的必要，但絕對沒有人照此實踐……

當我反省了許久，懂得一件事情的時候，我除了懂得這事以外，不能再做什麼別的。」（我們應該

怎樣辦？）

他開始以照相一般的正確之筆，描寫他在莫斯科所目擊的貧民區和下宿處的窮狀。照他最初的想像，確信非金錢之力，所能救濟這些多少已被都市的腐敗所感染的窮民。於是他勇敢地探求一切惡的來源，一環一環地去解開那責任的可怕的鍊條。第一，是富人，及其可咀咒的奢侈的傳染，誘惑人民使之墮落〔註一〕，次之，是不勞動而生活的普遍的誘惑——又次，是爲了自己的利益而剝削僕奴，使其他的人類的暴刀者所創造的殘酷的實體——即國家。——又次，是共犯者的

殺害；同謀者的科學和藝術……如何向一切這些惡的軍隊鬥爭呢？第一，先不要入夥。拒絕參與利用人類的事業。放棄自己所有的財產與土地〔註二〕。不爲國家服務。

但這還不夠，還應該「不說謊」，不畏懼真理，應該「知過則改」，在教育的根本中，除去驕傲。應該用自己的手工作。「以你自己額上的汗去換你的麵包」〔註三〕。這是第一條最根本的戒律。託爾斯泰更進一步答覆那些優秀份子道：「肉體勞動並不妨害知識階級的精神，反能使之增進，而且合乎自然的正常的要求。祇在肉體勞動中能夠得到健康；藝術亦因此而進步，最要緊的，還是人們由此而能再建相互的團結。」

在後來的作品中，託爾斯泰補足這些道德上的衛生的諸項目，他急於完成這靈魂的救治，充實他的精力，革除那些催眠他的良心的不正當的行樂〔註四〕，革除那些殺死良心的殘忍的行樂。他自己做了模範，一八八四年，他犧牲他的一種最深的情熱，即狩獵慾。他實行鍛鍊意志的節慾。這樣子，他好像一個鬥技者，行着刻苦的訓練，豫備格鬥而獲勝利。

我們應該怎樣辦？指示了託爾斯泰所進行的艱難的路程的第一段，爲了社會的漩渦，而離開了宗教的瞑想的平和的境地；自此以後，開始了二十年的戰爭，這耶斯耐耶·理里安那的老諺言

者，單鎗匹馬，在福音書的名下，立在一切黨派之外，向着罪惡，向着文明的虛偽的戰爭。

【註一】「貧窮的真正的原因，是不從事生產而集中於都市的人民手中所積蓄的財富，富人們爲了享福，爲了防衛，都集中於都市，貧人們祇能吃些富人們的殘餘，可怪的是他們之中有許多，永遠勞動着，不去從事於較爲容易獲利的事業；經商，壟斷，乞食，流蕩，作僞——真是不可思議。」

【註二】「罪惡的中軸，乃是財產。財產祇是一種享受他人的勞動的手段。」——託爾斯泰又說：「財產並不是我們的東西。乃是他人的。人們叫他的妻子，奴隸，物品爲財產；但事實指出他們的錯誤，他們應該捨棄這些，或者自己受苦，同時使別人受苦。」

託爾斯泰促進了俄國的革命：「這三四年來，人們公然咒咀我們，呼我們爲飽食暖衣之徒。被壓迫的人民的憤恨和輕視已經猛烈起來。」（我們應該怎樣辦）？

【註三】革命的農夫 Boardarow，希望這法則能成爲普遍的義務。託爾斯泰受他的影響很大，同時也受了另一農夫 Sutaiev 的影響。我的「一生中，這兩個俄國的思想家，給我偉大的影響。他們使我思想豐富，且爲我解釋我自身的世界觀。這兩個農夫是 Boardarow 和 Sutaiev。」

【註四】酒精與烟草一書（於一八九五年題作不正當的行樂而發行）俄文原題爲人們爲什麼迷醉的呢。

第十三章 藝術與良心

在他周圍，託爾斯泰的道德的革命，很少得到同情；並且使他的家庭和親戚驚憂。

託爾斯泰夫人，久已不安地察覺到她所不能制服的一種徵候在進展着。一八七四年後，她看到他的丈夫費了那麼許多的時間在學校事業上，不由得發怒了。

「這綴法，這算術，這文法，——這些我都輕視。要我對於這些假裝一點高興的樣子都做不到。」

接着教育問題而來了宗教問題的時候，情形又兩樣了，當託爾斯泰改了宗教，向她第一次宣布的時候，她的態度是表示着非常的敵意，使得他覺得有請求諒解之必要。他在給她的信中說：

「你不要厭煩，不要做出像以前我對你談到上帝時，你所表示的那種態度來；我實在無計避免，因為上帝實在是我的思想的基礎。」

無疑地夫人是被他感動了的；她努力抑制自己的氣憤；然而她不理解；她不安地觀察她的丈

夫：

「他的眼睛是異樣的，固定的。他差不多不說話。他好像不生在這世界上。」

她疑心他是生病了：

「萊翁是竟日工作着，關於他所說的那些事情。啊啊！他寫了數種宗教上的論辯，他讀了又想，直到頭痛爲止，這一切，都爲了要證明教會與福音書的教義不相符合。在俄羅斯，對於這事曾感到興味的人，恐怕不到十個罷。然則他實在什麼也沒有做，我祇希望一件事：希望他快點做完，而且希望這祇如生了一場病一般的過去。」

這病却一點也沒有過去。夫婦之間的情況逐漸變成痛苦起來了。他們相愛，他們相互懷着很深的敬意，然而他們却不能彼此理解。他們努力各相讓步，但結果——這是時常如此的——祇落得互覺痛苦。託爾斯泰勉強跟着一家人，到莫斯科去。他在日記中寫着：

「我的一生中最苦悶的月份，莫斯科的任務。誰都就了職，他們到底什麼時候才開始生活呢？這一切，並不是爲了生活，不過因爲別人這樣做，所以他們也這樣做。不幸的人們……」

在同時，他的夫人寫着：

「莫斯科，到了明天，我們在此恰已一月了。頭兩個禮拜，我每天哭，因為萊翁不但憂鬱，并且完全頹唐了。他不睡，不食，有時候甚至於哭；我相信我要發狂了。」

有一時候，他們離居過。後來，他們要求寬恕彼此所給的痛苦。他們照常的相愛！……他寫信給她說：

「你說：『我愛你，但你不需要我的愛。』這是我所需要的唯一的東西……你的愛比世界上的一切還使我歡喜。」

但他們聚首以後，又不和起來。夫人實在不能同感於他的宗教狂，這一回宗教狂竟使得託爾斯泰跟了一個猶太學者去研究起希伯萊語來了。

「別的東西一點也不引起他的興味。他盡力做些愚蠢的事。我不能隱忍我的不快了。」
她寫信給他：

「以如此的知識之力去鋸木，去燒湯，去縫靴子，實在使我悲傷。」

并且，她以一個看着發狂一般遊戲着的兒子的母親的又深情又譏諷的微笑，附加了這幾句：

「最後，我是像俄國諺語裏所說似的安心下來了。『隨便小孩子怎樣去玩，祇要他不哭！』」

但這封信尙沒有發出，她想像她的丈夫的天真的眼睛，看到這幾行時，會被這譏諷的調子引起苦痛；在愛情的激發中，她重新拆開這信：

「突然之間，你是這樣明白地在我眼前出現。我對你感到非常柔情的激發！在你那裏有如此聰明，如此善良，如此純朴，如此忍耐的某物，這一切被對於萬人的同情的光所照明，還有這直透靈魂的日光……這些祇屬於你一個人的。」

這樣子，這兩個相愛的人，彼此相苦，後來，大家因為不能阻止那做出來的不幸的事而感到絕望了。這無法可救的狀態，差不多延續了三十年，作為結局，是那老·李亞王(Roi Lear)，在一個迷惑的刹那，逃了出去，拚死的，穿過了曠野。

世人不大注意在我們應該怎樣辦的結尾的對於婦人們的動人的控訴——託爾斯泰對於現代的女性，毫無同情。但是對於他所稱為「母的女人」，對於那認識人生的真諦的婦人，他却熱誠地致其敬愛之詞；對於她們的苦痛和歡喜，妊娠和母性，可怕的苦悶，無休息的歲月，竭力的，不可見的，不望酬報的勞動，以及她們完成自然的法則時從苦痛中產出的，潤澤靈魂的幸福，他獻呈了華美的頌辭。他描繪了他的勇敢的賢妻的肖像，她對於他是一種助力，不是一種阻力。她知

道：「唯有無報酬的為他人的生活作寂寞的犧牲，乃是人類的天職。」

「這樣的一個婦人，非但不鼓勵他的丈夫去做唯以享受他人的勞動為目的的不自然的詐偽的工作；本且懷着恐怖和嫌忌，她祇怕這種活動成爲她的孩子們的誘惑物。她要求她的同伴者從事於需要精力的，不畏危險的，真正的勞動……她知道孩子們，那未來的時代的主人翁，是要給人們視爲更神聖的人類的。而女人的一生，就生在乎從事於這神聖的工作。她在她的孩子們和她的丈夫的身上開發他們的犧牲的力量……唯這一類的婦人，她們能支配男子，作男子們的引導的明星……哦，母的女人！你們的手中存在着世界的救星！」（我們應該怎樣辦的最後幾行）

這是希望尙未消失時的哀願之聲的控訴……她竟沒有聽到麼？……

數年之後，他的最後的希望的光，終於消失了：

「你也許不相信；但是你想像不到我是如何的孤獨，到某一程度，我的真的我已爲四周的一羈人所蔑視了。」（致一友人書）連他的最親愛的人們也這般誤解他的道德的轉變的偉大性，不必說，別的人們是更不能洞察他，尊敬他了。託爾斯泰與屠格涅夫的講和（註一）與其說是因

爲他對於對方的感情有所變更，不如說由於他那基督教的謙遜的精神。屠格涅夫諷刺地說：

「我很怕託爾斯泰；然而，如法國人所說：各人按照他自己的方法殺死虱子。」

此後數年，臨死的時候，屠格涅夫寫給託爾斯泰一封著名的信，也希望他的「朋友，俄國的大作家」還是「回到文學去罷！」

所有歐洲的藝術家們，都抱着和瀕死的屠格涅夫的切望和祈禱。伏古埃在一八八六年奉獻於託爾斯泰的研究書的卷末，藉口於穿着農民服的握着針的作者的形象，呈給他一篇雄辯的轉呼法：

「傑作的工匠呵，這不是你的工具！……我們的工具，乃是筆；我們的田地是人類的靈魂，這個我們也應該庇護他，培養他。請你記得那個俄羅斯農民，那莫斯科第一個印刷工人的呼聲，那時，他重新去把犁鋤：『我的事務不是播小麥的種子，而是把精神的種子廣播於世界』」然而，託爾斯泰却是有永遠捨棄他的精神的種子的播植者的職務的樣子了，……在我的信仰存在於何處的結末中。他寫着：

「我相信我的生活，我的理智，我的光明，單是叫我去啓他人之蒙。我相信，我對於真理

的知識，是一種才能，這才能把我許給這目的，這才能是一種火，但祇在燃燒起來的時候是火。我相信我的生活的唯一的意義，是生活在我身上的這光明之中，而且把這光明高舉在衆人之前，使他們看到。」

然而這光明，這火，這「祇在燃燒起來的時候是火」，却使大部分的藝術家們不安了。他們之中最伶俐的，並不是沒有豫見到他們的藝術冒着將第一個被火災所犧牲的危險。然而他們却假意地相信藝術的全部是被威脅着，而且，公然地說，託爾斯泰是永遠擊碎了創造的幻想的魔法輪了。

然而，這是一點也不對的；我能夠指出，託爾斯泰非但絕對不曾毀滅其藝術，本且把他輟耕期內所賸餘的精力，都激勵起來了，他的宗教信仰，非但不曾滅殺他的藝術家的天才，反而使之新生了。

〔註一〕 他們媾和於一八七八年春天，託爾斯泰寫了一封信給屠格涅夫，求其原諒，一八七八年四月，屠格涅夫來

到耶斯耐·耶波里安那，託爾斯泰於一八八一年七月回拜他。一切人都被他的態度的變化，他的和氣，他的

的謙遜所感動，他好像再生了。

第十四章 藝術之批評

奇怪的是，人們談到託爾斯泰對於科學和藝術的觀念之際，往往不提起那表現着這些觀念的著作中最爲重要的一方面：即我們應該怎樣辦？（一八八四——一八八六）。在這之中，託爾斯泰開始對科學和藝術宣戰，以後的戰爭，也從沒有像這第一次交鋒似的激烈過。新近在法蘭西所起的對於科學和主知主義者的空虛的攻擊中，誰也沒有想到引用該書中的諸頁，實也可異。這些書頁中，對於「科學的宦官」和「藝術的海賊」表白着未嘗聞的最可怖的攻擊。他又攻擊這樣的知識分子：他們在破壞了或征服了教會、國家、軍隊等等舊統治階級之後取而代之，而不思也不能做些於人類有益的事，反而要求人們盲目地讚美他們，奉仕他們，又布告了教義似的厚顏無恥的信仰，什麼「爲科學的科學」什麼「爲藝術的藝術」——這些驅人的假面具，不過是用來證明他們的個人的言行是對的，同時又爲他們的奇怪的利己主義和他們空虛作辯解而已。

「一點也不要對我說起我是否定藝術和科學的，」託爾斯泰繼續說：「我非但不否認他們，

并且我要在他們的名義之下，去追趕那些出賣殿堂的人。」

「科學與藝術像麵包與水一般的是必需品，而且比較更重要……真的科學是負着爲全人類造真的幸福的使命的知識。真的藝術是負着爲全人類造真的幸福的使命的知識的表現。」

而且，他讚美那些「自人類的生存以來，或以豎琴，或以絃琴，或假形象，或用語言，表現善惡二心的爭鬥及爭鬥中之痛苦，對於善的勝利之希望，對於惡的勝利之絕望，以及對於未來的豫言的幻影之熱心的人們。」

他在燃着強烈的神祕的熱情的一頁中，描寫着真正的藝術家的姿態：

「科學及藝術的活動，祇在不計權利，唯知義務的時候，方有成果。唯其如此，唯其本質是犧牲的，故能爲人類所尊敬。所謂以精神的工作爲他人服務的人們，常因此工作之完成而受苦：因爲精神的世界，本來祇是苦痛和艱難的產物。犧牲和痛苦，這就是思想家和藝術家之命運：因爲其目的在求全人類的幸福。人類是不幸的，他們受苦，他們死亡；他們無暇逍遙取樂，思想家或藝術家，並非如吾人向來所相信似的，永遠高踞於奧林比亞山之上峯；他們常在爭鬥與感動中。他們應該決定，應該宣言那給人類以福祉，脫人類於苦痛的事，他們再不決

定，再不言言，一到明天，也許遲了，他們自己將死亡了。……並非在製造藝術家和學者的學校裏面（實則這場所，祇造出科學和藝術的破壞家出來）。長大的人，並非那些得過畢業證書受着俸給的人，就會成功一個思想家或藝術家；祇有那幸而不曾把別人硬塞進他心中的東西，拿來思索，拿來表現，并且非如此不可的人，纔是真正的藝術家和思想家；因為他是被兩種不可見的力所曳着：他的內心的要求和他的對人類的愛。吃得胖胖的，享福的，祇圖一人的滿足的藝術家，是沒有的。」

這在託爾斯泰的天才上投了一個悲劇的光的燦爛的數頁，是在莫斯科的窮狀所引起的痛苦的直接的刺激之下，以及認科學和藝術是伴着社會的不平等和偽善的殘忍性的近代的全制度的共犯者這確信之中，寫成的。——這確信，他永遠不會失去。然而第一次所見的世界的慘苦的印象，漸漸淡薄下去，瘡口的血漸漸少了下去；在他以後的著作中，再也不能發現像在此書中振動着的苦痛的戰慄和復仇的忿怒了。無論何處，像這般以心血寫成的藝術家的信念的崇嚴的告白，這「作爲思想家之命運」的犧牲和痛苦的張揚，這對於哥德式的奧林比亞的藝術的憎惡，再也看不到了。此後的言及藝術批評的著作，是把這問題，從文學的不大神祕的立場上來討論了；藝術的

問題，是從人類的慘苦的背境中脫離出來了。——但託爾斯泰每次想到這人類的慘苦，就覺得昏替，好像那夜訪問貧民的下宿處之後，回到家裏，就嗚咽着絕望地叫喊起來一般。

然而這並不是說他以後這些專門的著作永遠是冷淡的。冷淡，在他是做不到的，直到他的一生的最後，他還是像寫給輝脫的信中的一般的人物：

「人們要是不愛他所描寫的人物，連那些最卑劣的，那麼，應該用一種侮辱得天都要發熱的態度去侮辱他們，或者笑破肚子地去嘲笑他們。」（這是爲了屠格涅夫的「憂鬱的不易消化的」藝術使他不快而發的）。

他在他的藝術理論中，並沒有弄錯。這消極的部分——侮辱和嘲笑——是唯一的打動藝術家們的心的，力強的部分。這論旨非常激烈地中傷了這些藝術家們的迷信和盲從。就是在他們的藝術的敵人和一切藝術的敵人那裏，也不會見過這樣的中傷。但在託爾斯泰的批評中，決不是沒有建設的要素的，他絕不是爲破壞而破壞，而是爲再建而破壞的。然而因爲謙遜之故，他一點也不表示自己要從新建設；他擁護真正的藝術，始終反抗想利用牠侮辱牠的偽藝術家們的那種藝術：

「真的科學和真的藝術，常常存在，而且永存於將來；你要攻擊他，是不可能的，無用

的。」他在一八八七年的一封信（這信寫於有名的藝術論之前十年）中寫着。「一切現在的罪惡。來自那些自稱爲文明人士，如學者，如藝術家，是僧侶一般的一個特權階級。而且這階級具有一切階級所有的一切錯誤，他把作爲他自己的組織的基礎的原則墮落了，降低了，我們的世界中所說的科學與藝術祇是一種大規模欺詐（Humbug），一種大的迷信，自從我們脫却了教會的古老的迷信之後，却又陷於這一種迷信中了，爲了明白我們所當走的路，我們應該重新開始——應該揭掉那雖使我們溫暖，但是遮斷了我們的視線的帽子——。誘惑是很大的，我們生下來，我們踏上梯子的階段之際，我們看到自己是處身於特權階級，文明的僧侶，如德國人所說的 *Ordens*（文化）之中。我們應該像對付婆羅門和天主教的僧侶一般的，有充分的真摯和對於真理的深的愛情，去懷疑那些保證我們可以得到有力的地位的原理。然而一個認真考察人生問題的人，不能逡巡躊躇，若要開始明白地認識一切，必須脫却他周圍的一切迷信，即使這迷信於你有利，這是一個 *Sine qua non*（必須的條件）……不要帶着迷信。要使自己處在小孩子的或笛卡爾的地位……」

這爲遊惰階級所滿意的現代藝術的迷信，「這大規模的 *Humbug*」，託爾斯泰在其藝術論（即

藝術是什麼？中非難着。他以激烈的調子，暴露這種迷信的滑稽、貧乏、偽善及根本的腐敗之處。他一掃而空，他看着這些的瓦解感到小孩子故意破壞其玩具一般的歡喜。這藝術批評的全部，時時洋溢着幽默，但也有不公正的處所：這是一場戰爭。託爾斯泰使用各種武器，不管將來是誰，任意衝鋒陷陣。有時候，好像在每次戰爭中似的——他竟打傷了他自己所要保護的人物：如易卜生和裴多汝。這種錯誤，實由他在行動中無暇反省的熱狂所致。換言之，是他時常昧於理智的脆弱的熱情所致的結果，也可以說是他的藝術家的修養不完全的結果。

在文學的研究之外，他對於現代的藝術還有什麼別的心得呢？這個在莫斯科的鄉間過了一生的四分之三的生活，在一八六〇年以後沒有再到過歐洲，而且在外游中，他的興味祇在乎幾個學校方面的鄉下紳士，在繪畫中何所見呢，在歐洲的音樂中又何所聞呢？——關於繪畫，他只憑耳食之言，雜亂無章地舉些頹廢派的作家如：Pavis (法) Manet, (法) Monet, (法) Beoklin (瑞士) Stuch (德) Klinger, (德)。又以感情巧妙為理由，堂堂地讚美——Jules Breton (法) Ihermitte (法) 一通，他看輕密閉郎其羅，說到靈魂的畫家們，却一次也不會提到 Rembrandt——在音樂方面，他接觸得比較多，但也一無所知：他祇記得兒時所得的一八四〇年代的古典作家的印象，此後

的，他完全不知道了（獨有却可夫斯基（Tschchaikovsky）的音樂，曾使之流淚），他把 Brahms 和 Richard Strauss 投入同一囊底，他談論裴多汝。他爲了批評華葛納爾曾去聽過一次 Stiefel 的公演，他在開幕以後纔到場，不到第二幕的中段就跑了，這樣自以爲已經很懂得了。——在文學上，他自然比較多懂得些，但是他迴避對於他所熟知的俄國作家的批評，却去給外國的詩人們起草法則，那些詩人的思想同他自己是很不同的，並且他讀他們的書是很不注意的——這是多麼奇異的顛倒呵！

他的大膽的斷案，與年齡而俱增，他終於寫了一本書，爲了證明莎士比亞「不是一個藝術家」。

「他可以成爲別的一切；但他不是一個藝術家。」

稱讚這個確信！託爾斯泰一點也沒有疑惑，他不費什麼議論，他有真理。他告訴你：

「第九交響曲是離開人類的作品」（正確地說是：「第九交響曲不能結合全人類，祇結合了少數人，又使這少數人從別的人們分離。」）

或者：

「除了罷哈爲梵啞鈴而作的有名的歌調，曉邦的變五調夜曲，以及罕頓、莫差爾德、修佩爾德、裴多汶、曉邦的作曲中一打左右（不是全部）的樂曲……所有其餘的，都該被丟掉被輕視，因爲是一種離開人類的藝術。」

或者：

「我將證明，莎士比亞連列入第四流作家都不配。在性格的描寫上，他毫無地位。」
即使他以外的全人類的意見和他異趣，他也不躊躇：我反對！

「我的意見」他傲然地寫着：「與全歐洲對於莎士比亞的定評完全不同。」

他對於虛偽的憎惡使他到處喚出不真實；一種思想若流行得愈普遍，他便對之愈反對；他懷疑，他猜測，例如他說到莎士比亞的名聲：「時常給人們以影響的流行的勢力之一。正如中世紀的十字軍，對於魔術的信仰，智者石之探求，以及馬蘭花的流行熱，祇在一旦脫離了這種勢力以後，人們才會看出其愚蠢。隨着印刷術的進步，這些流行病是變成特別的出奇了。」——作爲這類傳染病的最近的例子，他舉出「特萊孚思事件」(L'Affaire Dreyfus)，一切不正義之敵，一切被壓迫者的擁護者納他，却以一種侮蔑的冷淡，談論此事【註一】。這是一個很顯著的例子，足見

他的對於說謊的疑惑和對於「道德的傳染病」的本能的憎惡，能夠把他導入極端的態度，對於這種態度，他自己也明知不對，然而不能克服。他稱李亞王爲「不合理的作品」，稱那昂然的柯爾兒理亞（Cordelia）爲「無性格的人物」，這實在是反乎人間的道德的，是誘導魂之預言者的不可思議的盲目力，亦爲熱情之力的誘發物。

我們且來注意他所明瞭地看到的莎士比亞的實際的缺點罷——其實我們還不能承認這些真是缺點——就是：對於一切人物，都給與一式的詩的措辭的技巧的性質，以及熱情、勇氣，而且單調的修辭。這個在作家之中最非文人的託爾斯泰，對於那文人中的最天才的人的藝術之所以缺乏同情之故，我是十分明白的。然而，爲什麼費了許多的時間去說些人們所不懂的話呢？而且他的對於那已經關了門的世界的判決，到底含有怎樣的大的價值呢？這却是不可解的了。

假使，叫我們依據這些判決，去找尋未知的世界的鑰匙，則是毫無價值的。假使叫我們向這些判決去討取託爾斯泰的藝術的鑰匙，也是無價值的。我們並不向一個創造的天才，要求批評家一般的大公無私。當一個華葛納爾，一個託爾斯泰談論裴多汶或莎士比亞時，其實他們所談的並不是裴多汶或莎士比亞，他們其實在談論他們自己；即表明他們自己的理想。他們並不想改變我

們的觀念。爲了批評莎士比亞，託爾斯泰並不一定想站在「客觀的」立場。而且，他之所以非難莎士比亞，即非難其客觀的藝術。戰爭與和平的描寫者，無人格的藝術的大家的他，對於這班跟在哥德後面發明「莎士比亞」而且發明「藝術應該是客觀的理論，即超乎一切道德價值之外，去再現現象——即對於藝術的宗教的目的之否定」的德國批評家們，不至於十分地去愚弄他們的。

這樣子，託爾斯泰是站在一種信條的頂點來評價藝術的，在他的批評中，用不到找尋他個人的微旨。他沒有把自己的作品引作例子；他對於自己的作品如對於別人的作品一般，也毫不姑息。〔註二〕。然則，他實際上的用意是什麼呢？他所發表的宗教理想，對於藝術，究竟有何意味呢？這理想是很華美的。「宗教藝術」這標語，因其概念的範圍之廣泛，很易使人誤解。託爾斯泰不會把藝術的領域縮小，却把牠擴大。他說，藝術是到處存在的。

「藝術深入於我們的全生活；我們名之曰藝術者，如演劇、演奏會、書物、展覽會等等，實爲藝術之最低的部分。我們的生活，充滿着各種藝術的表現，自兒童之遊戲以至宗教的儀式——藝術與語言爲人類進步之兩大機關。一則溝通感情，一則溝通思想。若有一陷於邪路，社會即成爲病態。今日之藝術却正陷於邪路。」

自文藝復興以來，所謂基督教國民的藝術，我們已經談不到了。階級分裂着，富人、特權者皆欲獨占藝術；依彼等自己之娛樂而定美之標準。藝術離開了貧民，也變得貧弱起來了。

「不為生活而勞動的人們所經驗的情緒的範疇，較之勞動的人們的情緒要狹得多。我們的現代的社會的感情，可以還元為三種：傲慢、肉慾、及生之倦怠。這三種感情及其副產物，構成富人們的幾乎全部的藝術的主題。」

他腐化世界，他誘壞民衆，他傳播性的墮落，他成爲人類的幸福的實現的最可惡的障礙。此外，他沒有真的美、不自然、無誠實——一種矯飾的、偽造的、大腦的藝術。

和這耽美主義者的虛偽相對立，和這富人們的消遣品相對立，崛起了生命的藝術，人的藝術，結合一切階級，一切國的人類的藝術。過去的時代，對於我們，供給了光輝燦然的例證。

「能夠理解我們所認爲最高的藝術而且愛之的，時常是人類的大多數：例如他們的對於：創世記的敘事詩、福音書的寓言、傳說、故事、民歌。」

最偉的藝術，是表現其時代的宗教的意識的藝術。但這裏絕對不要解釋作教會的教義的意味。「每個社會有一種生活的宗教概念，這是這社會所趨向的最大的幸福的理想。」無論何人，對

此都有某一程度的明瞭的感覺；二三先覺者纔把這明確地表現出來。

「宗教的意識，時常存在着。這是河水在上面流着的河床。」（正確地說：「這是河流的方向。」）

我們這時代的宗教的意識，是待人類的友愛而實現的對於幸福的憧憬。祇有爲這個結合而努力的藝術，方是真正的藝術。最高的藝術是由愛之力直接地完成的藝術。然而，還有另一種分擔這工作的藝術，乃是以嘲笑和憤激爲武器，向着一切反對這友愛的東西施攻擊的。例如：迭更斯的小說，陀斯妥益夫斯基的小說，蕭俄的悲慘世界，以及米葉的繪畫等皆是。還有雖未臻這樣的高度，但以同情和真理，表現日常生活，使人類互相接近的藝術。如吉訶德先生和莫理哀的戲曲。實際上，最後一類的藝術，常因其過於微細的寫實主義及題材的貧弱而陷於失敗，「與莊嚴的約瑟夫故事等古代的模範，不可同日而語。」技藝的極端的精密，對於這些作品反而有害，因此不能成爲普遍的藝術。

「近代的作品，被寫實主義所污，這寫實主義，實在說來祇是藝術上的方言。」

因此，託爾斯泰不躊躇地非難他自己的天才的原則。爲了未來，而犧牲自己——甚至於他的

作品將絕無遺留，那有什麼要緊呢？

「將來的藝術決不繼承現在的藝術的發展。這該是築於別的基礎上面的。這決不是某一階級的私產。藝術不是一種職業，這是真正的感情的表現。因此，藝術家祇在當他不孤立的時候，當他在人間過着自然的生活之際，始能經驗真正的感情。所以，逃避人生的人，一定是處於創作上的最壞的狀態的。」

在將來「藝術家將是一切具有天稟的人」。藝術活動將為每個人所能接近「而由小學校的音樂與繪畫作導引，音樂與繪畫將與文法之初步規則同時教給兒童。」而且，將來的藝術，不再需要像現在這般的複雜的技巧，而傾向單純、明晰以及簡潔，如健全的古典藝術，荷馬的藝術所固有的那般〔註三〕。在將來的藝術中的純粹的章句中注入普遍的感情，該是何等的美麗呵！爲了萬衆而制作一個故事或一首歌曲，畫一個形象，比寫一部小說或作一首交響曲更有意義——也更難。這是廣大無邊的處女地。靠了這樣的作品，人們纔會知道友愛的結合的幸福。

「藝術應該鎮壓暴力，這祇有藝術做得到。他的使命是使神之王國——即愛之王國實現。」我們之中，誰不是認這些偉大的言辭呢？誰不看到託爾斯泰的烏托邦的也有點幼稚的理想，

是有生氣的豐饒的呢！是的，我們的藝術的全部祇是一個階級的表现，并且又一國一國的，區分為許多敵對的小部落。在歐洲，沒有一個藝術家的靈魂能夠實現黨派和人種的結合。在我們這時代，最為普遍的，要算託爾斯泰自己的作品，在他的作品之中，我們大家相愛，一切民族，一切階級的人們都發生同情感，無論誰，像我們一般，嘗到了這廣大的愛的力的歡喜之後，將不能以歐洲的文壇所供給的人間的偉大的精神的斷片零爪為滿足罷。

【註一】「這是時常發生的事件之一，毫不引人注意，也不使——我不說全世界，但是連——法國的軍界發生興味。」

……

更進一步：

「若要人們從他們的迷夢覺醒，要他們明白自己實在沒有懂得特萊孚思是否有罪的資格，而且要他們有比對於特萊孚思事件更重要更直接的興味，還須好幾年呢。」

【註二】他把自己的「空想的作品」也列入「有害的藝術」中。（藝術論）

【註三】一八七三年時，他已經寫了如下的話：「隨你所高興的想去。但要用這樣的方式來寫，使得每一個字，能被

從印刷所載運書籍的車夫所懂得。在一種完全明瞭而簡單的語言裏，誰也不應該寫壞一點。」

第十五章 「民間故事」與「黑闇之力」

最美的理論，須有作品爲之證實，始見價值。在託爾斯泰，理論之與創作，恰如信仰之與實行，常常一致。當他推敲藝術論之際，同時提供了他所希望的新藝術的模範——即藝術的兩種典型，一種高級，一較不純，而同爲最人性的意味上的宗教的藝術——其一藉愛而求人類之結合，其一則與愛之敵人作戰。他著了這類的傑作：伊凡·伊力支之死（一八八四——八六）民間故事（一八八一——八六）黑闇之力（一八八六）克婁柴·梭拿大（一八八九）以及主與僕（一八九五）。劃了這藝術時期之頂點和終點，猶如雙塔對峙的教堂，一方面象徵着永遠的愛，另一方面象徵着對世界之憎恨者，則爲復活（一八九九）。

這些作品，以其新的藝術色彩，與以前諸作迥異。託爾斯泰的思想，僅在藝術的對象上無所變異，而形式則大變。我們在藝術論和莎士比亞論中讀到他所宣言的趣味及表現的原理（藝術原理）不能不吃驚。這些原則的大部分，與他先前的最偉大的作品，是大相矛盾的。「明晰、單純、

簡潔，」我們在藝術論中讀到。輕視題材的效果，非難微妙的寫實主義。——又在莎士比亞論中：完全均衡的全是古典的理想。「沒有均衡這一種感情，即無藝術家之存在」——縱使在這些新作之中，這老人做不到完全湮滅他的解剖的天才和固有的殘忍性，特別是後者的性質，在某種方面，反而顯現得更強，但他的藝術，到底是有了很大的改變，如結構的明晰增加強力的調子，心理描寫之更加簡潔，如內部的情節之更加集中，若思竄之困獸的集中其身，如情緒之普遍性，毫不拘泥於地方色彩的寫實的一時的細目，最後，如措辭之豐麗清新，使人聞到大地之土香。

由於愛民衆之一念，使他長期欣賞民間語言的美質。幼年時代，他已被乞食人所演說的故事所感^動了。長成之後，成了大藝術家，他與農民的談話，時常得藝術的歡喜。

「這類人」後來他對鮑耶先生說：「是一班大家。從前，我同他們談話的時候，或者同那些背了襤褸經過我們鄉下的漂泊者們談話的時候，我非常注意他們的言語的表現，我有生以來初次聽到他們的言語，竟至於時常忘記我們的近代文學上的語法，而祇是敲響着俄國的古代的貨幣……是的，言語的天才，存在於這類人身上……」

他對於這類語言是變得這樣的敏感，使他的心再不顧慮到文體之類了〔註一〕。因為遠離城

市，長久生活於農民之間，他稍稍帶了點民衆的思想方式。他知道慢慢的辯論的方法，他知道先是一步步的進行，然後出其不意突然使之不知所對的這種辯論的常識，他懂得把一個已經相信的觀念，用同樣的話，反來覆去，纏夾不休的脾氣。

然而前面所說的幾點與其說是特色，不如說是缺點。多年以來，他已經注意到潛在於民間語言的精華，即其象徵的風味、詩的素朴、豐富的傳說的智慧。在著作戰爭與和平的當時，他已開始接受這影響。一八七二年，他寫信給斯脫拉珂甫 (Старков)。

「我將變更我的語法和作法。民間的語言，含有詩人所能說出的表現用的聲音，這對我非常親熱。這種語言，實爲詩的最好的調整器，誰要是想說些過分的、誇張的、虛僞的話，這種語言就不能適合。因爲我們的文學上的語言是沒有骨骼的，所以我們可以把牠向各方面牽來扯去，終歸像是文學。」

他不但從農民得了文體的模範，而且得了幾多的靈感。一八七七年，一個 Bylina (俄語傳說之意) 的演說者來到耶斯耐耶、斯里安那，託爾斯泰記下了他所講的許多故事。其大部分構成人類依何者而生活和三老人。這兩篇，如大家所知道，是託爾斯泰在後來所發表的民間故事中最美

麗的兩篇。〔註二〕

這些近代藝術中獨一的作品，是藝術以上的高級的作品：讀着這些作品時，誰會想到文學麼？福音書的精神和全人類同胞的純潔的愛，結合在農民的智慧的微笑的純朴中，不可磨滅的心的單純性、清澄性、善良性——以及有時候非常自然地潤澤全畫面的超自然的光明！這種光明籠罩着中心人物的老愛理材（Errege。見二老人），也翱翔於製靴匠馬丁的小店中——馬丁從和地面一樣高的天窗中，眺望行人的腳，同時，神變裝為窮人的樣子，爲了救助這善良的鞋匠而來訪問他（愛在處神亦在），在這些故事的福音書一般的寓言中，時常混入着不可言說的東方的傳說的香味，如在託爾斯泰幼年即所愛讀的一千零一夜的那些，有時候，夢想的光，變成很可怕，給故事以一種大的恐怖性。如農民巴孔，這人是因爲得了許多土地致死的。他整整走了一天，兜了一個圈子，這圈子以內的土地全是他的，他走完的時候就死了。

「在小山上，那 Savashina（巡查）席地坐着，看巴孔在跑，他兩手捧着肚子呵呵大笑。而終於巴孔倒斃了。

「『喂！好勇敢，好漢！你得了許多土地了。』

「巡查站了起來，擲給巴孔的僕人一柄鋤頭：

「那邊，埋了他。」

「僕人獨個兒立着。給巴孔掘了一個洞，照他從頭到腳一般的長：三俄尺——把他埋了」
差不多這些故事的全部，在詩的外觀之下，包藏着同樣的捨棄和寬恕的福音書的道德：

「勿對於侮辱汝者復仇。」

「勿抵抗作惡於汝者。」

「復讎在乎我，主說。」

無論何處，無論何時，結論都是愛。企圖建設一種為萬人的藝術的託爾斯泰，第一着就贏得了普遍性。他的作品在全世界中，得了無止境的成功：因為在這裏，會得消滅的藝術的要素都已淨化，除了不朽的性質以外，別無其他了。

黑闇之力沒有做到這樣的心的莊嚴的單純性；可以說一點也沒有：這是一把利劍的另一刃面。一面，是神聖的愛的夢想，他一面是陰慘的現實。讀了這戲曲，我們能夠看出託爾斯泰的信仰和他的對民衆的愛竟能夠不絕地驅使他把民衆理想化，而且宣揚真理！

託爾斯泰，他的大部分關於戲曲的論文是很不高明的，但在這裏，却升堂入室了。人物和動作都隨意處置着：花花公子的尼啓他（Nikita）、亞西那（Assina）的奮激的情熱和肉慾，母子通奸的老婦人馬特萊娜（Matrena）的不顧廉恥的坦白，以及口吃的老亞金姆（Akim）的信心——上帝棲身在一個滑稽的人的身上——此後，是尼啓他的墮落，他是柔弱的，心腸並不壞的，但是犯了過失，滾入罪惡的深淵，他自己努力懸崖勒馬，也來不及；他的母親和妻子拖累他……

「農民是不配看重的。然而農婦們呢！畜生而已！她們毫無所怕……你們，這些別的姊妹們，你們這些人，在俄國是很多的。你們像土撥鼠一般，是完全盲目的，你們一無所知，你們一無所知！……一個農夫，他至少，還懂得多少事情，在酒店，或者——誰料得到呢，在牢監在兵營；然而一個農婦……什麼？她一無所見，一無所聞。她這樣的長大，這樣的死亡……她們好像盲目的小狗一般，跑來跑去，把頭去鑽糞堆。她們祇知道她們的愚蠢的歌：『嗚——嗚！嗚——嗚』……但這是什麼？嗚——嗚？……她們也不知道。」

接着，是謀殺初生的嬰兒的可怖的場面。尼啓他不願意殺死嬰兒。然而，亞西那，爲了他而殺害了自己的丈夫的亞西那，自從犯罪以來，神經已陷於苦痛的亞西那。變成凶猛了瘋狂了，用

要把他引渡給警察的話威脅他，她叫道：

「至少，我不至於獨自成爲罪人了。他也要變成殺人犯了。要使他明白這一點。」

尼啓他把嬰兒放在兩塊板中間壓死。犯了這罪後，他恐怖地逃走了，他威嚇亞西那和他的母親，他哭着，他懇求：

「我的母親，我不能再做什麼了！」

他髣髴聽到被壓死的小孩的呼聲。

「我在何處可以得救呢？……」

這是莎士比亞的一個場面——在第四幕的改作中的少女和老僕的對話，雖沒有這般卑野，但更富於刺激——老僕一人在家，在當夜，傾聽着，猜測着外面的罪惡的進行。

結局！是自願的贖罪。尼啓他同他的父親，老亞金姆，赤着足走進婚禮席中，他跪下來，他求全體人的原諒，他自首所犯的一切罪惡。老亞金姆激勵他，以一種出神的痛苦的微笑着看他：

「上帝！哦！在那裏的，是上帝！」

於這戲曲給了特別的藝術之味者，是他的農民的語言。

「我爲了寫黑闇之力，翻遍了我的記事冊。」託爾斯泰曾對鮑耶氏這樣說。

這從俄羅斯人民的抒情的又諧謔的心中發出來的意外的想像，有一種興致和一種元氣，同這比較起來，一般文學的想像，都顯得失色。託爾斯泰於此抱着很深的興味，我們感到，這藝術家，寫着這劇曲之際，自己注意着這些表現和思想以自娛樂。這「使徒」雖在絕望於人類的靈魂的黑暗時候，但對於那些喜劇的方面，却毫不使聽其逃過。

【註一】他的友人特魯齊甯一八五六年時對他說：「關於文體，你是極其無學的，有時候像一個改革者和大詩人，有時候像一個寫信給同僚的士官，你懷着愛而寫的東西，都是很可佩服的，但你一隨便，你的文體就雜亂可

怕。」

【註二】一八六〇年的讀書手記中，託爾斯泰記着：「Bytiro 給我很大的印象。」

第十六章 「伊凡·伊力支之死」與「克婁柴·梭拿大」

一方面研究着民衆，從高處投了一道光明於彼等的黑夜，同時，託爾斯泰又對於中等階級及富者的更黑的夜陰，獻納了兩篇悲劇的小說。在這時期，我們看得出，戲曲的形式支配着他的藝術思想。伊凡·伊力支之死和克婁柴·梭拿大 (La Sonata à Kreutzer) 是兩種內面的，緊縮的集中的戲曲；在梭拿大，是由劇中的主人公自殺出來的。

伊凡·伊力支之死 (一八八四——八六) 是俄國作品中最能動法國大衆之心的一部。我在本傳卷端已經說過目擊法蘭西某省的一個對於藝術本來冷淡的中流階級怎樣地被這書惹起感動的事了。這是因爲，這作品，以駭人的真實性，暴露了這類俗人的一個典型的緣故。沒有宗教，沒有理想，差不多沒有思想的老實的官吏們，沒頭於自己的職分和機械的生活，一直到死的時候，方纔恐怖地覺察到自己實在不會生活。伊凡·伊力支是一八八〇年代的歐羅巴中產階級的代表，他們誦讀左拉，聽取沙拉倍奈爾 (Sarah Bernhardt)，毫無信仰，但也不是非宗教的：因爲他們從來

不把信仰或不信仰的問題自惹煩惱，——他們永遠不會想到這點。

以劇烈的攻擊，又辛辣又滑稽的反對世俗，尤其是反對結婚，在這一點，伊凡·伊力支之死揭開一系列新的叢書；這叢書披露了克婁柴·梭拿大和復活中的更其殘忍的畫面。這種生活（幾百萬人所過着的生活）的可憫可笑的空虛！試看他們的奇異的野心，不討好的自負心——「比每夜同老婆在一起稍爲有趣些的自負心」——的可憐的滿足，職業的焦心，乏味的特權，當做真正的幸福的骨牌戲（Würf）。而這種可笑的生活，却因一個更可笑的原因，就是有一天，伊凡想掛客廳中的窗幃，不意從梯子上跌了下來，而滅亡了。生活的虛偽、病的虛偽、祇顧自己的健康的醫生的虛偽，討厭生病的家庭的虛偽。假作守節，而丈夫一死就打算日後的生活的虛偽，普遍的虛偽。和這相反的，祇有不想在垂死的病人面前躲開，籠着兄弟一般的愛情看護着的深於慈的僕人的真實。伊凡·伊力支「對於自己充滿着無限的憐憫」，痛哭自己的孤單和人們的自私；直到這一天，他看出自己過去的生活，不過是一種虛偽，而且這虛偽是本來可以改正的，他於是痛心極了。俄而，一切都明白了——在他斷氣以前的一點鐘內。他不再想到自己，他想到家族，他憐憫他們，他「應該」死了，他「應該」把他們解放了。

「——你在那裏，痛苦？——在這裏，……是了，你祇要堅持到底。——死，你在那裏？……——他找不到死，代替了死，却有一道光明。——『完了』誰在那裏說。——他聽到這些話，而且反覆着。——『死再也不存在了』，他對自己說。」

這「一道光明」在克婁柴·梭拿大中不再出現了。這是一種殘酷的作品，恰如爲自己所受的痛苦而復讎的受傷的野獸似的，襲擊社會的作品。我們不要忘記這是一個殺了人的，中了嫉妬的毒的猶猛的人的告白。託爾斯泰隱在書中的人物的背後。無疑地，他的思想是在乎提高了聲調，以發狂似的怒言，反對一般的偽善，即婦人教育、戀愛、結婚——這「家庭的賣淫」——世俗、科學、醫生——這些「罪惡的播種者」。——的偽善。然而書中的主人公驅使着作者趨向表現的粗鹵和肉慾的幻像的亂暴——一個淫棍的全部狂熱——而且導向這些的反動方面的禁慾主義的一切忿怒，對於熱情的恐怖和憎惡，以及一個燃着肉慾之火的中世的僧侶所發的向人生的呪詛。寫完了這本書之後，託爾斯泰自己也吃驚了：

「我全然不曾豫想到，」他在克婁柴·梭拿大的跋文中說：「寫這書的時候，一種嚴酷的邏輯竟引導我到這地步。我自己的這些結論，最初很使我吃驚，我想不相信這些結論，但我做不

到……我祇好接受了。」

事實上，他不得不在一種明快的調子之下，反覆那反對戀愛和結婚而殺人的波斯特尼雪夫 (Postnikov) 的狂暴的叫喊……

「誰若懷着肉感而注視婦人——特別是他的妻——他已經淫了她了。」

「熱情一旦消失的時候，人類就沒有再存在的理由了，他已經實施了大法則、存在者的結合即將完成。」

他依據了福音書，照了馬太傳而指出「基督教的理想，不是結婚，基督教的結婚是不存在的，結婚，從基督教的觀點看來，不是進步的要素而為墮落的要素，戀愛及其前後的一切，皆為真正的人類的理想的障礙……」【註一】。

然而，在出諸波斯特尼雪夫的口之前，這些思想在他心中尙未如此明瞭地形成。正如在許多偉大的創作家那裏屢見不鮮似的，作品引導作者，藝術家先行於思想家。——而藝術却毫無所損。在效果的力量之點，在熱情集中之點，在印象的十分顯明之點，在形式的充實而圓熟之點，託爾斯泰的一切其他作品，皆不足與此書相匹敵。

現在應該把這題目來解釋一下。——正確地說來，這題目是不對的，這把作品的性質弄錯了。音樂在這裏祇是一個附屬品。把梭拿大（Sonata 譯者案：這原是一種琴樂之名）除掉了，這作品的性質一點也不會變的。託爾斯泰的錯誤在乎有兩個問題在心中混雜着：即音樂的誘人墮落之力和愛的誘人墮落之力。音樂的精靈在別的作品中另有討論。託爾斯泰在這作品中所給的音樂的地位不足以證明他所指摘的危險性。關於這問題，我要在此約略說明。因為我不大相信人們對於託爾斯泰在音樂上的態度，已經十分理解。

說他一點也不愛音樂，未免過甚。正因為音樂是人們所愛的，所以這樣地恐怕託爾斯泰不愛音樂。我們記一記在幼年時代尤其是在家庭的幸福中，音樂的回憶所占的地位如何；在家庭的幸福中，戀愛的自春至秋的全週期，展開在裴多汝的 Quasi una fantasia 的梭拿大的樂句之中。我們再記一記南克留獨夫和死的前晚的小彼蒂埃憑想像而聽到的華美的交響樂。（一個地主的朝晨之末）託爾斯泰學習音樂，極其平庸，但曾被音樂感動得下過淚；而且在一生中某幾時期，他曾熱中於音樂。一八五八年，他在莫斯科建立音樂團體，這後來成爲莫斯科的音樂館。

「他很愛音樂」他的舅兄倍爾思說：「他彈鋼琴，酷愛古典派諸大家。常常，在開始工作

之先，坐在鋼琴前面，也許他在此得到靈感。他時常伴着我的妹子，他愛她的歌喉。我注意到他被音樂所惹起的感情，使他臉部稍有蒼白，還有一種幽妙的微蹙，似乎表示恐怖之狀。」

在音樂的震撼到他的生命的根本的不可解的力的衝擊之下，他所感到的實在是恐怖！在這音樂的世界裏，他感到他的道德的意志，他的理智，他的生活的全部實相，都融合了。我們試再讀一次戰爭與和平卷中的尼古拉·羅斯妥夫的場面，他在賭場輸了錢絕望地回來，他聽到他的妹妹娜泰霞在唱歌。他於是什麼都忘了。

「他焦躁地等待依次出來的音調，暫時之間，他覺得在世界上祇賸了那四分之三的快速：『Oh! Mio Crudel! Affetto!』(啊！我的發狂的愛情啊！)」

「我們的生存是多麼的荒謬呵」他想：「不幸、金錢、憎恨、名譽，這一切都是空的……真理在這裏！……娜泰霞，我的小班鳩！……她不是已經唱到Si(第七音階)了麼？……唱到了，多謝之至！」

「他自己，並沒有覺到自己在唱。爲了增強Si的音，他也合上一個第三階音。

「『哦，我的天，這是多麼美麗！這音是我發出來的麼？多麼幸福呵！』他想；同時這三階

音的振動在他靈魂中喚醒一切最善最清潔的東西。在這超人間的感情之旁，那賭博的失敗，和承諾的言語，算得什麼呢！……混蛋！一個人可以殺人，可以做賊，但依然是幸福的。」

尼古拉不曾殺人，也不曾做賊，音樂對於他不過是一時的錯亂而已；但娜泰霞却於此失了自制力。這是在某晚的歌劇之後，「在這不可思議的世界，被藝術所催眠，離現實千里，善與惡、狂妄與合理，混雜不清」的時候，她聽取庫拉金的求愛的表示，而同意於私奔。

託爾斯泰對於音樂的恐怖，隨年齡而俱增。有一個人對他很有影響，即一八六〇年在特萊斯登 (Dresden) 所遇的奧爾罷哈 (Auerbach)，無疑地，這人增強了託爾斯泰的偏見。「他談到音樂，好像談到一種 Philosophen Genus (非禮的享樂)，照他說來，音樂是導向背德亂倫的誘因。」

在這許多墮落腐敗的音樂家中，為什麼恰好選着了最純潔最清廉的裴多汶呢？加米葉·倍雷格先生 (M. Camille Belaud) 這樣問。——因為裴多汶是最強的。所以託爾斯泰愛他，而且常常愛他。託爾斯泰的幼年時代的最遠的回憶與「悲哀的梭拿大」有關。又在復活的結末，南克留獨夫聽了 Symphonie en ut mineur 的「緩奏曲」 (Andante)，不禁淚下；「他自己覺得溫和起來了。」——然而，在藝術論中，託爾斯泰却奮激地說着「雙子裴多汶的不健全的作品的話；而且在一八七六

年，他已經懷着過激的心理，歡喜攻擊裴多汝，並且懷疑他的天才。」同時反抗却依柯夫斯基，使他對於託爾斯泰的敬意也冷了下來。克婁柴。梭拿大使我們看出這熱情的不公平的根本之處。託爾斯泰責難裴多汝的是那一點呢？是他的力。這恰如歌德一般，當歌德聽了「Symphonie en ut mineur」而被這樂曲所制伏的時候，他就忿怒地反抗起這個侵犯了他的意志的高傲的巨匠來。

「這音樂」託爾斯泰說：「把我直接帶入作曲家寫這曲時所有的那種心境……音樂應該是國家的事業，像在中國一般。這樣可怕的催眠的力量不當置於初來的人之手。……這些東西（梭拿的第一急調）祇准在某種重要的情勢之下演奏……」

但是，我們看，在這次反叛之後，他如何的又屈服於裴多汝之力，他又如何的自己承認這心力是使人高尙的純潔的力！聽着一首樂曲，波斯特尼雪夫陷入一種他所不能分析的不可名狀的心理狀態中，他的良心感到快樂，再沒有嫉妬的餘地了，他的妻也不見得變壞了。她在彈奏的時候有一種「端莊嚴肅的表情」而在「她奏畢之後，浮着柔弱的，慈悲的幸福的微笑」……在這一切之中，那裏有邪惡呢？——祇有精神是被控制着，聲音的不可思議的力量能夠隨意支配他，假使這力量要他滅亡，他也祇得滅亡。

這是真實的。但託爾斯泰不會忘記一件事：即音樂的作家和聽衆裏面，大多數人，是庸俗無生氣的。對於毫無感覺的人，音樂該是沒有危險的東西。演奏着莎樂美的歌劇院的光景，很足以保證，由音響的藝術所呼起的最危險的情緒，對於大衆，並沒有感染性。像託爾斯泰一般，要經驗苦痛，必須豐富生活。——事實上，託爾斯泰雖然對裴多汝施了不當的侮辱，但比起現今爲了隨喜隨喜的大多數人來，託爾斯泰還是對於音樂有深刻的感覺的。至少，他能夠認識這個「老聾子」的藝術中所吼着的狂肆的熱情和近乎野蠻的粗暴，現在的管絃樂隊和有名的音樂家，反而不大能夠了解這些呢。在裴多汝看來，那些「裴多汝黨」的讚美，也許還不及託爾斯泰的憎惡之有趣罷。

【註一】注意：託爾斯泰並沒有老實到相信現今的人類，能夠實現絕對的真潔和獨身的理想。照他的意思，這理想倒是不能實現的，因爲據他的解釋：這是對於具有英雄的精力的人們的呼喚。

第十七章 「復活」

復活〔註一〕與克婁柴·梭拿大之間，有十年的間隔，是日益專心於道德的宣傳的十年。而且距離他的渴慕不朽的生活所憧憬的結局也是十年。復活，在某種意味上，是託爾斯泰的藝術的聖書。恰如戰爭與和平裝飾了他的生活的圓熟期一般，復活支配了他的生涯的終點。這是最後的高峰，也許是最高的——即使不是最巨大的——是隱在雲霧中的不可逼視的極頂。託爾斯泰已經七十歲了。他省察世界，省察他的生活，他的過去的錯誤，他的信仰，他的義憤。他從高處俯瞰這一切。這是和他以前的作品中的同樣的思想，同樣的對於偽善的挑戰；但其藝術家的精神，恰如戰爭與和平中一般，遠離其題材而飛翔；於克婁柴·梭拿大和伊凡·伊力支之死的陰鬱的諷刺，動搖的心理之外，他又參入一種脫離世俗，朗照內心的宗教的寧靜。時常使我們想起他是一個基督教徒的歌德。

他的後期的諸作品中所表現的一切藝術的特色，就中尤其是較之在短篇中更為驚人的長篇小

說中的敘述的集中化，都出現在這裏。這作品，是統一的，這一點，與戰爭與和平和婀娜小史大異其趣。差不多沒有插話的枝節。以祇有一個的行動，堅固地貫通一切細目，穿鑿一切細目，和克莫柴·梭拿大同樣有充分地描寫的人物。觀察益加透明，益加有力，殘酷地寫實的，從人類中看出獸性——「存在於人間的動物的可怕的痼疾，特別可怕的，是在這動物性並不公然暴露而隱於所謂詩的外衣之下的時候。」這些客廳中的會談，這是祇以滿足肉體的要求為目的的：即「動着喉和舌的筋肉以刺激消化作用。」對於無論那一個人物，都不饒過一個奇特的幻像，例如那個漂亮的科爾却根 (Korchagina) 「肘骨突出，母指的爪甲很闊，」這使得南克留獨夫 「又羞恥，又厭惡。又厭惡，又羞恥。」——又如那個女主人公馬思洛瓦 (Maslova)，完全呈露着墮落之狀，她的未老先衰的身心，她的淫蕩而卑劣的表情，她的引起肉感的微笑，她的火酒氣味，她的紅而發燒的臉。還有一種充滿自然主義的精神的野蠻性，例如蹲在室內的馬桶上談話的婦人。至於詩的想像和青春的精神，是已經消滅了，除了少數的幾節還描寫着以音樂的魔力振動讀者之心，如初戀的回憶，復活祭的純潔之夜，以及踰越節之夜，雪之融解，「離家五步，就祇見到電燈的紅光閃爍的漆黑一團」的濃霧，中夜的鷄鳴，河中的冰塊的破裂作響，崩坍以及河中的回聲，有如

玻璃杯之碎裂，還有年青的人，站在戶外，窺伺窗中的少女，她沒有注意到他，坐在桌旁在一盞小燈的顫動的光下——這是卡都霞，思索着，微笑着，幻想着。

作者的這種抒情詩不過占很小的部分。他的藝術愈加變成無人格，愈加與他自己的生活無關了。託爾斯泰爲了更新其觀察的世界而努力，在此所描寫的囚人之世界和革命家之世界，在他完全是新鮮的；他僅以一種意識的同情的努力深入其中；他自己說在接近了親切地觀察一過以前，他對於革命家本來是懷着不可克制的厭惡的。最令人佩服者，是他的公平無私的觀察，不爽分毫的明鏡。他的典型是何等的豐富，他的種種細目又何等正確！而且，以怎樣的聰明的鎮靜和和藹的同情，毫不苛刻，毫不脆弱地，看到一切卑鄙和美德呵！……獄中的女囚的悲慘的光景！她們自己之間倒是沒有什麼同情的；但這個藝術家是一個上帝！他從每人心中看到隱在卑屈之下的痛苦和隱在無恥的假面之下的哭着的臉，一種純潔而幽微的光，一點一點在馬思洛瓦的污濁的心中現了出來，結果變成一種犧牲的火焰而照耀她。具有把朗勃蘭 (Rembrandt) 所給的醜惡的光景一變而爲太陽之光的動人的美質。連對於劊子手的態度，也並不嚴酷。「饒赦他們，主呵，他們實在不明白自己做了什麼事。……」最壞的是：明明知道自己所做的事的罪惡，已經後悔，但仍不

能不做的人。壓伏着受苦的人們，也同樣壓伏着使人受苦的人們的一種宿命的壓迫的感情，支配着這作品，——那個，充滿着天然的好心的管獄員，討厭了自己的牢獄吏生活，同樣地討厭他的羸弱蒼白兩眼有黑圈的女兒不倦地彈着李斯德的吟誦曲的鋼琴聲；——那西伯利亞一村落的總督，聰明而親切，一方希望爲善，一方面又被迫爲惡，這善惡兩念，衝突不已，無法解決，於是從三十五歲以後，就沉溺於酒精之中，他很能保守品格，即在醉後，也能自持；——還有在這些人們間，即使在職業上對於他人毫無情感，但在家庭間，依舊存在着愛情。

這作品中，別無客觀的真實性的人物，祇有那個主人公南克留獨夫。因爲對於他，託爾斯泰是賦與了他自己的思想的。這缺點——不如說是危險——就是戰爭與和平及安娜小史的著名的典型中的幾個人物所曾有的缺點。例如安特萊公爵、比愛爾·倍思珂夫、萊汶納及其他人物。然而，在那時候，這缺點還沒有這樣重大；因爲那些人物的境遇及年齡都和當時託爾斯泰的精神狀態相近得多。但在這裏，作者却在一個三十五歲的快樂主義者的身體裏，納入他自己的七十老翁的靈魂，我決不是說南克留獨夫這般的道德的危機是不真實的，也不是說這種危機不應該這樣突然地發生〔註二〕。然而，在託爾斯泰所描寫的人物的氣質，性格及以前的生活中，一點也不曾洩

露這個危機，也不曾有所解釋。當這危機開始的時候，沒有一種事物能夠阻止他。無疑地，託爾斯泰以透澈的觀察，表現出一種不純粹的合金，這在最初，是犧牲的思想和自己憐憫及自己讚歎之淚的混合，到了後來，再加上在現實的前面攔住了南克留獨夫的恐怖和嫌疑。然而，他的決心終不可阻撓。這個危機同先前的幾次激烈而暫時的危機，全無共通之處。現在是沒有東西能夠阻止這個孱弱的優柔寡斷的人物了。這公爵，又富裕又被尊敬，現世的一切都使他很滿足，却在快要同一個又美麗又多情並無使他不滿處的女子結婚之際，突然決意捨棄一切富，世間，社會的地位，欲與一個賣淫婦結婚以贖前愆；他這種衝動，繼續數個月，毫不折撓，忍耐一切的試鍊，甚至聽到他所欲得以爲妻的婦人依舊過着放蕩的生活的消息，也不爲動。——在這裏有一種聖賢性，陀斯安益夫斯基這類作家的心理曾經指示這種聖賢性的泉源是在他們的主人公的良心的暗黑的深處以及主人公的組織之中。但南克留獨夫絕對不同於陀斯安益夫斯基的主人公。他是一個託爾斯泰所常有的主人公，即平凡的健全的普通人的典型。正確地說，我們極分明地感到一個很實際的人物與屬於另一人的道德的危機相對立——那另一個人，即是老翁託爾斯泰。

根本的是二元的這同一印象，於卷末也可感到，在這裏，有一個非必要的福音書的結論與那

充滿着嚴密地寫實的觀察的第三卷相對立——這結論不過是個人的信仰，不是論理地出於人生的觀察的。託爾斯泰的宗教滲入他的寫實主義裏面，這不是第一次；但在過去的作品裏，這些二元的要素比較巧妙地混合着。在這裏，却是並存着，一點也沒有混合。原來，託爾斯泰的信仰更加離開實證，而他的寫實主義却日益自由而尖銳，因此之故，使得這對立愈益分明了。在這裏，有一種不是疲勞而是年老的痕跡——某種關節中的硬化。宗教的結論不是作品的有機的發展。這是一種 *Deus ex Machina* (由機械做成的神)……我承認，在託爾斯泰的心底，不管他自己如何斷定，他的兩種相異的性質：即藝術家的真實和信仰者真實，決不會完全融合了的。

然而，即使復活沒有青年時代諸作品的完全的調和，即使我所喜歡的是戰爭與和平，但這書依然不失為表現人間的惻隱之心的最美的詩篇之一——也許是最真實的。較之一切其他作品，我在這裏看出託爾斯泰的如炬的目光，那雙尖銳的灰色的眼「直透心底」，在每人心中，看見上帝。

【註一】主典僕(一八九五)是表示從先前的陰慘的小說到復活轉變的作品。這裏洋溢着神的慈悲之光。然而與其說是近於復活，不如說是近於伊凡·伊方支之死與民間故事——復活的結局，不過是表現利己的卑劣的人

犧牲性的衝突所激的高尚的轉變。這小說的大部分則是一個沒有好心的主人和一個屈從的僕人在其夜，發

曠野的風雪所困而失了道的極端的寫實的描寫。主人，本想捨棄了僕人獨自逃走，後來又回轉，看到僕人已經凍得半死，就撲在僕人身上，以自己的身體覆之，本能地犧牲自己而使僕人溫暖。不知何故，流出眼淚來：好像自己變成被救的人尼啓他了，他的生命不在自己身上，而在尼啓他身上了——尼啓他活着，則我也還活着，我——他差不多忘記自己是華西里了。他想：「華西里是不知道應該做的事實的。……不知道的。然而我，我知道了，現在……」於是他聽到久所期待的神的聲音，命令他蓋住尼啓他。他大喜而呼：「主阿，我來了！」於是他感到自己是自由了，沒有什麼來挽留他……他死了。

【註二】「人們在身上帶着一切人性的芽。有時候這一個出現了，別一時候，那一個出現了。彼此之間時常覺得不同，換言之，他們各有表現的常態。在某些人，這種變化是很快的。南克留獨夫亦其一也。許多肉體的和精神的原因起着作用，在他的內心，發生急激的完全的變化。」（復活）

第十八章 託爾斯泰的社會觀

託爾斯泰永遠不會捨棄藝術，一個大藝術家不能夠——即使他願意——拋棄他自己的存在的理由。爲了宗教上的理由，他能夠停止出版，但決不能不執筆。始終託爾斯泰不曾間斷過藝術的創造。在這二三年間，於耶斯耐斯·玻里安那會見過他的鮑耶氏說，他把福音的書物，乃至論戰的著述以及想像的著作同等看待；處置了一種又處置第二種。當他完成了幾篇社會的論文如向治者的控訴或向被治者的控訴之後，他決定這纔可以着手那關於他自身的美麗的故事了——例如他的Hadji-Mourad，是歌咏高加索戰爭的插話和夏米爾(Shamyl)所統率的山人的抵抗的軍隊的敘事史。藝術依舊是他的休養，他的娛樂。但是他以爲把藝術來誇耀是一種虛榮心。除了爲蒐輯關於真理和人生的諸作家的感想而作的一年一日一言集(一九〇四—五年)——從東洋的聖典到現代的藝術家的世界的詩的睿智的真的佳句集——以外，一九〇〇年以後所書的純藝術的著作，差不多都留着原稿。

他方面，他大膽而且熱心地投了論戰的和神祕的著作於社會的戰場。從一九〇〇年至一九一〇年，這種著作費了他的精力的最好部分。俄羅斯正遭遇着可怕的危機，一時沙皇的帝國的基礎動搖起來，差不多要崩潰了。日俄戰爭，隨着而起不幸，革命的動亂，陸海軍的暴亂、虐殺、農民的紛擾，好像是「世界之終」的現象——如託爾斯泰的一本著作上的標題似的。——這危機的最高頂是於一九〇四和一九〇五年間到達了。在這幾年中，託爾斯泰發表了一系列顯赫的作品，即戰爭與革命、大罪惡、世界之終。在這十年的最後時期，他佔了不但是俄國的，而且是世界的獨一無二的地位。他是孤獨的，他站在一切黨派一切國家之外。教會處他以破門罪〔註一〕。他的理智的邏輯，他的信仰的澈底「使他窮感到祇有兩條路：離開別人，或離開真理。」他記起俄國的諺語：「老人說謊等於富人做賊」；於是他離開了別人，爲了宣揚真理，他把一切真理向一切人宣說。這獵擊虛偽的老獵戶，繼續不倦地獵擊一切宗教上社會上的迷信和一切作祟的東西。他不但攻擊古來的惡勢力，如對於教會之迫害，沙皇之獨裁政治而已。也許，對於他們他倒顯得緩和了，因爲現在全世界已經在對他們投石了。人們已經認識他們，他們已不是這樣可怕的了！畢竟，教皇和皇帝不過也是一種職業，他們倒不是虛偽的。託爾斯泰寫給尼古拉二世的信是老老实實

實，毫無對於君主的那種誠惶誠恐的態度，充滿着對於平常人的溫和，他名之曰「親愛的兄弟」，他說「倘若自己無意之間使他痛苦，請他原諒；」而且他具名爲「希望你得到真正的幸福的你的兄弟。」

然而，託爾斯泰所毫不原諒，惡毒地攻擊的，是那些新的謬妄，因爲那些古舊的謬妄，是已經被人們所看穿的了。這些新的謬妄，不是專制政治，而是自由的幻影。他對於新的偶像崇拜者，即社會主義者乃至「自由主義者」不知道懷着怎樣的憎恨呢。

他對於自由主義者們是久已乎抱着反感的。當他以一個賽伐斯多坡里的士官而參加於彼得堡文學者們的文社時，立刻就起了這種反感。所以與屠格涅夫不和，這反感也是原因之一。高傲的貴族，世家子弟的他，對於這班知識分子及他們的不管國民是否情願，硬把自己的烏託邦要他接受，以爲就能福國利民的豪語，覺得不堪。非常俄羅斯式，出於舊家的他，對於自由革進運動以及來自西歐的立憲思想，不能信任；他的兩次外遊，不過增強了他的偏見。第一次遊歷歸來，他寫着：

「避免自由主義的野心。」（一八五七）

第二次遊歷歸來，他記着：「特權階級」是毫無權利照他們自己的樣子去教育與他們無關的民衆的。……（一八六二）

在婀娜小史中，對於自由主義者多處表示着侮辱。萊汝納拒絕參加以教育民衆爲目的的地方教育會的事業及改進當時的秩序的運動。紳士們所舉行的州會選舉的光景，暴露了某處的以自由的行政代替保守的行政的欺騙的交易。一點也沒有改變，反而是一種無可分辯的沒有時代的認識的更甚的虛偽。

「也許我們並不算了不起，然而，總之，我們已經這樣的經過一千年左右了。」保守黨的一個議員這樣說。

託爾斯泰對於自由主義者們開口「民衆」，閉口「民衆的意志……」的這種虛妄，覺得很討厭。到底，他們曉得什麼民衆？什麼叫做民衆呢？

尤其是當自由黨的運動將達目的，第一次 *Downing*（國會）召開之際，託爾斯泰痛烈地表示了他對於立憲思想的誹謗。

「在最近的數年間，基督教的變形成爲一種新的欺騙，使我們的國民愈陷於奴隸根性。藉

口一種複雜的代議制度，告訴民衆說，祇要直接選舉了代議士，他們就可參與政府，而且說，服從代議士，就是服從他們自己的意志，那麼他們就自由了。這是一種欺騙。即使實行普通選舉，民衆還是不能表現其意志的：一則，像這樣一種包括數百萬居民的一國的集合意志是不存在的。二則，這種意志即使存在，但多數之聲也不能代表這意志的表現。這些代議士們所立法，所行的政，並非爲了一般的利益，不過爲了維持其權力起見，這事暫且不提——由壓迫及選舉的腐敗所致的民衆的墮落的事實，也暫且不舉——這種謬妄，在把許多人陷於奴隸狀態而猶以自豪這一點，已是特別有害了。……這樣子的自由人，使人想起那些因爲一旦得了從許多監守人之中選出一個獄吏之權而就以爲已經享到了自由的囚人。……即使在極端的暴政之下，一個專制國的人民也許是完全自由的。但是立憲國的人民，却因爲他自己承認那所受的虐待爲合法之故，倒是一個奴隸……而現在人們居然要把俄國人民也陷入和別的歐洲人同樣的立憲的奴隸狀態裏去了……」（世界之終）

在他對於自由主義的反感之中，輕蔑是最主要的一種。對於社會主義，則是——甯可說將是憎恨，因爲託爾斯泰是祇對於已經存在的事物纔懷恨的。他憎恨社會主義是雙重的，因爲社

會主義，在他看來是兩種謬妄的合金，即自由的謬妄和科學的謬妄。這主義不是自謂其基礎，是建立在包含着支配世界的進步的絕對的法則的所謂經濟科學的上面麼！

託爾斯泰對於科學是很嚴格的。他對於這近代的迷信以及「這些無益的問題：物種由來，光線的分析、鏽的性質、數的理論、動物化石以及其他贅辯，恰如中世紀人之重視聖母馬麗亞的懷妊和實體二元論，一般爲現代人所重視的贅辯」曾加以數頁可怕的諷刺。——他嘲笑「這班科學的僕人，恰如教會的僕人一般，自信而且要別人相信他們是懂得人類的；又如教會一般，各人相信自己決無錯誤，永遠不與他人協調，而彼此分住在各個禮拜堂內，又如教會一般，是粗鄙，不懂道德，使人類從痛苦的惡德的解放拖延的主要原因！因爲他們捨棄了唯一的結合人類的東西，即宗教意識。」

然而，當他看到這班侈談革新人類的人們的手中所持的新的狂信的危險的武器的時候，他的不安加倍了，他的憤激爆發了。一切訴諸暴行的革命者使他悲哀。而憑理智的理論家的革命者，却使他恐怖：因爲這種革命者是殺人的僞君子，是傲慢的枯燥的靈魂。他們不愛人，祇愛他們的觀念。

而且還是下等的觀念：

「社會主義的目的是滿足人類最下等的要求，即物質的幸福。而且這目的，是不能由他們所誇稱的手段而達到的。」

說到底，社會主義是沒有愛的。他祇有對於壓迫者的恨和「對於富人們的安全滿足的生活的猜忌心：恰如在糞便四周羣集着的蒼蠅的貪慾。」倘若社會主義一旦獲得勝利，世態將變得很可怕。歐洲的亂民，以加倍的力，踐踏懦弱而野蠻的人民，使他們成爲奴隸。俾自己從普羅列塔利亞的地位解放，而耽於怠惰奢侈的生活，恰如羅馬人一般。

幸而，社會主義的最優的勢力祇化了一場煙霧，——像姚萊思 Jaurès（法國社會黨的首領）的議論一般，祇是議論而已。

「多麼可佩的雄辯家！在他的演說中，包羅着一切——而實則一無所有……社會主義，有點像我們俄國的正教之處：你逼緊他，你追擊他到他的最後的堡壘，你相信已經捉住他了，於是立刻回過頭來對你說：「不是呀！我不是你所要追趕的人，我是別人呀。」他在你手中掙扎——你且忍耐！等一會看看。社會主義的理論，好比婦人們的服飾，從客廳一到寢室立刻就

改變。」

託爾斯泰雖然這樣的反對自由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但決不是替專制政治留自由的餘地，反之，他是想在從軍隊中消滅了混沌的危險的要素之後，引起新舊兩世界的廣大的戰爭。因為他也是信仰革命的，但他的革命的旗色與革命家們的旗色大不相同：這是一種中世紀的神祕的信者的革命，他期待明日的聖靈的統治：

「我相信這時候正開始着大革命，這在基督教的世界中已經準備了二千年的——這種革命，是替換那腐敗的基督教及統治組織，而產生基於人類的平等和真正的自由，為具有理智的人們所企盼的真正的基督教。」（世界之終）

但這先覺的豫言者，究竟選擇什麼時候纔披露那幸福和愛的新時代呢？俄羅斯的最黑暗的時代，慘苦和屈辱的時代。有着創造的信仰的偉大之力！在這力的周圍一切是光明的——直到夜間。託爾斯泰在死之中看出更新的徵象——在滿洲的戰禍中，在俄軍的敗北中，在無政府的恐怖和階級鬥爭的血腥中。他的夢想的論理，是從日本的勝利中演繹出這個驚人的結論，說俄國應該脫離一切戰爭，因為在戰爭上非基督教的國民「比通過奴隸的屈從的狀態」的基督教國民，常佔

上風。——這是對於俄羅斯人民的貶辭麼？——否，這是極端的驕傲。俄羅斯之所以應該脫離一切戰爭，乃是因為他要完成「大革命」。

且看這耶斯耐耶·玻里安那的福音史家，暴力的敵人，豫言者，毫不懷疑於共產的革命〔註一〕。「從殘酷的壓迫之下解放民衆的一九〇五年革命，應該在俄國開始——看他已經開始了。」爲什麼俄羅斯應該負起這個優秀民族的責任呢？——因爲新的革命應該首先矯正「大罪惡」即僅於數萬富人有利的土地的獨占，數百萬人的奴隸狀態，最殘酷的奴隸制度〔註二〕。而且因爲沒有別的民族曾和俄羅斯民族一般地意識到這罪惡。

尤其是因爲俄羅斯民族是一切民族中最深入真正的基督教的民族，而且將來的革命應該在基督教的名義之下實現團結和愛的法則，但這個愛的法則，倘若不以不抵抗惡的法則爲根據，則不能完成。而這無抵抗主義，實爲俄羅斯民族所常有的根本的特質。

「俄羅斯民族對於權勢，具着和別的歐羅巴人全然不同的態度。他從不參加權勢的鬥爭，尤其是不去干與權勢，所以也從不被惡化，他把權利視同一種惡而迴避之。一個古代的傳說，俄國人曾經請求華理亞格人（Varyags）來統治他們。俄國人的多數，對於暴行，不去對付，也

不去干與，甯可忍受，所以他們常常屈服。」

但這是自願的屈服，而非奴隸的從順。

「真正的基督教徒能夠屈服，他又不能夠對於任何暴行既不鬥爭，也不屈服；但他不能遵奉暴行，換言之，他不能承認暴行是合法的。」（世界之終）

託爾斯泰寫出這幾行的時候，他正在人民的英雄的無抵抗主義的最悲劇的實例之一的感動之下——一九〇五年一月二十二日的血的示威，在聖彼得堡，一羣解除武裝的民衆，被神父加蓬（Capone）所領導，犧牲於鎗彈之下，不發一聲憎恨的叫喊，不作一個抵抗的動作。

在俄國，由來已久，那些所謂「Seofatarni」的老信徒，即在迫害之下，也頑強地實行其對國家的不從順，而且拒絕承認國家權力之合法，在日俄戰爭的災禍之後，這種精神狀態毫無阻礙地在鄉下的民間流行起來。拒絕兵役的人日益增加；愈是殘酷地被壓迫，他們的心中的反抗愈加強大——另方面，在許多州省，許多不大知道託爾斯泰的全種族又給了絕對地消極地拒絕服從國家的實例。如一八九八年以來的高加索的「杜珂波爾派（Dukhobors）」一九〇五年的古里（Gourie）的「喬治派」（Georgians）。託爾斯泰所受於這些運動的影響比起這些運動所受於他的影響來，是很

少的；所以他的著作的興味，不管高爾基等革命黨的作家們如何批評，正是舊俄羅斯民族的代辯者。

對於因實行他所宣言的主義而捨了生命的人們，他的態度是很謙遜又很嚴肅的。對於「村珂波爾派」和「古里派」和逃亡的兵士們，他都沒有擺過作爲導師的主人的態度。

「不能忍受痛苦的人，對於那些能受痛苦的人，一點也不能理解。」

他請「被他的言論和著作所惹起痛苦的一切人們原諒」。他從沒有勸過別人拒絕兵役。他叫各人自己決定。對於那些躊躇不決的人們，「他常常教他們暫且參加兵役不要拒絕服從，橫豎這並不是道德上的不可能。」因爲，還在躊躇的人，是一定尙未成熟的；「多一個兵士比較多一個希圖做他自己力所不及的事業的僞善者或背信者要好得多。」他懷疑那個「反抗者」恭且連科（Gontcharenko）的決心，他恐怕「這個青年祇是被自尊心和虛名所動，並不是由於上帝的愛。」對於「杜珂波爾派」，他寫一封信給他們說，不要因爲自負和想被人尊敬的觀念而堅持拒絕服從的運動，但是「他們倘若能出他們的弱小的妻子於苦痛而堅持這運動，則無人會來非難。」他們祇要堅信「基督的靈若是宿在他們身上，那是因爲他們能夠對於痛苦覺得幸福之故」。在各方面，

他祈求那些被迫害的人「在無論怎樣的犧牲之中，不要破裂對於迫害他們的人們的親密的關係。」如他在寫給朋友的一封信中所說，應該愛海洛特（Herode）..

「你說：『我們不能愛海洛特』——我不懂這道理，但我感到，而且你也會感到，應該愛他。我知道，而且你也會知道，假使我不愛他，我就痛苦，我就沒有生命。」

這神性的純潔，這愛的不變的熱情，到最後，甚至不能以福音書中所云：「愛人如愛己」這話為滿足了，因為在這話裏面，還找出一種自私自主義的臭味！

太廣大的愛，而且這樣遠離人類的自私自主義的愛，不是沖淡到成為空虛了麼！——雖然，有誰比託爾斯泰更懷疑「抽象的愛」的呢？

「今日的人類的最大的罪惡，是抽象的人類愛，是對於不知存在於何處的人們的無人格的愛……愛那些不認識的而且永遠不認識的人，那是何等的容易！用不到一點的犧牲。同時，他自己又是這般滿足！這是愚弄良心。——否。應該愛你鄰人——愛那些與你一同生活，使你苦惱的人。」（對 Teneromo 談話）

我在許多研究託爾斯泰的著作中讀到，說他的哲學和他的信仰，不是獨創的，這是實在的；

因爲這類的思想的美質，是不朽的，所以從來不曾表現過新的樣式……別的人，又舉出他的烏託邦的性質來。這也是實在的，這些思想是烏託邦的，如福音書一般，一個豫言者，本是一個理想家，他在現世過着永遠的生活。既然豫言者的出現是我們所允許的，我們還看到最近的許多豫言者，而且我們的最偉大的藝術家還帶着月桂冠——這些事情不是比在世界上增加一種宗教或增加一種哲學更獨創更重要的事麼？不認識這偉大的靈魂的奇蹟，不認識在被憎惡的血潮所塗的時代中的同胞愛的化身者，盲人而已！

【註一】一八六五年時，託爾斯泰已經寫了這些宣告社會的大騷亂的話：「『財產即贖物』，是與人類的存在一樣長

久，比英國的立憲更偉大的真理。……俄羅斯的歷史的使命在乎把一個土地社會化的思想提供於世界。俄

國革命祇應建立在這原則之上。這革命不是反對沙皇也不是反對專制政治，他是反對土地的私有。」

【註二】「奴隸制度中最殘酷的是土地私有制度。因爲屬於一個主人的奴隸；祇是一個人的奴隸；但失了土地權的人，是全世界的奴隸。」（世界之終）

第十九章 晚年

他的容貌帶了固定的皺紋，在這些皺紋之下，這容貌留在人們的記憶裏面：橫貫着兩條弓形的紋的大額，荆棘叢一般的白眉，族長一般的鬚髯，使人想起第戎（Dijon）的摩西。衰老的顏面，和藹了起來溫柔了起來；刻着疾病，憂鬱，深情的痕跡。這和他二十歲時的近於動物的那種殘忍性以及賽伐斯多玻里的兵卒時代的硬裝的剛強一比不知有多少的變化呵！祇有明淨的兩眼依舊有深刻的堅定性，這忠實的視力，毫不隱匿自己的一切，別人也不能對他有一點隱匿。

距他去世的前九年，在對於神聖宗教會議的答辯中（一九〇一年四月十七日），託爾斯泰曾說：

「我將託了我的信仰之福，生活於和平和歡喜之中，而且也能夠在和平和歡喜之中，我走上死之旅程。」

讀了這話，使我想起一句古諺：

「蓋棺以後，始可稱其人爲幸福。」

他自誇爲已經得到的和平與歡喜，竟忠實地留在他的身畔了麼？

一九〇五年的「大革命」的希望是幻滅了。黑暗濃重起來，他所期待的光總是不透出來。革命的動亂之後繼以倦怠。舊日的不正義，毫無改變，慘狀愈見增大，一九〇六年時，託爾斯泰已經失了對於俄羅斯的斯拉夫民族的歷史的使命的確信；於是他的執着的信仰向遠方去找尋能夠擔負這個使命的別的民族。他想起「偉大聰明的中華民族」。他相信「東洋的民族將被要求去找尋西洋人所失掉而一去不同的自由」。而且他相信中國「將立在亞洲人的先頭」，依了不朽的法則的「道」，而完成人類的改革。（致一中國人書）

這希望又很快地消滅：老子和孔子的中國，已經捨棄了古聖賢之舊物，而跟了日本人，去效法歐洲了。那些被壓迫的「杜珂波爾派」的人民，移住到加拿大去。他們在加拿大，不願託爾斯泰的誹謗，恢復了財產。「古里派」的人們，一脫了國家的束縛，就開始虐殺異己者；召回的俄羅斯的軍隊，使一切恢復了秩序。連及猶太人也及不上——猶太人，「他們一向的祖國，爲人所希望的最美的祖國，是聖經。」——他們並不陷入 Sionisme 的病態，即「現代的歐羅巴主義的肉中之

肉，他的拘儻的嬰兒」的錯誤的國家主義運動中。

託爾斯泰悲哀了，但他並不絕望，他信仰神，他相信未來。

「假使我們能夠於一瞬間使一座森林生長，這就萬事完全了。不幸的是，這可做不到，我們應該等候發芽，抽出嫩枝，生出葉子，然後樹幹長大，結果才變成一株樹木。」

要造成一座森林，需要許多樹木；然而託爾斯泰，祇是一株孤木，雖然雄大，却是孤單。全世界的人，寫信給他：從回教國，從中國，從日本。這些地方的人，又翻譯他的復活，還傳播他的「土地復歸於人民」的思想，美國的新聞記者來訪問他；法蘭西人向他徵詢關於藝術或關於教會與國家的分離的意見。然而他的弟子不到三百，他自己也知道的。並且，他並不努力創造弟子。他謝絕他的朋友們的組織託爾斯泰主義者的團體的計劃：

「我們不應該彼此迎合，應該大家嚮往上帝……你們說：『團結起來，更較容易……』」

——什麼？……勞動、割麥，那自然。但要接近上帝，祇有孤獨地纔能夠。……我把世界看做一個巨大的殿堂，光線從高處射來，正照着這殿堂的正中。大家要結合，當集合到光線下面去。在那裏，從各方面來的我們，都不約而同的齊集起來了：這才是大歡喜。」（一九〇一年

十一月致友人書

多少人集合在這從圓天井射下來的光線之下呢？——這可以不管！若與上帝同在，祇要一個就夠了。

「一片燃燒的柴就能把火傳給別的燃料，同樣，祇要一個人的真的信仰和真的生活，就能夠傳給別人，光大真理。」（戰爭與革命）

這也許對的；可是這孤立的信仰在那一點能夠對託爾斯泰保證幸福呢？——他的晚年的生活，同歌德的優遊自適的境地，相去不知有多少遠呵！有人說他逃避這種福氣，因為這使他憎惡。

「應該感謝上帝，因為上帝使一個人對於自己不滿。應該永遠如此！生活與所希望的生活的不調和，正是生活的徵象，卽生活者，不過是自最小至最大，自最惡至最善的上升的運動而已。這不調和，正是一個好的現象。要是一個人安靜知足，反而不好。」

他所想像的小說的題材，不可思議地表示着萊汶納、或比愛爾·倍思珂夫等人物的那種堅執的不安，不會在他心中消去。

「我常常想像一個從革命的環境中長大的人物，最初是革命家，其次是平民主義者，社會主義者，正教徒，阿托斯山之僧侶，繼而又是無神論者，家庭之賢父，最後是『杜珂波爾派』。他開始一切，不絕地又棄擲一切。人們嘲笑他，他沒有做出什麼，被人遺忘地死在一個醫院裏。臨死的時候，他想到糊裏糊塗的過了一生。然而，這却是一個聖者。」

那麼，這般充滿着信仰的他，還有懷疑麼？——誰知道？一個到老還是身心強健的人，他的生活不能停頓在某一思想的階段上。他還要進行：

「運動即生活。」

最後數年間，許多的事物在他內心起了變化。他對於革命者的意見不是有了改變麼？誰能夠說他的不抵抗惡的信仰沒有一點動搖呢？——在復活中，南克留獨夫和政治犯們的關係，已經完全改變了他的對於俄國革命黨的觀念。

「在這以前，他對於他們的殘酷，他們的犯罪的陰險性，他們的暴行，他們的自慢，他們的自足，他們的極端的虛榮心，抱着反感。然而當他接近一看，當他看到他們是被政府所虐待的，他就懂得他們非如此不可。」

而且他讚美他們的情願完全犧牲自己的崇高的義務觀念。

然自一九〇〇年以來，革命的波濤高漲了；從智識階級發源，流入民間，暗中激動了無數的貧民。他們的可怖的軍隊的前哨，列隊於耶斯耐耶·玻里安那的託爾斯泰的窗下：Marrou de France 上面所載的託爾斯泰的絕筆中的三篇紀述，使我們看到這光景所引起的他的心的痛苦和混亂。虔敬的，心思單純的巡禮者們，一羣一羣地經過都拉(Torta)的鄉間，曾幾何時，竟變成飢餓的漂泊者的侵入了。他們每天到來，託爾斯泰同他們談天，他被他們的燃燒的憎恨所驚了；他們不再像先前一般把富人看作「救濟他們的靈魂的施主」而視之爲「吸取勞動者之血的惡漢，和強徒」了。這裏面有許多是受過教育的，將要滅亡的，已臨到能使人無所不爲的絕望的深淵的人們。

「這不是在沙漠或森林中，是在都會的貧民窟裏面和大路上，起來一羣野蠻的人，他們將要在現代文明中做出匈奴人和汪達爾人在古代所做的事來。」

亨利·喬治(Henry George)如是說，託爾斯泰接着：

「汪達爾人已經在俄國準備好了，而且在深刻地宗教化的我們和人民之間，他們將特別可

怕，因為我們不懂得這種控馭法：即在歐洲人民間極其發達的禮儀和輿論。」

託爾斯泰時常接到這些暴徒們的信函，他們抗議他的不抵抗惡主義，而且說，統階級和富人們對民衆加了惡害，民衆祇能報以：「復讎！復讎！復讎！」——託爾斯泰仍然非難他們麼？誰也不知道。然而，數日之後，在他自己的村內。看到窮人們因為羊和沸湯器被奪去而哭着的時候，在無情的公差之前，他也不禁對於這些劊子手，對於「這些從事於火酒的買賣，殺人法的教授，無期徒刑，入獄乃至絞首罪之執行的諸大臣及其部下，」憑空喊起復讎的叫聲——「這些人，從貧民這裏，掠奪了沸湯器、牝羊、公牛、麻布，作為毒害人們的火酒之蒸餾，殺人器之製造，監獄，徒刑場之建築，特別是他們的部下及他們自身的官職的分配的最好的資金，他們對於這事，相信毫無遺憾。」

一個人，在愛的統治的期待和宣告中活了一世，正要閉目的時候，却看到這種威嚇的幻覺而感到苦痛，這是很可悲的。——何況是託爾斯泰那樣懷着誠實的良心的人，看到自己的生活和自己的主義竟不曾完全一致，當然是更覺痛苦的。

在這裏，我們已經觸到他的晚年——應該說是他的最後的三十年麼？——的最痛苦之點了。

而且我們祇可以虔敬的手戰戰兢兢地觸到這一點：因為這託爾斯泰努力想保守祕密的痛苦，不但屬於死者，也屬於別的活着的，愛着的而且愛他的人們。

他對於自己最親愛的人，如妻和子，決不傳授自己的信仰。我們已經知道他的忠實的伴侶，曾經勇敢地參加他的生活和他的藝術工作的伴侶，怎樣的因為他捨棄了藝術的信仰而接受她所不理解的道德的信仰而痛苦的事了。託爾斯泰因為看到他的最良的侶伴的誤解，也懷着不亞於她的痛苦。

他寫給「eneromo」的信中說：

「我衷心地感到這句話的真理：即夫婦不是可分離的存在，祇是一體。……我熱烈地希望能夠把我的宗教的意識，傳授一部分於時常給我一種超越人生的苦痛的可能性的我的妻。我之所以要把這傳授給她，當然不是爲了我，而是爲了上帝。雖然這意識對於婦人們是很難接近的。」

這願望似乎終於不曾達到。託爾斯泰夫人，讚美，愛慕那與她「一體」的偉人的心的純潔，誠實的勇氣和善良性；她知道「他立在羣衆前頭，指示他們所當遵行的道路」；當神聖宗教會議處

他以破門時，她勇敢地擁護他，而且願與他共冒危險。但她不能對於不信仰的事情假裝信仰，而託爾斯泰却過於認真到非使她假裝不可了——他——憎恨信仰和愛的虛飾，比憎恨信仰和愛的否定更甚的他，然則，他怎樣能夠強迫不信仰的她改變其生活，犧牲其財產和子女呢？

同他的兒子們的不調和，還要大得多。在耶斯耐耶·玻里安那的邸宅中曾見過託爾斯泰的勒羅阿·潘理歐氏(M. A. L. roy-Beaulieu)說：「在吃飯的席間，父親一開口說話，祇是裝着討厭和不信任的樣子。」他的信仰，祇對三個女兒有點影響。其中他所最鍾愛的馬利，早已去世。在家庭中，他是道德的地孤獨的。「除了他的幼女和侍醫」，沒有一個人理解他。

他苦於這思想的距離，他苦於人們課給他的世俗的關係：從世界的各方來的使他疲乏的來客，使他厭倦的美國人和徒尙外觀的人物的訪問；他苦於他的家庭生活迫他享受的「奢侈」。假使我們相信許多到過他的簡單的家裏的人們的記載，則這奢侈實很樸素，嚴格的說來，祇有些清苦的家具在他的小房間裏，一隻鐵床，幾隻可憐的椅子，和精光的牆壁！但這點福氣已經使他難受了：成爲永遠的悔恨。在Mercur de France所發表的第二篇紀述中，他苦痛地把四周的窮人們的景况同他自己家中的奢侈相比較。

一九〇三年時，他已經寫着如下的話：

「我的活動，對於某些人雖似有點用處，但失了他的重要性的最大部份，因為我的生活並不完全同我所宣言的話相一致。」

爲什麼他不能實現這一致呢！假使他不能強迫他的家人離開世界，爲什麼他自己不能離開他的家人和他們的生活呢！——這樣子，他的敵人們，要否定他的主義就可以他自己作爲例子而投以僞善者的譏笑和責難，他怎麼能夠逃避呢！

他想到這一點。他的決心是早已定了的。人們發現一封一八九七年六月八日給他的夫人的重要的信，而且公布出來了。這信應該全部錄出來。比這信更和這一方面愛，一方面痛苦的心的祕密有關的，是沒有了的：

「由來已久，親愛的莎菲，我痛苦於我的生活和我的信仰之不調和，我不能強迫你改變你的生活和你的習慣。我又不能趁現在離開你，因為我恐我若一旦離去，對於還很年青的孩子們，我就將奪去我所能給與他們的若干影響，而且我將使你們都很苦痛。然而，我不能繼續過我最近十六年來所過的生活了〔註一〕，時而，我同你們爭鬧，激怒你們，時而，我屈服於周圍的我

所習慣的許多影響和誘惑。現在，我決定要實行我久已想實行的事了：我要去了……像印度人一般，一到六十歲，就逃到森林中去，又像每一個宗教的老人，想把自己的餘生，獻給上帝，不願浪費於冗談、戲言、饒舌以及 Lawn tennis 之中，同樣，七十老翁的我，衷心地希望安靜與孤獨，即使不能做到完全的調和，至少也不使我的生活和我的良心之間，有可怕的不調和。假使我公開地出走，一定有許多請求、議論，我曾被軟化，也許我會不能把我的決定，見諸實行，當他應該實行的時候。所以我要請你原諒，假使我的行動使你悲傷。尤其是，你莎菲，你該讓我出去，不要找我，不要恨我，也不要責難我。我離開你這事情，並不是證明我對你懷有苦情……我知道你不能够，你不能够同我一般的看和想；這就是你不能變更你的生活而且爲你所不識的人作犧牲的緣故。所以，我也一點不斥責你；反而我戀愛地感謝地懷念我們的三十年的長期的共同生活，尤其是那前半的時期，那時，你以母性的勇敢和忠誠，毅然支持你所認爲使命的事業。你把你所能給與的已經完全給與我和世界了。你給了許多母性的愛和偉大的犧牲……然而，在我們的生活的最近期間，在最近的十五年來，我們是分道揚鱗了，我不能承認我是有罪的。我知道我有所改變，不是爲了我的高興，也不是爲了世間，而是因爲我非如此不

可。我不責備你不跟我走。而且我將時常戀念你所給我的一切——再會，我的親愛的莎菲，我愛你。」

「我離開你這事情……」終於沒有離開。——可憐的這封信！他以為要完成這決定，祇要寫一封信就好了……那知道寫了這信之後，他的決定的力量已經消失了——「假使我公開地出走，一定有許多請求我會被軟化……」那知並不需要「請求」和「議論」，祇要過了一刻，看到他所要離開的人：他就感到「他不能夠，他不能夠」離開他們；他把本來放在他口袋中的信，插在一個家具中間，加上這樣一個信面：

「我死之後，將此書授於吾妻莎菲·安特萊夫娜。」

這樣，就結束了他的離家的計劃。

這就是他的力量麼？他終於不能犧牲他的柔情於上帝麼？——的確，在基督教的年鑑裏，有不少心堅的聖徒，毫不躊躇把自己的和他人的愛情大膽地蹂躪無所躊躇……他做得到麼？他一點也不是這等樣人，他是弱者，他是人，正唯其如此，我們纔愛他。

十五年前，在充滿了慘痛的悲哀的一頁中，他問自己：

「但是，萊翁·託爾斯泰，你是照你聲明的主義一般生活的麼？」

他頹喪地答道：

「我羞恥得要死，我是惡人，我應該被輕蔑……但是，把我從前的生活和現在的比一比看。何曾看出我是在努力照上帝的法則而生活的。我祇做了應該做的千分之一，而且我覺得慚愧，但是我之所以不做，非我不願，而是因為我不能……責備我罷，但不要責備我所由的路徑。譬如我本來認識我家別路徑的，而我跟踉蹌蹌走着，如同一個醉漢，這能夠說我的路徑是不對麼？或者指我以前的路徑，或者在真正的路徑上扶持我，如同我預備扶持你似的。但不要掃我的興，不要對我幸災樂禍，不要高興的喊道：『看哪！他說要走到家裏去却落在污溝裏了！』否，不要高興；請你援助我，扶持我！……幫助我！因為我們大家都迷失着，我是已經落膽了；當我盡畢生之力想從那裏出來的時候，你們，每個在我旁邊的人，與其對我發生惻隱之心，不如指着我而喊道：『看哪，他同我們一同跌落在溝裏了。』（致一友人書）

愈益同死接近的時候，他又反覆着：

「我不是一個聖人，我從不曾自以為聖人，我是一個人；一個被牽制着的人，常常不把他

所想所感的思想完全說出來的人；並不是因為不願，而是因為不能，因為他常常陷於誇張和迷誤。在我的活動中，比較得還要壞。我完全是一個弱者，我有許多不良的習慣，我想以真理為上帝服務，但我常常失足，假使人們把我看作不會自誤的人，那麼我的每一個過失將被人看作說謊或偽善了。然而假使人們把我當作一個弱者看，那麼我的真相才會顯出：我是一個可憐的人，但是誠實的，我常常一心希望成為一個好人，一個上帝的忠僕。」

他被這樣的悔恨所襲，被比他更精力的然而人性較少的弟子們的無言的叱責所窮追，被他的脆弱和不決斷所惱，在家庭之愛與上帝之愛之間逼拶——直到有一天，絕望的一擊，也許是瀕死時的燃燒的熱風，把他從住宅擲出，在路上徬徨、逃亡、叩一家修道院的門，然後又向地方跑去，終於跌倒在路上，在一處黑暗的小地方，永遠不再站起來了「註一」。在臨死的床上，他哭了，不是為了自己，而為了不幸的人們；在他的歎歎之中，他說：

「在地球上那麼多的人受着苦痛，為什麼你們在這裏祇關心着萊翁·託爾斯泰呢？」

於是，「她」到來了——這是一九一〇年十一月二十日上午六時稍過——他稱為「解脫」的「死，祝福的他」到來了。

【註一】託爾斯泰於一九一〇年十月二十八日（據歐洲說來是十一月十日）上午五時許突然離開耶斯耐耶·玻里安那。同行者醫生馬珂甫茨基。女兒亞力山大即采爾脫珂夫呼之爲「最親密的合作者」者，參與出家的祕密。他於是日午後六時，至奧普底拿僧院，此爲俄國最有名之聖殿，他在巡禮途上常訪之者，他在此過夜，翌晨，在彼處作關於死之痛苦的長論文。十月廿九日，赴其已爲尼之妹所在之却莫爾第諾僧院。他與她共午餐，對她表示願在奧普底拿送其餘生，「願執最卑下之工作，但以不赴教堂祈禱爲條件。」他睡在却莫爾第諾。翌晨往鄰村散步，思覓一住所。午後復至妹處。五時許，不意其女亞力山大至，無疑地，她告他自他離家後，即有人追尋之事：是夜彼等即外出。託爾斯泰，亞力山大·馬珂甫茨基行向科賽爾克車站，似欲赴南部省分。途中，託爾斯泰病倒於亞斯達玻服車站，即瞑目於此。

第二十章 「鬥爭已經告終了」

鬥爭已經告終了，這以生活爲戰場的八十二年的鬥爭告終了。悲劇的又光榮的激戰，在這之中，參加着全部的生活之力，一切的惡和一切的德。——一切惡，祇有虛僞不在內，是他所不住地窮追而且搜索到他的最後的避難所的。

最初，是熱狂的自由，在暴風雨之夜間互相衝突的許多熱情。遠遠地常有眩目的閃光照明這黑夜——愛的危機，空想的危機，永遠的幻影。高加索及賽伐斯多坡里的數年，動搖不安的青年期的數年……然後是婚後最初數年的太平。愛和藝術和自然的幸福——戰爭與和平。包羅人類的全地平線的天才橫溢之光以及對於已經過去的人物的爭鬥的光景。他支配這些，統御這些，然而這些對於他已經覺得不能滿足了。恰如安特來公爵一般，他注目於在奧斯推利茨之上輝耀着的茫漠的蒼穹，這蒼穹惹了他的注意：

「有着力強的兩翼的人們，被逸樂所吸引而跌落於人羣，他們的羽翼遂以破裂。例如，

我也是其一。後來我振動已碎之翼，勁健地上衝，又復跌落。待羽翼恢復之後，我將高飛，上帝助我！」（日記）

這類語言，寫於最可怖之風暴中，我的懺悔即其紀念與反響。託爾斯泰跌落地面上碎其羽翼者，不止一次。然而，他永遠堅持。他重新出發。我們看他在「無涯際的深空中」，擴展其一為理智一為信仰之兩大翼而翱翔。然而，他不曾得到他所尋覓的安靜。天國不在吾人之外，天國在吾人之中。託爾斯泰於此吹起熱情的風暴。在這一點，他不同於從世間解脫的使徒們：他對於解脫也如對於生活一般注了同樣的熱情。他如愛人一般的用力緊抱的，就是生活。他「瘋狂於生活」。他「陶醉於生活」。他不能離此陶醉而生活〔註一〕。同時他陶醉於幸福和不幸。陶醉於死亡和不死〔註二〕他對於個人的生活的放棄，祇是一種向着不朽的生活而發的熱情的呼聲。然而，他所到達的平和，他所追求的平和，却不是死。這平和，是那運動於無限的空間中的燃燒的世界。在他，忿怒就是平和。平和是燃燒的。信仰供給他以新的武器，使他從初期作品以來的對於近代社會的虛偽的戰鬥，作更猛烈的進攻。他不復徒藉幾個小說中的人物作攻擊。他攻擊一切大的偶像，即宗教、國家、科學、藝術、自由主義、社會主義、通俗教育、慈善、平和主義等等偽善。

他打碎這些，他憤激地反對這些。

世界，時常看見這些偉大的叛逆者的出現，他們恰如先驅者約翰似的，對於腐敗的文明，發出咒詛。最近出現的一個是盧梭，以其對於自然的愛，以其對於近代社會的憎，以其強烈的獨立精神，以其對於福音書及基督教道德的熱烈的欽慕，盧梭實豫言了託爾斯泰。託爾斯泰對他如此說：

「這幾頁一觸到我的心琴，使我相信這是我所寫似的」。

然而在這兩個人的精神中是有多少的差異呵！託爾斯泰的精神，是更其純粹的基督教的。而這日內瓦人的懺悔錄中的傲慢的叫聲，却是何等的缺乏謙遜，何等的法利賽人的妄自尊大呵！

「不朽的神呵！讓一個人對你說道，假使他敢：我比這人更要善良！」

又如在這對於世間的輕侮中：

「我大膽高聲宣言：誰要是能夠說我是一個不正直的人，這人自己是被壓抑的人物。」

✓ 託爾斯泰對於自己的過去的生活的「罪惡」，揮了血淚而哭着：

「我感到地獄中的痛苦。我想起一切過去的卑劣，而且這回憶纏繞着我，毒害我的生活。」

平常，人們遺憾於死後不能保留記憶。萬一如此，那該是多麼幸福呵！假使，在別的世界中我還能記得現世界所犯的罪惡。那該是多麼的痛苦呵！……」（日記）

他不照盧梭的樣子，寫他的我的懺悔，因為盧梭說過：「我感到我的善事勝過我的惡事，所以我有興味述說一切。」（第四次散步）。託爾斯泰在立定了計劃之後，忽又停止寫他的「追想錄」，他的筆從手中落下，他不願給讀者作為誹謗的對象：

「世人要說：看哪，這個被許多人捧得很高的人！但他是怎樣的卑劣呵！那麼，我輩俗人是上帝自己叫我們變成卑劣的了。」（致波魯珂甫書）

基督徒的信仰，道德的美的潔癖以及給與託爾斯泰以一種不可磨滅的誠實的謙遜，盧梭是不知道的。在盧梭後面——在西尼島的彫像之周圍——我們看到日內瓦的聖彼得、加爾文的羅馬。在託爾斯泰這裏，我們祇發見巡禮者和無智的人們，他們的天真的懺悔和眼淚曾感動託爾斯泰的幼年時代。

然而，在為盧梭所同有的對於世間的鬥爭以上，還有一種占領託爾斯泰最後三十年的生活的別的戰爭，這偉大的戰爭，起於他的靈魂中的最高的兩種力之間：即真理與愛。

真理——「這直透心底的目光」——這灼灼逼人的灰色的眼的尖銳的光……這是他最早的信仰，他的藝術的女王。

「我的作品中的女主人公，爲我的真心所愛而且過去，現在，未來永遠不變其美麗者，乃是真理」。——（一八五五年五月的賽俄斯多坡里）

真理，是他的哥哥死後，覆舟之後的唯一的遺留物。真理，是他的生活的中軸，大洋中之岩石……

然而不久，「可怕的真理」不能使他滿足了，愛情取而代之。這是他幼年時代的活潑的泉源，「他的心的本然的姿態」〔註三〕。一八八〇年的道德的危機襲來之時，他毫不捨棄真理，他把真理爲愛而開道〔註四〕。

愛乃「精力之本源」，愛乃「生活之理智」，除了美以外的唯一的生活的理智。愛乃由生活所養大的託爾斯泰的精髓，亦爲戰爭與和平及致神聖宗教會議的信中的精髓。

這依於愛的真理的透徹，給與他中年時代——*Nel mezzo del Cammin*（中途）——所著的傑作以獨特的價值，且使他的寫實主義與福羅倍爾（Faustel）的寫實主義分別。福羅倍爾努力的作品

不愛中的他的人物。他雖然那樣偉大，但終缺乏：LIGHTEN（光明起來呵！）太陽的光是不夠的，應該有心的光。託爾斯泰的寫實主義現身在每個人物之中，并以彼等之眼看出他們，他在最惡的人中，找出可愛的理由，并使我們感到聯結我們一切人的友愛之鎖鍊。藉了愛，他透入生活的根本。

然而維持這結合是困難的。有許多時候生活的狀態及其悲苦非常慘痛，至於使人表現出對於愛的輕侮。爲了救濟這，即爲了救濟自己的信仰，人們不得不置身於世界的高處，然而這却有使信仰與世界失去接觸的危險，然則，那從命運接受了看見真理的崇高的天才，不能夠不見真理的天才的人，將怎樣辦呢？託爾斯泰晚年的不斷的不調和，即看到可怕的現實的他的殘酷的眼和不絕地期待愛，確保愛的他的熱烈的心之間的不調和，使他怎樣的苦痛，誰知道呢！

我們都知道這悲劇的鬥爭，多少次數，我們是陷於時而無視，時而憎恨的輪番之中呵！多少次數，一個藝術家——名符其實的藝術家，一個認識他所寫的語言的光彩而可怕的力的作家——在寫出一種真理之際，却被苦痛所壓迫呵！這健全而勇敢的真理，爲近代社會的虛偽、文明的虛偽的環境所需要的真理，這根本的真理，恰如人們所呼吸的空氣一般的必要……然而，這空氣，

有多少人的肺臟，多少因文明而致虛弱的肺臟，或因其好心而致虛弱的肺臟，不能接受他呵！然則，我們就該不顧真理而且將這殺人的真理斷然棄擲麼？照託爾斯泰所說，不是有一個「爲愛而開道」的真理的麼？——然而，這是什麼呢？用了說謊的安慰去慰藉人們，好像批爾·根德（Peer Gent）以他的故事使他的老母睡去這事，我們能夠同意麼？……社會不絕地陷於這左右爲難之間：真理或愛。普通常以同時犧牲兩者爲解決之道。

託爾斯泰對於他的兩個信仰中的無論那一個，永不違背。在他圓熟期的作品中，將愛作爲真理的炬火。在晚年的作品中，這是一道在高處亮着的光，一道射到生活上而不再與生活混合的慈悲的光。我們在復活中看到這一點，在那裏，信仰支配着現實，但僅止於表面。被託爾斯泰所描寫的同一般衆，當他每次一個一個的看時，似乎很平凡而卑弱，但當他用一種抽象的方法而思索時，都帶着一種神性。——在他每日的生活中，也如在藝術上一般，現着同樣的不調和，也許更爲劇烈。他明知道愛對於他何所求，他却取別樣的行動，他不照上帝而生活，他照世間而生活，愛這東西，在那一點攔住了他呢？他的諸種相，及他的矛盾的階段，應該怎樣區別呢？家庭之愛歟，抑全人類之愛歟？……直到他的末日，他依然在這輪番之中煩惱着。

解決在於何處呢？——他沒有找到，悉聽高傲的學者們侮蔑地隨意去判斷罷。他們一定是找到了的，他們自有真理，而且他們確信地依賴他們的真理。對於他們，託爾斯泰是個弱者，是個感傷家，不足引以為鑑。當然，他不是他們所能遵照的模範，他們還不夠活潑。託爾斯泰不屬於虛榮的優秀分子，他不屬於任何教會——更不屬於如他自己所說的「律法學者」和無一定的信仰的「法利賽人」。他是自由的基督徒中最高的一個典型，他以一生之力，嚮往一個遠遙的理想。

託爾斯泰不向思想的特權者們說話，他向着平常百姓——*Hominibus bonx Voluntati*（心善的人）——開口。他是我們的良心，他說的話，是我們一切平常的人所想的，而且是我們怕在我們的內心讀到的。他對於我們，不是一個高傲的主人，不是在其藝術和智識之中，超越人類之上的崇高的天才。他是——如他在書函中所最愛署的，一切名稱中最美麗最柔和的——「我們的兄弟」。

一九一一年一月作成

一九三三年二月譯畢

【註一】「祇在陶醉於生活的時候，人始能生活。」（我的懺悔）

【註二】「死的思想……」「我願意而且我愛不死。」（日記）

【註三】「愛，對於人類，是心的本然的姿態，但我們不大注意到。」（日記）

【註四】「道理爲愛而開道……」（我的懺悔）

託爾斯泰傳

託爾斯泰傳附錄

一 託爾斯泰之遺稿

託爾斯泰死後，遺有許多未刊的作品。其大部分，後來曾經出版，皮恩斯托克(Engelstok)氏譯成法文，編爲三卷。這些作品，是互乎他的一生的各時期的。最早的是一八八三年的(癡人日記)，其他則爲晚年之作。這之中，也有長篇小說，也有短篇小說，也有戲曲，也有對話。惜多未殺青。我將這些作品，區別爲二類：一爲託爾斯泰依道德的意志而寫的作品，一爲依藝術的本能而寫的作品。也有若干篇，這兩種傾向，彼此調和融合着。

不幸的是，爲了並不貪圖自己的文學上的名聲，——也許是內心中感到恥辱——託爾斯泰沒有把非常美麗的豫想的作品續成。這實在是可惜的事。例如費奧陀爾·庫慈米支老爺日記的遺稿(Le journal posthume du Vicomte Feodor Kouzmitch)。這是皇帝亞歷山大一世的有名的傳說。皇帝是，故意使人相信他已經去世，而出奔到西伯利亞，託了假名於此贖罪以終老。我們感

到託爾斯泰非常注意於這題材，且與其主人公同化爲一體。但這「日記」，祇留下最初數章給我們，是何等的遺憾！其故事的力和清新之點，實足與復活中最精采的篇章相匹敵。這裏有許多難忘的人物（老女皇喀德鄰二世也在內）。特別對於在平靜的老年的心中，尙躍動着傲慢的性質的，那神祕的暴亂的皇帝的力強，有充分的描寫。

神父舍爾該（一八九一——一九〇四）雖出於託爾斯泰的同樣偉大的手法，但這故事却很短。這是一個人的故事，這人因被傲慢所傷，在孤獨和禁慾之中，追求上帝。結局是，他在人類中間爲人類而生活之際，找到了上帝。某幾頁中所充滿的野蠻的狂暴，使讀者失色。當書中的主人公發現了他的愛人的醜行之際，這場面之沉痛和悲劇性，實在是無以復加的：——（他的未婚妻，他視同聖徒一般愛敬着的婦人，誰知竟是他所熱烈地崇拜着的皇帝的情人）。誘惑之夜，卽一個僧人爲了鎮定自己的騷亂的心而切斷手指的夜，也是非常動人的。同這些殘酷的插話相對照，結局却是憂鬱的談話，卽與一個貧苦、老弱、矮小的幼年時代的女友的談話。最後數頁的筆致，也很輕淡簡潔。

母，也是一篇動 的作品：善良賢惠的一家的主婦，爲了她的家族，辛勤了四十年之後，覺

得自己是很孤獨，無活動力，而且無活動之必要了。於是，她雖不是正統教徒，却投身於修道院中，寫他的日記。但這作品，也只留下最初的數頁。

還有幾篇小故事，也是很好的藝術品。

壺的亞勒克西 (Aleksei Pot)，是與美麗的民話相關聯的。這故事是說一個單純的男子，時常犧牲自己，時常溫良地覺得滿足，終於死去。——舞蹈會之後 (一九〇三年八月二十日)：一個老人敘說他如何愛一個少女，又如何突然停止他的愛情，因為他看到那個少女的父親（是一個大佐）命令鞭打一個兵士。這是一篇無疵的作品；最初是少年時代的回憶的美妙的魅力，以後是正確的幻想。——夢中所見 (一九〇六年十一月十三日)：一個公爵，對於他的被誘惑而離家的愛女，不肯原宥。但到再見他的愛女之時，却反而懇求她的原諒。然而託爾斯泰的情愛和理想主義，從不濫用（看到他的女兒所生的小兒之際，他仍不能自制其厭惡之情）。

珂定加 (Khotynka)，是取一八九二年所起的事件作題材的短篇小說。一位年青的俄國貴婦，因為到莫斯科參加一個民衆的祭禮，突然在一陣騷擾中被撞倒，任人踐踏，幾瀕於死，幸為一個同樣被蹂躪的勞動者所救。在熱烈的友情感的衝動之下，他們於片刻中結合了。但隨即分

別，此後不再相見。

在量上極其龐大，而且呈着敘事史的樣子的，要算哈提·謨拉特（Hatit. Morduk）（一九〇一年十二月）。這是記敘一八五一年的高加索戰爭的插話的。託爾斯泰，著這書時，已達藝術的技巧的圓熟境，「眼及心」的幻想已極完全。然而：不可思議的是，我們對於這故事，實際上不感什麼興味；因為，我們覺得，託爾斯泰自己對於這故事也是不感什麼興味的。這故事中所出現的人物，每個都同樣引起作者的同情。在我們看來，每個人物的姿態也是很完全的。但在「愛一切的力量」這一點上，他是不取這作品的。好像，他寫這著名的小說時，並無內心的要求，只是由於肉體的必要而已。恰如他人的運動筋肉一般，他運動自己的理智的機械。他有創作的欲求，所以他創作。

其他諸作品中，含有個人的特質，而且常常是憂鬱的。這是自敘傳式的，如描寫一八六九年危機以前的恐怖的第一夜的回憶的癡人日記（一八八三年十月二十日）又如魔鬼（一八八九年十一月十九日）。後者是一部很長的含有第一流作品的部分的作品，惜乎，其結果却不合理：一個鄉

下的地主，和自己的領地內的一個少女發生了關係，但他結了婚而且小心地迴避那個少女，（因為他是很老實的并且愛他的少妻。）然而那個少女已經「深入他的血管」，他不能見了不動心。她來找他，終於他又去就她；他感到自己不能再離開她了：於是他就自殺。這善良、脆弱、壯健、近視、伶俐、真摯、勤勉、苦惱的男子的描寫——把丈夫理想化的、空想、多情年青的妻的描寫，——熱烈、無遠慮、美麗、健全的少女的描寫——皆係傑出之作。然而託爾斯泰，在這小說的最後，不以實際的經歷作結而以道德論作結，實為遺憾：因為，實際上，他是曾有一次和這相類的冒險的。

黑暗中之光，是五幕劇，全然表現了藝術的微妙。然而，我們知道了隱在託爾斯泰的晚中的悲劇之後，對於這用了別的姓氏而把託爾斯泰自己及其家族出現於舞台的作品，有何等的感動呵！尼古拉·依凡諾微支·薩林且夫（*Nicolas Ivanovitch Sarinzeff*）也達到與我們應該怎樣辨的作者相同的信仰，且欲見諸實行。然而，他不能夠。被妻的淚（真誠的淚耶，假裝的淚耶？）所阻止，他不能拋離家庭。他留在家中，度着貧苦的生活，做些細木工作，而他的妻兒們却依然繼續豪華的生活，常常開着宴會。他雖然絕不參加，人們却非難他，指為偽善者。但在他的道德的

影響之下，由於他的人格的單純之光，在他的周圍聚集了許多改宗者——以及不幸者。一個祭司，信仰了他的教義，就脫離教會。某一良家青年，拒絕兵役而參加懲罪的大隊。而這可憐的薩林且夫——託爾斯泰却被懷疑所困惑。他沒有錯誤麼？不是把別人無益地陷入痛苦和死亡之中麼？終於，他覺得除了請那個被他無意地引誘而致滅亡的青年的母親殺死自己以外，別無解決之道了。

在別的短篇故事中，我們還可發現託爾斯泰晚年的生涯。無所謂罪人（一九一〇年九月），是一個爲自己的境况所強烈地痛苦而不能超拔的男子的同樣煩悶的告白。無所事事的富者和筋疲力竭的窮人相對照着，但兩方面都不會感到這種社會狀態的可怕的不合理。

兩本戲曲，是有真實的價值的。一是以與酒精之害相戰鬥的農民爲題材的小戲曲：一切品性皆由此而來（也許是一九一〇年之作），其中的人物是很富於個性的，他們的類型的性質，他們的滑稽的言辭，都是很有趣地被把捉着。饒赦了竊賊的農民，因其不知識間的道德的偉大和素朴的自愛心，成爲又高尚又滑稽的人物。——第二本是與這本意義完全不同的十二場的戲曲：活屍，這戲曲描寫爲醜惡的社會組織所壓迫的懦弱而善良的人們。主人公費地亞（Fedya）是爲了其善良

性及隱在遊蕩生活下面的深的道德感情而滅亡的一個人。他對於社會的墮落和自己的卑劣，懷着不能忍耐的苦悶；但是沒有反抗的力量。他有一個心愛的妻，善良溫和，而且伶俐，然而「沒有投入蘋果酒中會使之起泡的小葡萄」，「生活中沒有閃光」。這些使他遺忘，而且他對於她實有遺忘這些之必要。

「我們都在我們的環境之中」他說：「我們前面有三條路，祇有三條。第一條是做官，發財，在自己的周圍多做些醜事。但這使我討厭，也許我做不到。……第二條路是與這些醜行戰鬥；但是因此得成爲一個英雄，而我却不是英雄。餘下的第三條路，則是忘掉自己，沈溺於酒精，放蕩，歌唱。我選了這條路：你們看，我是跑到這條路去了。」（第五幕第一場）

在另一處所，他說：

「我怎樣地到達我的滅亡嗎？首先，是酒。我並不是高興喝酒。但是我常常感到，我的周圍所發生的一切，都不是理所應該的；我覺得羞恥……至於貴族中的公爵，銀行的行長，那是更可恥，更可恥！……而酒醉以後人們就把羞恥忘掉了。……其次，是音樂，但不是麥多汝的 Opera 而是吉卜西女人之歌。這在你心中，注入如許的生命和精力……還有美的黑眼，還有微笑……然

而，愈是盡歡，接着而來的羞恥感也愈濃厚……」（第三幕第二場）

他離開他的妻，因為他感到他既於她有害，她對於他也是無益。他把她託給一個友人，這友人愛着他的妻，他的妻也隱然愛這友人，而且這友人與他有相似之處。他從此潛身於無賴漢的下流社會裏面；一切都很好；祇要其他的兩人幸福，他也——會覺得同樣的幸福。可是社會却不許人們不得其同意而行動；社會逼迫費地亞去自殺，如果費地亞不願他的兩個朋友陷於重婚罪。

——這不可思議的作品，是非常俄國風的，而且是反映革命的大希望消失以後的善良的人們的絕望的。單純素樸，文辭也毫不浮誇。人物的性質都是逼真的，活躍的，就是作為配角的人物也如此：（在愛和結婚的道德觀念中毫不讓步的熱烈的年青的妹子；勇敢的卡列寧的堅決的善良的丰采，以及充滿了貴族的成見的、保守的、談吐高雅、舉止賢淑的卡列寧的老母）甚至描寫漂泊的吉卜西人和辯護士，也維妙維肖。

我還沒有提到那以教義的又道德的意圖作為作品的自由的生命的幾篇創作——但這些意圖，毫不曾妨害託爾斯泰的心理的透徹：

假劣：一個長的故事，差不多是長篇小說，指示出世間的個人的善行惡行的一切的連鎖。兩個學生犯了一種過失，接着又犯了許多罪惡，逐漸地恐怖起來。——終於因為被一個無賴漢所刺斃的貧女的神聖的忍耐，影響了那刺客，而且影響了一切作惡的人，於是那兩個學生，也犧牲自己去贖罪。題材是很雄大的，與敘事史相近；這作品，幾乎達到古代悲劇的宿命的壯觀。只是這故是太冗長，太瑣碎，欠缺闊達的風格；每個人物雖都正確地性格化，但總顯得有點混同。

兒童的智慧，是兒童們交談着宗教、藝術、科學、教育、國家等等大問題的連續二十次的一場對話。中間也時發奇想，但反覆太頻，易使讀者生倦。

少年皇帝，是以夢見了自己無心地惹起的不幸的少年皇帝為題材的。是集中最無力的作品。

最後，我把幾篇斷片的草稿的題目舉一舉：兩個巡禮者——華西理教士——誰係暗殺者？……

在這些作品之中，最使我們驚異的，是託爾斯泰直到末日所保持的那種強的智力。當他表現社會思想時，常不免於贅辯；但當他面接一個行為，一個生人，博愛的夢想家的姿態一消失之後，他依然是一個有着直透心坎的鷹一般的目光的藝術家，他永不失去他的異常的透徹。在藝術

上，我所認為唯一的衰退了的，是熱情的方面。好幾次很短的時間內，我們有了一個印象，似乎對於託爾斯泰，他的作品，已不是他的生活的本質，而只是消遣的遊戲，或是爲了實行的工具而已。然而作爲他的真正的目的者，已不是藝術，而是實行。當他被藝術的強烈的幻影所襲之際，他似乎感到一種羞恥；他簡短地把他的作品切斷，或則如對於費奧陀爾庫茲米支老爺的日記的遺稿似的，把重新和藝術相聯結的作品，全然捨棄……他是偉大的藝術家的無雙的典型，秉着豐富的創作力，却爲這力所苦，受着這力的反抗，而成爲上帝的犧牲。

羅曼羅蘭

一九一三年四月

二 亞洲對於託爾斯泰的響應

本書初版問世之時，我們尙無從估計託爾斯泰的思想在世界所引起的響應。種子維已播下，但要等夏天到來。

現在收穫期已經到了。從託爾斯泰，已經長成一株 *Tree* 的樹。他的言語已經實現爲行動，

耶斯耐耶。玻里安那的先驅者聖約翰，已有一個印度的救世主傳了他的衣鉢：即聖雄甘地。

試觀燦爛的人類的歷史之中，許多大思想家的努力，表面上維似消失，其實質却毫不減退，各種影響的互相消長，形成一派長流，不絕地灌溉大地，使之豐饒。

一八四七年，十九歲的少年託爾斯泰，病在凱壤的旅館中，從鄰床的一個被強盜刺傷面部的喇嘛教士，最初獲得「不抵抗」的法則之啓示。三十年後，他的生活的波濤，又來訴之於這法則。

六十二年之後，即一九〇九年，年青的印度的甘地又從垂危的託爾斯泰的手中接受了這神聖之光，這是那個俄國的老使徒，溫之以自己的愛，哺之以自己的苦痛，而躬育給他的；後來甘地成了照耀印度的炬火：其反光且燭及世界的各部份。

但在敘述這次洗禮的經過之先，我們得很快地說一說託爾斯泰與亞洲的關係的大體的情形。一部託爾斯泰傳，若缺此一章，那不能說是完全。因為在歷史上，託爾斯泰在亞洲所起的作用，也許比在歐洲所起的作用重要得多。他是自東至西，聯絡舊大陸的一切信徒的第一條大道。到如今，從東西兩端，都有巡禮的人往來於這大道之上。

關於這一點，我們現在已有種種方法，可以了解：因為保爾·皮魯珂夫（Paul Birukoff）——託爾斯泰的一個忠實信徒，已經蒐集了關於託爾斯泰和東方的許多材料。

東方，常常引託爾斯泰的注意。在凱壠大學作青年學子之時，他首先選了東方的阿剌伯——土耳其的語言科。在高加索的數年一間，他與回教文明，有悠長的接觸，受了很強的印象。一八七〇年後，在為初等小學而作的故事和傳說集中，他參入許多阿剌伯和印度的寓言。迨乎宗教的危機既起，聖經已不能使他滿足，於是就去研究東方的宗教。他把東方的宗教書籍讀得很多。不久，他想到可利用自己的作品去教育歐洲人，於是在聖賢思想這題目之下，他把福音書、釋迦、老子、克利須那列在一起，編為一集，他從頭就相信一切人間偉大的宗教，根本上是一致的。

他所着意追求的，是和亞洲的人們的直接的關係，他一生的最後十年中間，在耶斯耐耶和東方各國之間，織着很密的通信網。

在各國之中，以中國，在思想上最與他相近，但中國與他的關係却最淺。從一八八四年起，

他研究孔子和老子；在古代聖賢中，他最服膺老子。然而，實際上，直到一九〇五年，託爾斯泰始得與老子的同國人通信，而且，同他通信的中國人，好像只有兩個。這兩個人確實是很著名的，一個是學者，錢玄同；另一個是文豪辜鴻銘，辜氏在歐洲也是很有名的，曾任北京大學教授，革命以後，被放逐而流寓日本。

在寫信給這兩個中國名人的信中，尤其是寫給辜鴻銘的有宣言的價值的長信中，（一九〇五年十月），託爾斯泰表白了對於中國人民的敬愛之忱。由於近年以來，中國人以一種高尚的寬仁忍受歐洲人的卑劣的殘暴這種苦難，使託爾斯泰的好感愈加強烈。他希望中國作持久的忍耐，而且預言其最後的勝利。由旅順、大連等的例子，即中國人捨棄給俄國，而結果却使俄國吃了很大的虧（日俄之戰）這事，可以斷定德國人之於膠州灣，英國人之於威海衛，也將陷於同樣的命運。強盜們到底是要自相竊奪的。——但是，當託爾斯泰知道在中國人心中，已經發生了暴力和戰爭的思想時，他就不安起來了；他要求他們總須忍耐。如果他們也得了暴力和戰爭的傳染病，那是一場大禍，不但是如「西方最野蠻愚蠢的代表之一——德皇」所說似的對於歐洲人的「黃禍」，而且是對於全人類的高尚的福利的禍害。因為這老大的中國如果失去了平民的、實踐的、和平的、

勤勞的種種真正的智慧的支持，那麼這影響就會傳達到一切別的民族去。託爾斯泰相信人類的生活中，將有一個重要的變革；他相信中國人將領導東方民族而擔任這變革中的主角。亞洲人的使命，是指示世界上的別的民族怎樣由真的途徑達到真的自由；而這途徑；據託爾將泰說來，就是「道」。尤其是中國，他將照他的計劃自行改革，且作西方人的模範。——換言之，他將以立憲制度、國民的軍隊和大工業來代替他的專制制度！請他看看這幅歐洲人民的悲慘的圖畫：他們的無產階級所處的地獄，他們的階級鬥爭，他們的海軍的調動和無盡的戰爭，他們的掠奪殖民地地政治——整個文明的血淋淋的破壞！歐洲是一個榜樣——是啊！——以淺切不可這樣做。中國人既然不能停留於甘受一切侵犯的現狀，那麼只有一條路可走了：即對於他的政府及一切政府絕對地不抵抗之路。他應該鎮靜地繼續他的耕耘，服從着上帝的唯一的法則！歐洲人將在這四萬萬人的英勇的鎮靜的被動性之前解除其武裝，一切人類的智慧和幸福的祕密在乎安靜地耕種自己的園地，同時遵照着中國三大宗教的原則：儒教，主張從暴力中解放、道教，主張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佛教，主張完全的獻身和博愛。

託爾斯泰的這些意見中，我們來看一看中國人現在所做的罷；他的博學的通信者辜鴻銘，

好像不大受他的影響；因為他的卓越的然而狹窄的傳統思想，成了應付現世界的熱病的萬應膏，他祇知道實行古人定下的忠孝大節。——不過我們也不應該從表面上的波浪來評判整個海洋。託爾斯泰的思想這樣的與中國古聖賢數千年來的遺教相適合，使他想不到中國人的黨爭和革命，而現在的中國人却和託爾斯泰的思想不大接近；然而，誰能斷定，那古聖賢的思想已經永遠成爲過去，永遠滅絕了呢？

和中國人正相反，日本人，却因元氣活潑，酷喜世界上的新思想，所以在亞洲人中，最先和託爾斯泰發生關係（約在一八九〇年，或稍後）。但託爾斯泰鄙薄他們的國家觀念和好戰的偏激性，尤其是他們接受歐洲文明而且立刻沾染這種文明的惡習的那種奇異的輕薄。我們不能說他的這種鄙薄是完全不對的；因爲許多日本人的迷信，實很使他失望。例如有一個叫做 Tokutomi 的青年，自稱爲託爾斯泰的弟子，却想把託爾斯泰的學說混入愛國觀念裏去，到了一九〇四年，日俄戰爭開始時，又公然非難起託爾斯泰來。更其虛偽的，是那年青的 H. S. Tamura，他最初讀了託爾斯泰的一篇關於日俄戰爭的論文而感動得下淚，全身戰慄，狂叫道：「託爾斯泰是我們的時代

的唯一的預言者！」但幾個禮拜之後，忽然投身於愛國狂的潮流中，等到俄國的艦隊在對馬島被日本擊潰之後，他終於著了一本書攻擊起託爾斯泰來。

比較堅定忠實的——但離開託爾斯泰的真正的思想却很遠很遠——日本的社會民主黨人，是英勇地反對戰爭的，他們於一九〇四年，寫信給託爾斯泰，託爾斯泰於致謝之餘，同時表白了他對於戰爭和社會主義的非難。

然而，託爾斯泰的精神到底深入日本而流行起來了，到了一九〇八年託爾斯泰八旬大慶之時，他的俄國的友人，向全世界的同志徵文，給他出一個紀念冊，這時日本的 Naoshi Kato 寄了一篇論文去，指出託爾斯泰給予日本的偉大的影響。他的關於宗教的大部分書籍，在日本已經遼譯；Kato 說，在一九〇二——一九〇三年間，這些書籍引起一次道德的革命，不僅在日本的基督教徒間，同時也及於日本的佛教徒間；由於這個刺激，「佛教重新」的運動也起來了。在這以前，宗教原是一種外表上形式上的組織。此後纔具有（或當說重新獲得）一種內容。「宗教意識」一語，此後成爲流行的口頭禪。自然，這「我」的覺醒不是沒有危險的。他能夠引導——在許多方面，他已經引導了——到犧牲精神和同胞愛的另一端去的——即自私的享樂、旁觀主義、

絕望，甚至於自殺。這個躁急的民族，常因感情上的危機，把許多學說都解釋成褊狹的意義，而造成許多不幸的結果。然而，有許多人，特別在京都附近，却組織了幾個託爾斯泰的社團，耕種自己的園地，并且宣傳純粹的愛的福音。一般地說來，一部分日本人的精神生活上，是受了託爾斯泰人格的感染的。現在在日本還有一個託爾斯泰社，每月出一本六七十頁的雜誌，內容很有趣，也還豐富。（這雜誌叫做託爾斯泰研究）

這些日本信徒中的最可愛的例子，是那年青的 Kenjiro Tokutomi，他也是應徵一九〇八年的紀念冊的一人。他從東京寫了一封熱烈的信給託爾斯泰，那是一九〇六年的正月，託爾斯泰立刻就覆他，但 Tokutomi 等不及接到回信，就乘了頭班的輪船，到俄國去見託爾斯泰。他一句俄國話也不會說，英語也只會一點。他於七月到了耶斯耐耶，住了五天，託爾斯泰慈父一般地招待他。五天以後，他直接回到日本，一生保存着這偉大的一週間的回憶和老人的光輝的「微笑」。他在一九〇八年的文章裏，天真地追敘這景說：

「通過了拜別以後的七百三十天的濃霧和一萬基羅米突的距離，我還能看到他的微笑。

如今，我是在一處小小的鄉間，在一所陋室裏，同我的妻兒一同生活着。我種着菜，我莖

除滋蔓不已的雜草。我的全部精力，全部光陰，都化在芟除，芟除……也許這出於我的天性，也許由於這不濟的時代。然我總覺得全然幸福……不過，當一個人，在這樣的機會之中，祇知道弄弄筆墨，實也可憂！」

這個小小的日本人，在這描寫幸福而簡單的生活的數行之中，懂得了智慧和勞動，比起別的許多在紀念冊中執筆的博學的人來，他最能實踐託爾斯泰的主張，而且憑良心說話【註】。

【註】Tokami 記得一九〇六年時，託爾斯泰曾問他：「你知道我幾歲了？」——「七十八」我說。——「否，二十

八。」我想了一會，就說：「哦！是了，從你變成人的那一天算起」他做了一個平勢，表示正是。

x

x

x

以他的俄國人的資格，託爾斯泰本該有許多機會可以認識回教徒——因為俄羅斯帝國本來有二千萬回教臣民。照理回教徒同他通信的也該很多。然而，他們同他通信，却遲至一九〇一年左右。這年春天，他的對於神聖宗教會議的抗辯書以及他所坐的破門罪，使他們心折。他的高尚堅決的宣言，在回教徒間流傳，猶如他們的首長的鑿鑿的通過。他們僅提住他的確認一神教之點，他們認為這是他們的先知的教訓的複述，他們努力擁護他。俄國、印度、君士坦丁堡的回教教

長，都寫信給他，說是讀了他的斥責一切基督教徒的宣言，「歡喜得流淚」；他們慶祝他終於脫離了「三位一體說的曖昧的信仰」。他們呼之爲「兄弟」而且竭力想使他完全改變信仰。一個印度度的回教長，Kadham Gurdas pur的Mohammed Sadis，還無意之間演了一齣喜劇，他很高興地告訴託爾斯泰，說他們回教的新的救主（一個Chazart Mirza Gulam Achmed）剛在Kashmir地方發見了Tinz Azaf（耶穌）的墓而絕滅了基督教徒間的「復活」的謠言，並且他寄了一張耶穌之墓的照片和他的偉大的改革者的肖像給託爾斯泰。

託爾斯泰以嘲弄的（也可以說憂鬱的）態度，鎮靜地接受這些奇怪的通告。沒有在這類宗教問題的論爭當中見過託爾斯泰的人，再也想不到他的威嚴鎮靜的態度的。他永不離開文雅和寧靜的態度。終於有一個回教徒動了怒，他憤然地說託爾斯泰還帶着「中古時代基督教的殘餘的成見」。還有一個，因爲託爾斯泰不相信回教的新救主，用威脅的教條去攻擊他，說他們的聖人，用三種方法使人接受真理之光：

「一種人以自己的理智去接受。另一種因爲看到種種靈異奇蹟而接受，那第三種則因劍的強迫而接受（以埃及的國王爲例：摩西爲了要這國王信仰他的上帝，使他去喝紅海的水）」因

爲「上帝所派遣的先知是要使全世界受教的……」

託爾斯泰不同這般冒犯的通信者去鬥爭。他的崇高的原則是這樣的：愛真理的人們，永遠不應該固執宗教的差別和他們的缺點，而應該固執那連結人類，於人類有益的東西。——「就是因此，我努力反對一切宗教，尤其是回教」他說，——他又欣然地答覆一個熱心的回教長道：「無論何人，要是具有真正的宗教感情，那麼就當實行有道的的生活以作模範。」我們的要求已盡於此。他崇拜謨罕默德，謨罕默德的許多話，使他信服〔註〕。

〔註〕 託爾斯泰最佩服謨罕默德的關於貧窮的祈禱：「主啊，願保我終身貧窮，且在貧窮中死去！」

但是謨罕默德祇是一個人，和基督一樣。回教和基督教倘要成爲一個正當的宗教，首先當放棄對於一個人及一本書的盲從；而應該唯一服從適合於全人類的良心和理智的東西——甚至在他自己的思想的整齊的形式之下，託爾斯泰猶恐歪曲了別人的信仰，他對華梭說：

「假使我的話傷了你，請你原諒。人們不能把真理說出一半。人們祇能完全說出，或全然不說。」

不必再多說，總之，託爾斯泰不會使他的通信者們信服。

但是完全同情他的明白的自由的回教徒，也不是沒有。——第一等的，如著名的埃及的大教長，阿剌伯的宗教改革者 *Mohammed Abdou*，他於一九〇四年四月八日，曾從開羅寄一高貴的信給託爾斯泰，慶祝其「破門」：因為這種挫折，是上帝對於賢人的一種神聖的賞賜。他說託爾斯泰奮起了召集了追求真理的人們，使他們的心都期待他筆下寫出來的言語。託爾斯泰熱烈地答覆他。——託爾斯泰也得到駐在君士坦丁堡的波斯公使的敬禮，即於一九〇一年受命參加第一次海牙和平會議的 *Mirza Riza Chan* 公使。

然而最引他注意的，還是「皮哈運動」(*Behaiste*)，他常常在通信中提及這個運動，且與這運動中的人物，發生私人的關係，例如那個神祕的 *Gabriel Sacy*，曾於一九〇一年從埃及寫信給他，而且據說，這人生於阿剌伯，後來改信基督教，最後才轉到皮哈主義的。*Sacy* 對託爾斯泰解說他的信條 (*Crede*)。託爾斯泰於一九〇一年八月十日答覆他說：「皮哈主義早已使他感到興味，而且他讀過許多關於這問題的書籍；」他並不看重這運動的神祕的基礎和理論；但他相信其在東方的偉大的將來，正如道德的教訓一般：「或遲或早，皮哈主義總要與基督教的無政府主義混合的。」有一個俄國人寄了一本關於皮哈主義的書給他，他回信說他確信「一切合理的宗教的教訓」

的勝利，「這種教訓，現在正從婆羅門教、佛教、猶太教、基督教等種種教義中產生。」他看出這種宗教「正向着一種唯一的，全人類的宗教的合流」進行。他知道皮哈運動的潮流已經深入俄國的凱壤的韃靼人中間，不覺欣然，他歡迎他們的領袖華沙，到他家裏去，關於他們的談話，Gusev有所記錄。(一九〇九年二月)

在一九〇八年的紀念冊中，作為回教的代表的是加爾加答的一個法律學者 Abdullah-al-Mannan-Subrawardy，他為託爾斯泰立了一座莊嚴的紀念碑。他呼之曰「Yogi」而且接受託爾斯泰的「非暴力」的教訓，認為與謙罕默德的教義並不違背；然而「讀可蘭經當如託爾斯泰讀聖經一般，在真理的光下去讀，不去在迷信的雲霧中去讀。」他頌揚託爾斯泰並不是一個超人，一個 Dehari-menadi，而是一切人的兄弟；不是西方或東方之光，而是上帝之光，全人類之光。并且，好像先知的預言一般，他宣告道：託爾斯泰的「非暴力」的說教「與印度的聖賢的教訓相參合，也許會給我們這時代，產生出新的救世主來。」

果然，在印度產出了託爾斯泰所宣告的聖子。

十九世紀之末，二十世紀之初，印度已經完全覺醒了，歐洲人却還不會看出——除了那些真正有學問的，不急急於把科學去奉仕流俗的，不鑽在自以為閒人莫入的舞文弄墨的螺螄殼裏的學者——。印度的精神的不可思議的復活，於一八三〇年開始顯露，到一九〇〇年已是光芒四射，但歐洲人還不知道。這是精神的田園中的突然開發的燦爛之花。在藝術中，在科學中，在思想中。泰戈爾這姓氏，就已脫離了他的光榮的老家的星座而輝煌於世上。差不多同時，所謂「印度之路德」的 Dayananda Sarasvati 即 Arya-Samaj 的建立者，又標起「費唐主義」Yedantisme 來，還有 Keshub Chunder Sen 組織 Brahma-Samaj 成爲改革社會的一個工具，且是使基督教思想和東方思想接觸的媒介。然而，最重要的，是在印度的宗教的天空上，突然閃現了兩個最偉大的巨星——照印度的含有深意的說法，該說是數世紀以後的再現——這兩個精神的奇蹟是 Ramakrishna (1826-1886)，他是上帝的瘋子，他把一切神明的形式都歸納在愛之中。還有一個是他的青出而藍弟子 Vivekananda (1863-1902) 他的奔流一般的精力，在他的疲茶的民族中，喚醒了行動的神 Gita 的神。

託爾斯泰的廣大的好奇心，不會絲毫放過這些情形，他讀過 Dayananda 的論文，這是 The

Vedta Magazine 的主幹 Rama Deva 寄給他的。一八九六年以後，他很注意 Vivekananda 初次出版的作品，而且十分玩味 Ramakrishna 的談話錄——一九〇〇年 Vivekananda 歐洲之遊，不到耶斯耐耶·玻里安那一走，實爲人類的不幸。記得那年萬國博覽會時，偉大的 Vivekananda 經過巴黎，作者當時因俗冗蝟集，不克爲這兩個預言者，歐亞宗教的二大天才盡聯絡之責，至今猶引爲遺憾。

和印度的 Swami 同樣，託爾斯泰也受過「愛之主」克利須那的精神的哺育，另一個印度人奉之爲神聖 (Mahâtma)，古代 Rishi 的化身，The New Reformer 的主筆 Gopal Chetti 在一九〇八年的紀念冊中，把託爾斯泰，擬作出家的王子釋迦；他說，託爾斯泰假如生在印度，一定會被視爲一個 Avatara，一個 Purusha (宇宙精神的化身)，一個 Sri-Krishna。

然而歷史的必然的潮流，却把託爾斯泰從 Yogis 之神之夢，推向 Vivekananda 的、甘地的——印度自治的偉大的運動去。

運命的不可思議的曲折呵！最初導引託爾斯泰到這方面去的人，是後來成爲印度的聖雄的最良的健將的這個人，但這人，在當初，却還是反對這種思想的一個大敵，這人就是 C. R. Das……

我們可以說，他之所以轉變到他的真正的使命，託爾斯泰亦與有力焉麼？一九〇八年之末，G.F. Dard 正參加革命，他寫信給託爾斯泰，公然主張暴力，反對託爾斯泰的不抵抗主義；可是，他要求託爾斯泰對他的日報 (Free Hindustan) 說一句同情的話。託爾斯泰於一九〇八年十二月十四日覆他一封長信，差不多是一篇論文，題目是致一印度人書，這信不久即傳誦於全世界。他竭力宣傳「不抵抗」和「愛」的主張，把引自克利須那的話都附錄在旁邊。他攻擊科學的新迷信，同攻擊宗教的舊迷信一般的用力，他激烈地責難印度人捨棄了其古聖賢的學問而追隨西洋人的錯誤。他說：

「我們可以希望，在婆羅門教——佛教和儒教的廣大的世界以內，毫沒有新的科學的成見

的地位，我們希望中國人、日本人、印度人，覺悟了維護暴力的宗教的謬妄之後，就直接去思索人類所固有的愛的法則，這法則，是東方的聖賢所竭力昭告於吾人的。不幸，科學的迷信，已代替了宗教的迷信逐漸侵入東方的民族來了。這迷信已經駕馭了日本人，替他們預備一場更慘的災禍。同時，這也流行於中國和印度的想作領袖的人物中間，你也是其中之一。你在你的日報上，當作指導印度人的活動的基本原理，揭示如下的觀念：

Resistance to aggression is not simply justifiable, but imperative; non-resistance hurts both altruism and egoism. (抵抗侵略，非但合理，且為必要。不抵抗主義，則於利他利己兩方，皆相衝突。)

「……怎樣！你，最富於宗教性的民族的一分子的你，竟以輕薄之心，信任科學的教育而背棄了愛的法則麼？要知道這法則，是你們的遠祖，非常明白地，教給你們的人民的胸中的！……你反覆了許多愚蠢的話，你們引起了暴力的競爭，真理的敵人，你們先是做了一神教的奴隸，結果是做了科學的——你們的歐洲的主人的奴隸！」

「你不是說英國人把印度征服為奴隸，是因為印度人不會以武力反抗強暴的緣故麼？——然而，完全相反！印度之所以淪為英國的奴隸，祇是由於他們承認——而且現在還承認——暴力是他們的社會組織的基本原則；在這原則的名義下，他們屈服於他們的小王國；在這原則的名義下，他們自相鬥爭，向歐洲人鬥爭，向英國人鬥爭……一個商業公司——三萬人，而且是文弱的人——就征服了二萬萬人！把這事告訴給一個有成見的自由人看！他簡直不會懂得這句

話的意思……就是照這些數字看來，也可知道不是英國人征服印度人，而是印度人自己征服了印度人，不是明明白白的麼？……

「印度之所以被暴力所征服，乃是因為他們自己依暴力而生活，而且依暴力生活到現在，不知道人類所固有的愛的不朽的法則之故。

「尋求他所已有的、有而不知的東西的人，是可憐的，是愚蠢的！是啊，不認識圍繞在他周圍的愛的福利，不認識我所賜給他的東西的人，是不幸的，是愚蠢的阿！（克利須那）」

「人類唯當遵愛之法則而生活，這法則是出於本心的，其中還包含着不抵抗，不參加一切暴力的原則。要是這樣，非但數百人不能征服千萬人，即千萬人亦不能征服一人。不要抵抗惡，不要參加惡，不參加政府、法庭、租稅、尤其是軍隊！——這樣，世界上就沒有一個人能夠征服你！」

在這信的結末，又引了一段克利須那的話：

「孩子們，高高地舉出你們的旨了的目光，一個新的世界，充滿了歡喜和愛的世界，出現在你們眼前了，這是一個理智的世界，是我所創造的唯一的真世界，現在你們可以認識愛對於

你們所做下的，愛所賞賜給你們的，愛所要求於你們的了。」

這信，不久落在一個年青的印度人的手中，這人是南非洲 Johannesburi 的一個「信徒」。他名叫甘地，他很受感動，一九〇九年終，他寫了一信給託爾斯泰，告訴他在託爾斯泰的偉大的精神的影響之下，為犧牲而奮鬥者，已十二年，他要求託爾斯泰允許他把那封給 C. R. Das 的信譯成印度語。

託爾斯泰寄給他一篇兄弟一般的祝禱，叫他「以溫和抵抗強暴，以謙遜和愛抵抗驕傲和殘忍。」他讀了甘地寄給他的印度自治的英文本，他立刻明白這宗教的又社會的經驗的重要性：

「你所討論的問題，即消極抵抗問題，價值極高，不但對於印度，且是對於全人類的。」

他讀了 Joseph J. Doka 的甘地傳，非常傾倒，雖在病中，仍寫了熱烈的數行寄去（一九一〇年五月八日）。迨病愈後，他寫一封長信給甘地，從 Kotschety，時在一九一〇年九月七日——離他逃亡前一月——此信極為重要，茲附載於本書卷末，在後人目中，此信不啻是不抵抗主義的聖經，託爾斯泰的遺囑。南非洲的印度人於一九一四年，將此信公布於 Golden number of Indian Opinion 的「南非洲的消極抵抗運動」專號。那時正是不抵抗主義首次獲得政治上的勝利

之日。

作爲明顯的對照，在同候，歐洲發生了同室操戈的大戰。

然而當風暴停止，喧嚷之聲消失之後，在毀滅了的田間，人們重新聽到了百靈鳥一般的甘地的清晰有力的聲音。這聲音，以更明白婉轉的調子複述着託爾斯泰的偉大的言語，唱着一種新的人類的希望之歌。

羅曼羅蘭

一九二七年五月

三 託爾斯泰去世前二月致甘地書

致K甘地先生，Johannesburg, Transvaal, 南非洲

一九一〇年九月七日 Kotachety

接讀你的 Indian Opinion 日報，藉悉關於絕對的不抵抗主義的種種，欣慰無似。於此稍有鄙見，爲足下陳之。

余閱世愈久——特在今日，自知距死期日近——愈覺有說明一事之必要，此事在余心中，感觸最深，亦覺最爲重要：蓋余欲普告世人，所謂不抵抗主義，言其究竟，實與博愛之教，未經欺人之談的歪曲的愛的法則無異。所謂愛，換言之，即對於人類共通意識及互相扶助之靈魂的感應，實代表人生之最高的唯一的法則。……且此係人人心底所共知，同感者。（於小兒之間，更可明白看出）。凡人若未爲世間的虛偽的思想之牢籠所困惑時，必能知之。

此法則爲人間一切聖賢所宣布。印度、中國、希伯萊、希臘以及羅馬。余以爲基督解說此法則最爲明白，彼嘗以簡明之言，指出：「一切法則及預言家所說的，都不外這一條法則」。此外，基督預知此法則有容易被他人敗壞的危險。被祇求物質的利益之徒，自然要敗壞這法則。彼輩確認唯暴力能守衛彼等之利益，換言之，即所謂，以眼還眼，以牙還牙，又所謂「被強力所奪，以強力收復之」……基督知道（凡有知識的人皆知之），一用暴力，則作爲生活之最高法則的愛即不能並立，一旦採用暴力，在任何情形之下，愛之法則立即消失。全部基督教文化，表面雖似十分光彩，實則長大於這種不證自明的和怪異的誤會與矛盾之間。這有時是有意的，多半却是無意識的。

實則，暴力一經採用，愛的法則即失其價值，且不復可見。若無愛之法則，則更無別種法

則，祇餘強權而已。一千九百年來，基督教國即如此長成。此外的人們，亦皆奉強力為社會組織之指導原則。基督教國與其他國家之差別在乎：在基督教國，愛之法則曾經明白清楚地規定；而且，基督教徒皆嘗莊嚴地接受此法則。雖然，實際上，彼等却視暴力之運用為合法，彼等之生活，亦基於暴力之上。故基督教徒的生活，實係一種矛盾，其所告白者與其生活的基礎不符，其奉為行動之法則的愛與其暴力衝突。此種例子，隨處皆是，如：政府，法庭及軍隊，皆係彼等認為必要而讚許之者。此種矛盾，與內部生活之發展俱長，最近已臻極點。

現在問題已經變成這樣：即「然」或「否」；任君選擇！或則，吾人不認一切宗教道德的教訓，唯聽強權指揮吾人之生活。不然，則一切強迫捐稅，法庭，警察，尤其是軍隊，皆當廢除。

今年春天，莫斯科某少女修道院舉行宗教試驗，宗教教師及出席於此次試驗的主教，先後向少女們試問摩西十誡，尤其着重於第五條，「戒殺人」。當答案做得正確時，主教又發此問：「上帝的法則，是否叫人無論何地不得殺人？」那些被教員所教壞的不幸的少女們答道：「否，不盡然。因為在戰爭中及執行死刑時，是准殺人的。」——而其中的一個，又被問到一個慣常的問題：「殺人者總是有罪的麼？」她紅了臉，感動而決定地說：「總是有罪的！」（這是一個親眼

看到的人講給我聽的)。於是她不管主教的詭辯，固執地解釋道，在一切情形之下，殺人都是被禁止的——這在舊約上已經說過：至於基督，他不但禁止殺人，并且不准加害於人。那個主教雖有他的尊嚴和敏捷的口材，但也祇好啞口無言，這個少女激動了他。

是的，在我們的報章上，天天侈談着航空的進步，外交的縱橫捭闔，什麼俱樂部，什麼新發明，什麼自稱為藝術的作品，但對於這少女所說的一件，却都是沉默地過去！然而我們不能遏絕這種思想，因為這是每個基督教的人民，都多多少少能感到的。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救世軍、犯罪的增加、失業、富豪的窮奢極侈、窮人們的黑暗的慘狀、自殺的可怕的進步，這一切情形，都證明着內部生活的矛盾，這是應該設法解決，而且必將解決的。說到解決，似乎祇有一條路，即認識愛的法則，而捨棄一切暴力的運用，因此之故，你的在 *Tranparai* 的活動，雖世界的一隅之事，但引起我們的非常的注意；且係今日地球上最爲重要之事；不僅基督教民族，實全世界民族，皆當參加者也。

你當然樂於知道，在我們俄國，也有同樣的運動在很快地發展着，拒絕軍役的人是一年一年地增多了。雖然我們的不抵抗主義者和拒絕軍役的人，還不很有力量，但這兩種人都能懂得：

「上帝與我們同在。而且上帝比人更強。」

在基督教的信仰的宣言之中（即使在變質的基督教的形式之下）及爲了戰爭的大屠場，必須設立海陸軍的這信仰之中，有一個很的矛盾，或遲或早，——也許很快地——這矛盾將赤裸裸地暴露出來。那時候，或則消滅基督教（但沒有基督教，國家的權力就不能維持）否則，廢除非國家所必要的軍隊，捨棄一切強力的運用。這矛盾已爲一切政府所感到，你們不列顛，我們俄國，都已覺着。但爲保守精神所驅，他們一定會用比一切反政府的活動更大的精力，去究治揭穿這矛盾的人們的。我們在俄國已經看到這情形，而且在你們的報紙上也有所披露。統治階級很明白那些威脅他們的極嚴重的危險從何而來，不但他們小心地保護着的利益遇到危險而已，他們知道他們也要爲依然故我呢或改弦易轍呢這問題而交戰了。

萊翁·託爾斯泰

校後附記

於校閱中，得到一個消息：本書著者將偕巴比塞（H. Barbusse）、特萊散（T. Dreiser）、路易斯（L. Rein）諸人來華，乃是啣了世界反帝大同盟之使命，來調查滿洲事件的。記得「李頓調查團」來華時，國人曾視爲公理正義的使者，熱烈地歡迎過一番，那麼，對於這一次真正齎了公理正義而來的世界反帝大同盟的「滿洲調查團」，必有更盛大的歡迎罷？

本書著者對於中日事件，早下過正確的批判。譯者曾譯過他的一篇論中日紛爭的文章，載在去年的社會與教育上。現在原文與譯文都不在手頭，只記得那結論的大意，是叫中日的勞動大眾起來，首先各自打倒本國的軍閥，然後彼此握手，組織生產勞動者的大同盟，並且主張在歐美也要同樣地幹。他大聲疾呼：「要實現國際和平，必先革命！」

我猜想著者的意見，不至於有大改變的罷，在他們的一行調查了滿洲事件之後。我又想調查團中其他的團員的意見，也不至於與著者很歧異罷。

運命的奇異的諷示呵，對於中國，在「李頓調查團」之後來了一個「反帝」的調查團。運命的巧妙的拉合呵，對於我，當著若來華之際，能將這託爾斯泰傳的譯本當作歡迎的禮物。

徐懋庸

一九三三年四月